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俄]罗赞诺夫(В.В. Розанов)◉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张百春◉译

О легенде "Великий инквизитор"

刘小枫◉主编

华夏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俄〕罗赞诺夫　著

张百春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俄罗斯)罗赞诺夫著;张百春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2612-8
Ⅰ.陀… Ⅱ.①罗…②张… Ⅲ.陀斯妥耶夫斯基
-宗教哲学-思想评论 Ⅳ.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529 号

О легенде "Великий инквизитор"
[俄] В.В. Розанов 著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16
印　　张:11.75
字　　数:150 千字
定　　价:22.00 元

总　序

刘小枫

自先秦至晚明，汉语思想有过两次与异域思想的历史性相遇(佛学和泰西实学及天主实学)。清末以来，学界孜孜以求认识西方思想，乃汉语思想与异域思想历史性相遇的第三波。

仅仅百余年的西方学典汉译历史，可以说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为第一阶段。尤其二十年代以来，众多现代知识人凭着自己的兴趣翻译西方学典，出现了不少出色的翻译大家。但西洋思想图景仍然显得零碎，学界尚缺乏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性认识。一些译家的热情奉献给了不那么经典的西方作品。

第二阶段，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新中国政府规范翻译西典事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制订新的选题，几十年来寸累铢积，形成了振裘挈领的"汉译学术名著"体系。然而，这西典体系的设计受当时学界眼光限制，亦为思想史界的教条主义所扼，虽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仍然不能说反映了西方思想大传统。"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 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大家的基本著作，未有译成汉语者，岂止在少数？问题仍然在于，学界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性认识，迄今让人感到不踏实。比较而言，国人认识近、现代思想的热情远大于认识西方古典思想。原因似乎不难理解：国人认识西方思想的热情，主要是现代强国梦推动的。如此认识心态，本来就是问题。所谓"西方名著"的清单难道不需要通盘重拟？

八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学人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致力晚近几十年欧美学界整理学故的学术成果，企求以西方现代经

典入手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学典体系,反映了学界通盘重新认识西方思想传统的渴求。遗憾的是,这一汉语学界的重大学术战略因时光流变而中断。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蔚成风气,各种翻译"丛书"迭出,热情引进种种人文-社会科学新知。可是,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引进了多少"前沿"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之类的社会科学,仍与欧洲思想大传统了不相干。如果选题设计随事斟酌、以求适时,只能徒令学界袭拾西学唾余,以支庶续大统。紧跟当下"主义"流变,务竞新奇、不成条贯,重新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未尽之业难以赓续,仍有赖悉心疏理传统源流。

西方思想传统的要典即便译成了汉语,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性认识问题并不等于就解决了。就已经有的经典翻译而言,学界的读解经常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原因之一是,学界缺乏对西方思想典籍具有深度解释的翻译积累。仅仅翻译原典,显然不够,也需要精当挑选、翻译对原典的解释性要籍。

晚近十年,不能说译界不热心翻译思想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问题是,如果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理解尚有问题,如何可能恰切选择研究论著?再有,业界对西方思想史的关注,基本上还停留在通史一类或对思想大家的通论介绍性评估,缺乏有深度解释的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一般认识水平,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性认识就不可能长进。

设计这套"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理解。首先,注重选择思想大家或有影响的思想史家的研究,力求形成名家解释名家的研究系统。形式上以个人和专著为主,也兼及思想史上的小传统和文集,希望在认识西方思想传统的路上留下坚实的足印。编译者念汉译西典前业未毕,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者耶。

1999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苏格拉底说："……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给法官的印象不够好"。

——柏拉图，《斐多》（杨绛译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喜欢讲罪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一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似乎'罪犯'这个词就不能不闯入脑子里来"（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犯是些什么人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刑事犯罪与哲学的区分消失了：拉斯科尔尼柯夫出於一种意志哲学的观念而杀人（刑事罪），斯麦尔加科夫不是哲学家，但他的杀人罪不过是实现哲学家伊凡的意志，以至於当伊凡看到自己观念的现实，一下子"脸色煞白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犯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哲学家？

哲学家是罪犯？过於耸人听闻了罢！

无论拉斯科尔尼柯夫还是伊凡，都因思想观念导致杀人。他们有如扎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脸色苍白的罪犯"，"灵魂企盼鲜血，而非抢劫"；然而，"行动之后，却不能忍受行为的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显得非把笔下的哲学家逼到这样的田地：要么承受观念的行为——杀人、要么因不能忍受行为的观念而自杀。

尼采笔下的"脸色苍白的罪犯"听从"可怜的理性"，即便站在法官和祭司面前，还为自己"对人的极大蔑视"的观念辩护。一旦观念变成了行动，"罪犯"马上"脸色煞白"。何为犯罪？犯罪

"是一堆疾病,是借助思想在世界蔓延的疾病"(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脸色苍白的罪犯",黄明嘉译文)。尼采笔下的罪犯看起来也像个哲学家,他在法官和祭司面前还理直气壮地宣称:"可你们的善对我又算什么呢?"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据说尼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伟大的导师")笔下的罪犯看起来都像个哲学家,事情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哲学家是人类的罪犯?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人的第一个伟大形象。在他之前,虽然有那么几个哲人,但据说他们实际上是诗人。

这第一哲人恰恰是个罪犯。柏拉图的《斐多篇》记叙了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的临终时刻,场景就在监狱。据说,《斐多篇》其实是讲法律的书,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哲学这个词第一次就出现在这篇论刑事罪(《斐多篇》,857d2)的作品中;"这意味著,只有通过刑法问题,才能进入哲学"(参见 Seth Benardete, *Plato's "Laws": The Discovery of Being*, Uni. of Chicago Press 2000,页3)。

《斐多篇》的大背景往往被人们忽略:苏格拉底在监狱里谈哲学。在这个世界上,哲人应该呆的地方似乎就是监狱。人们生来就是要活得好,哲人却教诲如何学会死,这号人不关起来还了得?斯塔夫罗金并非是个疯子,看起来荒诞不经的行径,其实是一个哲学家意志的迹象,但"他体现的那种精神会唤起社会上莫名的仇恨和恐惧,因此属於必须拖到城外用石头砸死的那种人"(J. M. Murry,〈论斯塔夫罗金〉,罗进德译文)。

在雅典法庭面前,苏格拉底才晓得了自己的观念可能导致的现实,於是一下子"脸色煞白",最后理性地选择了自杀。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案件,似乎重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从《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群魔》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尼采与柏拉图思想有直接的连带关系,甚至被说成最后一个真正的 Platoniker,是众所周知的。未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与柏拉图有瓜葛?

历史上的大作家模仿柏拉图,并非没有先例(例如拉伯雷曾

刻意模仿《会饮篇》,参见 G. Mallary Masters, *Rabelaisian Dialectic and the Platonic - Hermetic Tradition*, State Uni. of New York Press1969,页 41-67)。但从 L. Grossman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编辑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藏书目录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才得到柏拉图的 opera omnia(《全集》)。恐怕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直接受到过柏拉图的影响,或者刻意模仿其对话作品。

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不都是小说吗?他何曾写过哪怕一篇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哲学论文、甚至哲学随笔?

是否哲人,倒不一定非得从写作方式来断定。柏拉图的写作方式是诗人式的,但他是地道的哲人;一如当今某些后现代人写的是哲学论文,却是地道的诗人。在柏拉图的时代,写诗就是"讲故事"(muthous)。"故事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所谓"假故事",指的不是虚构。讲故事难免要虚构,甚至可以说,没有虚构,叙事就不成其为故事(muthos),而是成了史事(historia)。对柏拉图来说,真实与虚假故事的区分,是就德性而言的。给城邦的人民讲德性的故事还是颓废的故事,才是真实与虚假故事的差别——这差别关系重大,涉及城邦的正义问题。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必须痛加谴责"那些"没有能用言语描绘出诸神和英雄的真正本性"的"丑恶的假故事"(《理想国》,376e-383c)。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柏拉图有瓜葛,至少因为他们都讲真实的故事。托马斯·曼在谈到如何评论一个作家时说:对有的作家,你可以拿他开开玩笑——比如歌德,有的却绝对不能——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尼采。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灵魂与魔鬼打交道。歌德虽然写了与魔鬼做灵魂交易的浮士德博士的故事,自己并非真的与魔鬼打交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他认真在与魔鬼——哲学犯罪——打交道。

歌德是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是哲人。托马斯·曼的意思很可能是说,喜欢玩文字的文人可以拿诗人开开玩笑,但不能与哲人开玩笑,不然的话,小心有一天会死於非命。

哲人柏拉图用诗的形式写哲学。"诗"这个词应该说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的,指有别於小说、戏剧的诗歌形式,属於所谓体裁用法;另一种是广义的,指与哲学相对的精神方式、生存方式和言说方式。作为哲人,柏拉图虽然与诗人的精神方式、生存方式不同,却刻意模仿诗人的言说方式(讲故事)。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篇幅最长、也最难读懂的戏剧)《法律篇》中还说:

> 就我们的能力来说,我们自己也是悲剧诗人,我们也创作了一部相当美好、崇高的悲剧。我们的城邦不是别的,只是对最美好的生活的摹仿,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悲剧。你们是诗人,我们也是诗人,是你们的同调者,也是你们的敌手(《法律篇》,817b,朱光潜译文)。

当时,诗就是音乐、音乐就是讲故事,具体说来,就是戏剧。要讲故事,语言就得贴近时代生活;随著时代的变迁,(广义的)诗的语言(讲故事的语言方式)也在变——但丁、莎士比亚的诗剧,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诗的写作方式。但他们不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诗人,很可能是古典意义上的哲人,尽管他们用了诗的叙述方式。

哲人与诗人的差异,主要是精神方式上的。看上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柏拉图在精神方式上确乎有那么一些相似(有人将柏拉图《第七封信》中的自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辽莎的描述相提并论,参见 Leon Harold Craig, *The War Lover: A Study of Plato's Republic*, Uni. of Toronto Press1994,页 378)。在一位俄国评论家看来,这种相似根本在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柏拉图一样献身於纯粹的观念,"康德哲学与佐西马哲学若合符节,两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都是 Platoniker"(参见 A.S. Steinberg, *Die Idee der Freiheit: Ein Dostojewskij - Buch*, Jacob Klein 德译 Luzern1936,页 30–31)。

这也许仅仅是两人相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并非最主要的方面。

前文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大多讲的是作为"罪

犯"的哲学家,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似乎都是从苏格拉底这个雅典城邦的"罪犯"的案子引出来的(单单涉及这案子的作品就有四篇:《游叙佛伦》、《申辩》、《克力同》、《斐多》,中译见《古希腊散文选》,王焕生译,人民文学版 2000)。思想行为是否算犯罪,得靠法律来裁定;有法律条文,才会有罪犯。《理想国》中的重大主题之一是"罪与罚"(参见 Leon Harold Craig 前揭书,页 112 - 182),这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主要作品的书名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篇幅最长也最难读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不是像柏拉图晚年倾力而作的《法律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犯"与柏拉图的"罪犯"尽管看起来都是因尼采所谓"可怜的理性"而犯法,"犯罪"性质却不同,因而"罪犯"的性质也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犯"是现代的哲学家、是知识份子,尽管他们面对的"大法官"都同时带有祭司身份,就像尼采笔下"脸色苍白的罪犯"所面对的法官。"罪犯"性质的改变,就是哲人品质的转变:哲人成了哲学家,或者说启蒙知识份子。所谓现代的哲学家,就是为能说且敢说这样的话而自豪的人:"教会要想统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甘愿受它统治。拥有巨资的高级僧侣最害怕的莫过於让下层大众受到启蒙,他们长久禁止人民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能禁止多久,就禁止多久"(《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版 1978,页 254)。从柏拉图的记叙来看,苏格拉底绝对不会说诸如此类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柏拉图相似,却绝非模仿柏拉图,而是像柏拉图那样面对人类的"罪犯"问题。由于近代的人文运动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性形成的过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面对这一问题的,至少还有但丁,然后是莎士比亚(参见 Robert Louis Jackson 的 *Dialogues with Dostoevsky* 一书中"两个伊凡:早期莎士比亚与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章,Stanford Uni. Press1993,页 228 以下)和卢梭(甚至连康拉德都看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卢梭思想的瓜葛,而且通过一篇同样描写出於哲学观念杀人的

刑事罪小说作过探讨),然后是尼采……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重大主题与柏拉图作品的相似,不仅有"罪犯"的法律问题,还有哲学与爱欲的关系问题……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哲人。

早有人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哲人。我们不是没有听见,而是充耳不闻,或者听不懂。

整整一百年前(1901 年),时值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罗赞诺夫(又译洛扎诺夫)发表纪念演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於欧洲有如一场"精神革命"。什么样的"精神革命"?是不是要发起对现代哲学家的终末论审判?如果说,柏拉图作品的基本主题是"罪犯"苏格拉底在"宗教大法官"面前为自己申辩——听起来倒像作自我检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基本问题就是:启蒙革命以后,传统的"宗教大法官"何以还有法权审判"罪犯"?如果没有,就该倾听"脸色苍白的罪犯"的辩辞了:"你们这些法官呀,……你们光同被你们所杀的人和解是不够的,让你们的悲伤变成对超人的爱吧!"(《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这位"脸色苍白的罪犯"也许已经为伊凡的"长诗"作了最精当、最透彻的注释:启蒙运动以后,身为"罪犯"的哲学家们应该成为审判人类的"宗教大法官"。

在启蒙的现代之后,人类面临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终末论"审判!?

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写的导言中,罗赞诺夫提出,必须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作为"体系"来理解。哲学才谈得上"体系",不过,罗赞诺夫这里所谓的"体系",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而是指哲思的尖锐所及。上个世纪初以来,好些俄国(后来还有西洋)学人写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分门别类、条章理析地"归纳"其思想。罗赞诺夫没有写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系论,而是细读、详解《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关键章节——"宗教大法官"。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之间有内在联系,同一人物在不同场合出现,都有讲究,这并不等於有一个所谓柏拉图的"体系"。虽然仅仅是在详解"宗教大法官"一章——作者伊凡称

之为"长诗",而且"很荒唐"(《卡拉马佐夫兄弟》,卷五,第5章,荣如德译,上海译文版1998)。罗赞诺夫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所有的重要作品勾连起来。如此解读,非哲人不能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舍斯托夫那里得知,罗赞诺夫是俄国当时最杰出的哲人,於是约请译蒲宁小说显得身手不凡的戴骢先生译《落叶》。可惜,当戴骢先生找到原书并马上译出两筐"落叶"的目录寄我时,第二天我就启程去欧洲了。

罗赞诺夫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写於十九世纪末,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了德文译本(Rozanow, *Dostojewskij und seine Legende vom Grossinquisitor*, Berlin1924)。在瑞士读书时,我从旧书店捡得此书,看得恍恍惚惚。罗赞诺夫行文恣肆汪洋,对"宗教大法官"的解释既高远又精深,难得要领,我一直耿耿於怀。张百春兄在俄国修习过六年——获得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犯"经常出没的城市)大学哲学博士,今年初再去莫斯科,我顺便请他留意,看是否有俄文版,他竟然找到了。张百春博士的译作,坊间已有多种,译品广受赞誉,我迫不及待请他译出这本书……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最具毒性的一滴毒液,它终於从我们已经走了两个世纪的精神发展阶段中流了出来,分离了出来。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我们还要补充说,在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否定里的伟大感,这一切我们不但从来都没有体验到,而且我们也不会体验到……"(罗赞诺夫)。

毒液早就传感到中国,只不过我们没有"体验到"其毒性,迄今还以为是甘贻。

2001年11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

责任编辑●陈希米
封面设计●阎志杰 刘佳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是《卡拉玛佐夫兄弟》，而《大法官》一章又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它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神学思想的核心——怎样去理解基督教的本质。罗赞诺夫对这部作品的解说具有开创性，也是最被学界推崇的。

早有人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哲人，我们不是没有听见，而是充耳不闻，或者听不懂。

——刘小枫

ISBN 7-5080-2612-8

9 787508 026121 >

ISBN 7-5080-2612-8/B·140　定价：22.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1]）

目　录

>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
> 创世记 3:22－23

在一篇虚构的小说中，果戈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年迈的高利贷者临死时把画家叫到自己跟前，一个劲地请求他为自己做个肖像；当这个工作开始后，画家突然觉得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厌恶之感，其中还夹杂着某种恐惧。然而，高利贷者一直注视着画家的工作，在他的脸上流露出某种忧郁和不安，——但当他看到，至少双眼已经画完了，在他这张脸上掠过一丝喜悦。画家后退了几步，要看一看自己的作品；他刚看了一眼，双膝就开始发抖：在这个刚开始的肖像的双眼里闪烁着生命，这是真正的生命，就是在肖像的原型中已经停止了的那个生命，借着某种神秘的魔法转移到这个拷贝上了。调色板和画笔从画家手中脱落，他惊慌地从房间里跑出去了。几个小时后，高利贷者死了。画家在修道院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当我们打算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传说时，不知为什么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个故事。透过全部虚构，其中仿佛显露出某种真理，这真理必然把它从其他几乎被遗忘的故事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被意识到的，并把关于它的思想与令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故事里果戈理是否表达了艺术家灵魂的某种秘密，也许他就是在自己身上意识到了这个秘密？转移到作品中的这个生命，在死去之前实现这个转移的愿

望,——这一切仿佛令我们想起画家、诗人、作曲家自己生命中某种主要的东西。只是在这里被实现的东西和实现者被隔离着,这就掩盖了暗含着的寓意。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您就将获得一切伟大创造天才的命运和个性的表达。

"谁也无法从中返回来"的地方当然有生命;但关于这个生命我们一无所知,这大概是某种完全独特的,对我们富有朝气的愿望而言过分抽象的生命,多少有些冷淡和虚幻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人如此迷恋大地,如此怯懦地不想离开它;但由于这个分离早晚毕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就尽一切努力使得与大地的分离成为是不彻底的。对永生、人间永生的渴望,是人身上最惊人的、完全是无可怀疑的情感。是否因此我们才如此爱孩子,更担心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自己已经衰老的生命;当我们有幸活到他们的孩子出生,——那么我们更强烈地醉心于他们的孩子,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在彻底怀疑死后的生存时,我们在这里也能找到某种安慰:"虽然我们会死的,但我们的孩子还存在,在他们之后,还有他们的孩子",[2]我们依偎着亲爱的大地,在自己的心里这样说。但这个永生,当我们成为一把泥土以后,我们血缘上的这个生命太不完满了:这是某种破碎的生存,这生存分散在无数代人之中,在这个生存里也不能保留我们在其中所爱的主要的东西——我们的个体性,完整的个性。无比完满的生存,是在伟大的精神产品中达到的生存,在这些精神产品里创造者使自己的个性与自己的所有特征,以及自己理性的所有细微变化和自己良心的秘密获得永存。有时他(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不愿意流露自己心灵的任何方面,但是,在他身上对永生的渴望,对个体的、与其他人不同的生命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尽管他想尽办法隐藏和掩盖,但毕竟把自己心灵的这个方面的反映留在自己的作品里;时光流逝,有益的特征将显露出来,出现

这样的人的完整形象，他将不再担心在人们面前发窘。仿佛充满了这些体验的果戈理说："可怜的人，为自己建造更高的金字塔。"[3]

无论如何，在这个创造中所体验到的喜悦情感将成为昏暗中的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一线光明，这昏暗通常笼罩着伟大诗人、画家、作曲家的心灵。他们如此深刻地、经常是无法克服地与他们周围的人们及其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世界分离了，以致于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经过几个世纪与另外各代人相连的，想象地生活在那些人中间，在劳动中帮助他们，因他们的喜悦而喜悦。这是奇怪的，有些虚构的生命，然而，如果潜心阅读所有著名的传记，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它的特征。无怪乎已故的乌索夫(Усов)教授称他的世界为"幻想的世界"，他是个自然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个艺术方面的行家。[4]

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领域里的几乎每个创造者那里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中心，有时是几个，但总是不多，其所有作品都聚集在这些中心周围：这些作品仿佛是表达某种折磨人的思想的一些企图，当思想最终被表达出来时，——就出现了作品，这作品因其创造者最崇高的爱而令人感到亲切，并充满对其他人而言永不消失的光，于是，他们的心和思想以无法遏止的力量爱慕他。歌德的《浮士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都是如此。这是心理活动的最高产物，人类喜爱它们，换言之，人类（根据它们而）知道在自己最好的时刻能做什么，当然，在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时刻是罕见的，如同每个人生命中特别清醒的时刻是罕见的一样。

我们就想研究一个类似的作品，但它充满着一种独特的痛苦，这和我们所选择的作家所有其他作品一样，和他的个性自身一样。这就是已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

说》[5]。众所周知,这个传说只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片段,但它与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的联系是如此之弱,以致于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尽管没有外部联系,但是在长篇小说和《传说》之间有内在联系:只有《传说》仿佛才是整个作品的核心,作品只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如同在自己主题周围的变化一样;作家隐藏在心中的思想留在了这个《传说》里,没有这个思想不但这部长篇小说不能被写出来,而且他的许多其他作品都不能被写出来:至少在这些作品里所有最出色的和最高尚的段落都不会出现。

[注释]

① 本文首次刊登在《俄罗斯通讯》1891 年第 1,2,3,4 期上,1894 年出版单行本,1901 年再版。单行本里增加了前言和附录,附录的内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片段选,这些片段与《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的主要思想直接相关,这就是在本文注释中多次提到的"附录"。本译文依据的版本是《论宗教大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后继者——列昂季耶夫,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第 73 - 183 页,莫斯科 1991 年版,该版略去了前言和附录。——译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第三版,圣彼得堡,1882 年,第 454 页。

③ 果戈理:《小品集》,第 2 部,生命。

④ 参见:伊万佐娃,《回忆 C.A.乌索夫的艺术观点》,载《哲学和心理学问题》第三卷,莫斯科,1890 年。

⑤ 在某些中译本中为"宗教大法官",可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第五节。1981 年版。

一

顺便指出,那是 1870 年,在 3 月 25 日给阿·尼·迈科夫(A.

H.Майков)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的构思，最近两年内他一直在思索这部长篇小说，现在他想利用闲暇时间把它写出来。他在信中说：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就是我给你写信时曾说过那个主题思想。这将是我最后一部小说。其篇幅同《战争与和平》一样，我想您会称赞小说的主题思想的，——这至少可以根据我们之间以前的那些谈话来猜测。这部长篇小说将由五个大型中篇小说构成(每个中篇小说15个印张；两年内，小说的计划我已构思成熟)。各篇相互之间完全是独立的，因此，甚至可以单独地投入销售。我把第一部中篇小说已经给了卡什皮列夫[1]：这里的故事情节发生在40年代。小说的总名称是：《大罪人传》，但每部中篇小说都将有单独的标题。贯穿每个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一生都在有意和无意地为之而痛苦的那个问题——上帝的存在。一生中主人公有时是个无神论者，有时是个信徒，有时是个宗教狂热者和教派分子，有时又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第二部中篇小说整个都将发生在修道院里。我把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第二部中篇小说上了。也许人们终于会这样说，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在说废话。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只向您一个人吐露：我想在第二部小说里把吉洪·扎东斯基(又译：扎东斯克的吉洪，Тихон Задонский)描绘成主要人物，当然是用另外一个名字，但还将是个在修道院里过隐退生活的高级僧侣。还有一个参与了刑事犯罪的13岁男孩，成熟的和荒淫无度的(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整部小说未来的主人公，被父母(我们这样的，有教养的人们)给关进了修道院，也是为了受教育。野蛮的小男孩－虚无主义者与吉洪相似(您是知道吉洪的性格和整个面貌的)。就在这里，在

修道院里,我把恰达耶夫也关进去(当然也是用另外的名字)。为什么恰达耶夫不能在修道院里坐上几年呢?试想,恰达耶夫在其第一篇文章之后(因这篇文章,医生对他每周都进行了检查)忍不住又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比如在国外,用法语,——这也是十分可能的,他会因此而被送进修道院里去住上一年。客人和其他人可能到恰达耶夫这里来看他。比如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Грановский),甚至还有普希金。(要知道我这里不是恰达耶夫本人,而只是把这个类型放在小说中。)在修道院里还有帕维尔·普鲁斯基(Павел Пруский),戈鲁博夫(Голубов),以及修士帕尔费尼(Парфений)(在这个世界里我是个行家,我从小就熟悉俄罗斯的修道院)。但主要的是——吉洪和小男孩。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这第二部分的内容转告任何人……我只向您吐露。对他人这可能一文不值,但对我来说,这是宝物。也不要谈论吉洪。我给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的信中谈到了修道院,但没有谈吉洪。或许,我能构造出一个伟大的,正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做的斜体),神圣的人物。这已不是康斯坦若格洛(Констанджогло,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中的人物——译者),也不是《奥勃洛摩夫》中的德国人[2];不是洛普霍夫们(Лопуховы),也不是拉赫美托夫们(Рахметовы)[3]。是的,我什么也不创造,而只是展示真正的吉洪,我早就真心地、热情地接受了他。如果成功的话,我将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功绩。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但为了第二部小说,为了描写修道院,我应该在俄罗斯。[4]

在这封信急促而散乱的字里行间,谁都能辨认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部分,这里有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的纯洁形象(显然,这是吉洪·扎东斯基被分割了的形象),成熟的和荒淫无

度的，但已不再是小男孩，而是年轻人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去修道院（地主米乌索夫显然是重新塑造了的恰达耶夫的形象），修道院的生活场面等等。然而，经常性的贫穷破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设想。他受紧迫的义务（他和编辑部、和书商之间签的协议）的约束，不得不加紧工作，尽管在他此间所写出来的作品里有许多出色的东西，但这一切都不是对其内心的梦想和已经成熟的计划的实现。显然，他一直在等待空闲时间，那时他才有可能从容地工作。除了缺钱外，他的敏感性也大大地妨碍了他的这个工作：他不能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学上的日常事务、忧虑和问题不闻不问，哪怕是暂时地。从1876年起他开始出版《作家日记》，以此创造了新的、独特的和优美的文学活动形式，在未来，在所有不安的时代，这个形式大概注定还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令人担忧的是，《作家日记》的巨大成功将完全无法使他集中于任何完整的工作之中，和许多其他计划一样，几年前就已深思熟虑的这个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的构思慢慢地开始消失，对它的热情自身也会减退。

从外部看，命运对伟人而言常常是十分残酷的，但是，命运总是小心地对待伟人身上内在的、深刻的和内心的东西。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是不会随着自己的载体而消亡的，甚至当死亡突然或偶然地临到这些载体面前，也是如此。哪怕是在死亡即将来临之前，思想的载体将受某种无意识的和无法抑制的心向的驱使，摆脱一切次要的东西，去做需要的事情——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在几千双期盼的眼睛面前[3]，慌乱的、充满激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沉默并自我封闭起来，"以便完全从事艺术创作"[4]；他安慰《作家日记》的读者说，不会超过一年，这一年是工作所必须的，此后他将重新返回和他们每天进行的谈话。但是，七年前

表达的预感[2]注定要成为现实:着手进行的艺术创作确实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甚至是最后一部没有完成的文学作品。在1880年和1881年分别只出版了一期《作家日记》——这是在特别活跃的时刻[3]和在长篇小说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的休息期间,第二部分应该"成为几乎是独立的整体"。在这个短暂的休息间隔里,他注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历程。"篇幅如同《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的最后几卷没能写出来。构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四个部分(包括尾声)的是14章,这是已完成的部分,但只是庞大的艺术史诗的第一卷。关于这部史诗的总体计划,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前言中写道:

> 尽管我写的主人公的传记(这个传记是长篇小说的内容)是一个,但却是两部长篇小说。主要的小说是第二部:这已是我的主人公在我们时代的活动,或者在我们当今时刻的活动。第一部小说的情节则发生在30年前[3],——这甚至几乎不是小说,而只是我的主人公青年时代的一个时刻。我无法越过这第一部小说,因为否则的话第二部小说里的许多东西都将是无法理解的。

显然,长期酝酿的作品的外部计划甚至被保存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实现这个计划所需要的一切也是现在做的:在187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著名的奥普塔荒漠的修道院(Оптина Пустынь),以便更新自己关于修道院生活的回忆。这个修道院的长老,阿姆夫罗西(Амвросий)神父的道德-宗教方面的威信还在支配上千人的生活,在这个长老的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发现了对他所构思的正面人物而言十分珍贵的和活生生的特征。但原初的计划经历了一些改变,其中有许多补充。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在自己的小说中展示的长老的正面形象不可能成为其中的核心形象,如他一开始打算的那样:这是个成型

的和静止的形象，它可以被描绘出来，但不能使之处在他向人们转述的事件的活动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长老佐西马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仅仅是被展示出来：他为自己所喜爱的见习修士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生活上的功绩祝福，之后就死去了。代替他而成为整个复杂作品的核心人物的应该是这个后者。[10]根据小说中的描绘，阿辽沙的道德形象是极其出色的。认为这个形象只是列·尼·梅诗金(Л.Н.Мышкин)公爵(《白痴》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重复，这将是个重大的错误。和阿辽沙一样，梅诗金公爵是纯洁的和完美无暇的，没有内在的运动，但由于自己病态的本性，他丧失了强烈情感，不渴求任何东西、不去寻找任何东西并实现它；他只是观察生活，但不参与其中。所以，消极性是他(梅诗金公爵)的突出特征，相反，阿辽沙的本性首先是积极的、与此同时这个本性也是清楚的和安详的。怀疑[11]，甚至是强烈的感情[12]和愤怒的能力[13]，——这一切在这个完整的人的形象里都有，同时其中还有对人的本性中各个方面的某种深刻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阿辽沙与每个和他有过关系的人接近、亲密。哥哥伊万和拉基金(Ракитин)，荒淫无度的老头，即他的父亲，还有小男孩科利亚·克拉索特金(Коля Красоткин)——都是他能够接近的人。但是，在深入理解别人的内心生活后，他在自己的内部总是坚定的和独立的。在他身上有一个不可破坏的核心，具有极强渗透能力的射线就从这个核心里发出，它们有能力与其他人内在的内容建立联系，与这个内容斗争，并战胜它。同时，这个已经十分强有力的人在我们面前还只是个少年——这是个令人惊奇的、在我们的文学里首次被展示的形象。无疑，《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中断了的结尾(或者准确地说，主要部分)把人的心灵的许多启示都带走了，在那里会有这样的话语，它们真正能够使生活之路变得清晰。但是这一点注定没有能够成为现实；在我们

所拥有的那部分小说里,阿辽沙只是准备实践功绩:他更多地是听,而不是说,有时只是在别人的话语里插入简短的评论,有时提出问题,但更多地是默默地观察。然而,这些特征只是勾画出了这个类型,但还不能充分展示它,所有这些特征安排得如此精确和真实,以致于这个没有结束的形象已经在我们面前显露出真正的生命。在这个形象里我们已经感觉到一个道德上的改革者、导师和先知,然而,他的呼吸在一刹那停止了,就是当他准备张嘴说话的时候——这是文学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假如我们想寻找这个形象的类似物,那么我们不是在文学里,而是在我们的绘画里找到它。这就是伊万诺夫(Иванов)著名绘画作品里的耶稣的形象:同样是遥远的,但已经是在与之接近的人们中间行走的,暂时还不显著的,然而已经是核心的并高耸于他们之上的形象了。阿辽沙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学里将被铭记,在遇到我们生活中任何稀有的和令人愉快的现象时都会出现他的名字;无论什么时候,假如我们注定得以复兴到新的和更好的状态,那么很有可能的是,他将成为这个复兴的指路明星。

如果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在小说里只是被勾勒出来,但没有被充分展示的话,那么他的哥哥伊万,既被勾勒出来了,也被充分展示出来了(《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这样,与没有来得及结束自己小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设想不同,这个人物成了他整个作品的核心人物,就是说只有这个人物才成了核心的人物,因为另外一个,掩盖着他的人物(阿辽沙)没有能够表现自己,无疑,也没有能够和自己的兄弟进行道德和思想上的斗争。因此,《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还不是长篇小说,其中的情节甚至还没有开始:这只是长篇小说的开场白,没有这个开场白"以后的情节将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根据开场白判断,全部作

品应该成为这样一部力作，在整个世界文学里很难找到与其类似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在自身里把"两个深渊结合起来——在上边的深渊和在下面的深渊"，只有他能够写出这场斗争的真实的和严肃的悲剧，——这个悲剧几千年来都在折磨人的心灵，——这是对生命的否定和肯定之间的斗争，是对人的良心的腐蚀和照耀之间的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这个斗争——在纯真的热情里，他带着这个热情创造了《穷人》[3]，在轰动一时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在西伯利亚的深林里，在服苦役的人中间，在欧洲的长时间的孤独之中，只有他才能同样有力地告诉我们"pro"与"contra"（赞成与反对）[1]；这是没有伪善的"pro"和没有徒劳的虚荣的"contra"。

就《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所透露出来的典型人物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长篇小说的典型人物都可以被看作是预备性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只是这样一个人物的最后的和完整的表达者，这个人物有时偏向于一个方面，有时偏向另一方面，但在以前都向我们描述过，有时是作为拉斯科利尼科夫（Раскольников）和斯维德里盖洛夫（Свидригайлов）（《罪与罚》），有时是作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Николай Ставрогин）（《群魔》），部分地还有韦尔西洛夫（Версилов）（《少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原型就是梅诗金公爵（《白痴》），部分地还有在《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里以其名义展开故事的那个人物：他们的父亲，"有一副衰落时代的古罗马贵族的面孔"，生了孩子又把他们抛弃了，是个爱好在"喝白兰地时"谈论上帝存在的人，但主要的是，他喜欢侮辱一切对人而言是隐秘的和宝贵的东西，这是斯维德里盖洛夫和老公爵瓦里科夫斯基（Вальковски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的形象的完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个怪诞的，但主要地毕竟是个高尚的人，是善与恶的混合物，但这恶不是深刻的，

只有他才是个新的形象;仿佛只有大尉列比亚德金(Лебядкин)(《群魔》)这个永远匆忙的和兴奋的人才有可能多少像他,当然只是从外部看。第四个兄弟也是个新的人物。斯麦尔佳科夫(Смердяков)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的不合法的产物,他是完整的人的一个片段,是精神上的卡西摩多(Квазимодо),是人的大脑和人的心里所拥有的全部仆人特征的综合。然而,主要人物的这个重复性不但无损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价值,而且还抬高了它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个心理学家,他不向我们展示日常生活(我们总是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寻找越来越新的东西),而只是向我们展示人的心灵及其难以捉摸的细微变化和过渡,在这些变化和过渡里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到一种继承性,并希望了解,思想的某个流向,某种心情在哪里解决和在哪里结束。从这个观点看,作为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具有无穷的意义。但为了彻底地理解这部作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活动所具有的一般意义,应该说上几句。

[注释]

① 卡什皮列夫:《曙光》杂志编辑,他曾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年的秋季前写出一部作品来。

② "我们怎么知道:也许只有吉洪才是我们俄罗斯的正面的人物,是我们的文学正在寻找的人物,而不是拉夫列茨基,不是乞乞科夫,不是拉赫美托夫等等。"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附加在信上的话。

③ 后两者是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

④ 参见:《传记与书信》,圣彼得堡,1883年,第二部分,第233-234页。

⑤ 关于《作家日记》的成功,参见其《传记与书信》中的数字资料,第一部分,第300页。

⑥ 参见:1877年的《作家日记》,12月份,《致读者》。

⑦ 参见上边提到的给阿·尼·迈科夫的信。

⑧ 关于普希金节日,1880年唯一的一期,这里有"关于普希金的讲话"以及对这个讲话的解释。

⑨ 应为13年前。——译者注

⑩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前言里,这一点也被肯定地表达了。

⑪ 参见在佐西马长老死后他的思考和言论。

⑫ 和拉基金的一次谈话,在这里作为一个"童男"他承认,他太理解"卡拉马佐夫式的疯狂"了。

⑬ 与哥哥伊万关于孩子的痛苦的谈话。

⑭ 参见1877年1月的《作家日记》里关于这一点的回忆。

⑮《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核心的两卷都是这个题目。

二

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我们整个最新的文学都出自于果戈理;更正确地应该说,它在自己的总体上是对果戈理的否定,是与他进行的斗争。如果从外部看问题,对艺术创作的方法、形式和对象进行比较,那么整个最新的文学是出自于他。和果戈理一样,整个后来的作家行列,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都只与现实生活相关,而不是与在想象中创造的生活相关(《茨冈人》,《见习修士》),与我们所有的人都处在其中的那个状态相关,与我们所有的人都处在其中的那些关系相关。但如果从内部看问题,如果在内容上把果戈理的创作与其假想的后继者的创作进行比较,那么必然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完全对立。是的,他的视线和他们的视线同样都指向生活:但他们在生活中所看见和描述的东西与他所看见和描绘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人的内心活动的细微理解不就是我们所有新作家的最明显的、稳定性的和突出的特

征吗？在行为的背后、在状态的背后，在关系的背后，在他们那里我们随处都能看到人的心灵，这是所有可见事实的隐藏的动力和创造者。心灵的不安、强烈情感、堕落和高尚——这就是他们经常注意的对象。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才有那么多的沉思，我们因此才那么地喜欢他们，并认为经常阅读他们的作品是最好的人性化教育手段。现在，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东西上，集中在这个特点上，我们再看看果戈理，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感觉到，在他的作品里这个特点本身是很不足的——只在这一个特点上，而且也只有在他一个人那里是如此。他把自己的主要作品称为《死魂灵》，超出任何预见，他在这个名称里表达了自己创作的伟大秘密，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伟大秘密。他是个善于描绘外部形式的天才作家，表现这些形式是其专门的、单一的特长，他魔法般地使这些表现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几乎是浮雕性，以致于任何人都没有发现，在这些形式的背后实质上没有隐藏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心灵，没有这些形式的载体。虽然他所描绘的社会是愚蠢的和卑贱的，虽然这个社会值得嘲笑；但是，难道这个社会不是由人构成的吗？难道对他来说生和死的非常因素，对整个活生生的人而言都是共同的感、爱和恨都已经消失了？假如说，当然没有消失的话，那么，这些人物（他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展现在我们面前）靠什么才得以响应这些非常的因素，感觉这些共同的强烈情感呢？这些人物身上的衣服是什么（我们在他们身上只看到这衣服），无论什么时候可以按照人性去欢乐、愿望、痛恨的，又是什么？试问，如果他们既没有能力去爱，深深地痛恨，也没有能力去经历恐惧、获得尊严，那么他们最终为了什么而劳动和收获，去某地旅行，倒腾东西？有一次果戈理描写孩子，——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都是不成体统的人物，同样也只是可笑的和被嘲笑的人物。有一次或两次，他

描写爱如何在人的身上觉醒,——我们惊奇地发现,唯一能点燃爱的是简单的身体的美,对男人而言的女人身体的美(安德列·布尔巴和波兰女人),这种美在瞬间发挥作用,过了第一个瞬间后,关于它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这里已没有了那些情感和话语,在我们民间忧郁的歌曲中,在希腊的诗歌中,在德国的故事中,在整个人间到随处都可以听到这些话语,只要人们还在爱和痛苦,而不仅仅是享受肉体。难道这是全人类的梦?而果戈理揭穿了这场梦,他掀开了梦幻,展示了现实。然而,这样想是不是更正确些,即不是人类在做梦,也不是他一个人看到了真理,相反,人类感觉到了和知道了真理,就是表现在所有民族几千年来的史诗中的真理,是他自己在做梦,并把这些病态的梦幻当作现实来向我们讲述。他的主人公在艰难时刻,在海关出事之后说道:

> 为什么我要像虫子一样消失呢?我现在算个什么?我能有什么用呢?现在我将如何面对所有受人尊敬的"成了家的父亲"?我知道自己白白地给地球增加负担,怎么能不感觉到良心的谴责呢?我的孩子以后会说什么?他们会说:"看,父亲是个畜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
>
> 众所周知,乞乞科夫十分关心自己的后代。这是个令人伤感的话题!孩子会说什么?要不是这个不知为什么自己冒出来的问题,别人也许不会如此深深地染指此事。这个未来的一家之主,像只小心谨慎的猫一样,用一只眼睛向旁边斜视,看主人会从什么地方出来,然后把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带走:不管是肥皂还是蜡烛。

多么可怕,多么绝望,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我们在农村和城市的墓地里没有看见那些老婆婆,她们坐在那里,在自己老头子的坟墓上哭泣,尽管老头子们留给她们的是自己穿过的破烂

衣服？无论在什么地方，孩子看见自己的父亲不久于人世，能到母亲身边问："我们会有财产吗？"难道我们民间的哀歌[2]中无可比拟的全部诗歌，丝毫不逊色的诗歌《伊戈尔远征记》都是谎言和杜撰？[3]这里描绘的是多么好的形象，深刻的内心忧伤，美好的希望与回忆！只有用昏暗和无生气的眼光去看现实，才能在看到这一切后，不去倾听这些声音，不去沉思这些哀号。果戈理就是用僵死的眼光看生活，他在其中看到的只是死魂灵。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绝对没有反映现实，只是以惊人的手法给生活描绘出一系列讽刺画：这些讽刺画因此才如此深刻地被铭记，任何真实的形象也达不到这样的程度。试看他给人们做的那一系列最出色的肖像，他们是生活中真实的人物，有血有肉，——您会铭记其中稀有的肖像；有一张十分出色的讽刺画，——再过许多时光，甚至在夜里醒来时，您也会回想起它，并会发笑。在那些肖像里有各种不同的特征的混合，有善的和恶的习惯的混合，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弱化，——结果在这些肖像里，任何鲜明的和清晰的东西不能引起您的惊奇；在讽刺画里着眼的是一个特征，整个人物只反映这个特征——既用丑恶的嘴脸，也用身体的不自然的痉挛来反映。这个特征是荒谬的，但却永远地被记住。果戈理就是这样的人。

对果戈理个性和命运的解释就在这里。在承认他的天才后，我们就怀着惊奇来研究他，当我们自问：为什么他不与任何人相像[4]，是什么使得他成为独特的，那么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这个独特的东西——不是他身上人的实质的过剩，不是我们本性的规范界限之外的力量的完满，相反，这是该本性中的深刻的和可怕的不足，是所有人都有的，任何人都不缺的东西的不足。他如此地封闭于自己的心灵之中，以致于不能靠它去接触任何另外一个心灵：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感觉到了外表的形式、运

动、面貌和状态的全部鲜明特征。他是普希金的朋友，是冈察洛夫和别林斯基的同时代人，是斯拉夫派最好和最纯洁时代的成员，关于他人们讲述道："他没有能够给自己的作品找到正面的人物形象"，我们自己从他那里能够听到强烈的、过分"明显的"叹息，为某种没有被实现的东西，为某种仿佛是"理想"的东西而发出的惋惜。这是不是语言中的错误，因此把应有的东西加上之后，我们就能猜到他的全部秘密？不是他不能找到和表达理想；他是伟大的关于形式的艺术家，他无力把某种活生生的心灵放人随便哪一个形式之中，他因为这个愿望才筋疲力尽。但他毕竟没有能够克服这个无法遏止的需求，——可怕的梦幻这时就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反常的乌里因卡(Улинька)和一个希腊人康斯坦若格洛，这既不像是梦，也不像是现实。于是，他渴望接触人的心灵，因此而导致筋疲力尽；关于他最后的日子，关于某种神经错乱，关于他忏悔的可怕痛苦，关于斋戒和饥饿的死亡，人们在谈论着一些不清楚的东西。[①]这是我们历史上经历的多么深刻的教训，我们却没有理解这个教训！天才的艺术家整个一生都在描绘人，但却不能描绘人的心灵。他对我们说，这个心灵是不存在的，在描绘僵死的形式时，他是以这样的艺术手法来做的，以致于我们事实上在几十年里一直相信，曾经有过整整一代行尸走肉，——于是我们便痛恨这代人，关于他们，我们毫不吝惜言辞，一个人只有在谈论无情的人时才用这些言辞。但他是这个欺骗的肇事者，并担当了惩罚，这惩罚对我们来说还在未来。他是作为自己本性上的缺陷的牺牲品而死的，——这个焚烧了自己作品的禁欲主义者的形象是他从自己整个奇怪的、如此不平凡的生活中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形象。"我把报复回报给自己"——这些话仿佛出自于壁炉里的响声，天才的狂人把自己对人的本性的天才的和应受谴责的诽谤抛入壁炉。[②]

不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东西，人们有时却怀着巨大的力量体验它。果戈理之后我们的整个文学都转向了对人的实质的洞察；——是否从这里，由这个反作用力量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个民族那里，人的全部内心深处都没有这样深刻地被揭示，如在最近几十年什么亲眼见到的那样？最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当你从果戈理转向某个新的作家时就会体验到它：仿佛你是从死人的墓地走向盛开的花园，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声音和颜色，充满阳光和自然界的生命。我们第一次听到人的声音，看到人的脸上的愤怒和喜悦，了解到人们的面貌有时是多么的可笑；但我们毕竟爱他们，因为我们感觉到，他们是人，因此是我们的兄弟。在屠格涅夫的一系列微型短篇小说里，还是那些村庄、田野和道路，《死魂灵》里的主人公也可能在这条路上行驶，还是那些小县城，他就在这里签署自己房产的契约。但在屠格涅夫这里，这一切都活着，都在呼吸和运动，享受和爱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还是那些庄稼汉，但这已经不再是些白痴，为了驱散乱作一团的马，他们不知为什么骑上它们，并用棍棒打它们的脊背；我们看到的是仆人和农奴，但这不是永远在散发一股味道的彼得鲁什卡(Петрушка)，也不是谢里凡(Селифан)，关于这个谢里凡我们只知道他总是醉醺醺的。这是多么丰富多彩的性格，忧郁的和开朗的，充满着实际关切或细微诗意的。细看他们的特征，都是活生生的和有个性的，我们就能理解自己的历史，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整个周围的生活，——理解如此丰富地从这个民族内部生长出来的东西。在奥勃摩洛夫的幻想里，在涅塔奇卡·涅茨万诺夫娜(Неточка Незвановна)的回忆里，在《童年和少年》里，在《战争与和平》的场景里，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热心的陶丽(Долли)身上向我们展示的是个多么美丽的儿童世界；难道这一切比阿尔基特(Алкид)和费米斯托

科留斯(Фемистоклюс)更少现实性?后者是些可怜的木偶,是对这样一些人的辛辣嘲弄,还没有任何人对他们进行嘲弄过。鲍尔康斯基(Болконский)在奥斯杰里茨克(Аустерлицк)田野里的思索,他妹妹的祈祷,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惊慌,整个复杂的,丰富多彩的,无限深刻的思想、性格和状态的世界,在最近几十年里向我们展示出来了,针对果戈理,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能说什么?我们用什么语言来确定这个世界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对生活的揭示,这生活在果戈理处已经消失,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恢复,在果戈理处,这个尊严被剥夺了?

[注释]

①《死魂灵》,1873年,第258页。

② 参见《北方边区哀歌》,由巴尔索夫搜集。《雅拉斯拉夫哀歌》是《哀歌集》中最具诗意的部分,显然它是从民间哀歌中转移到这里的。试比较语言、形象、口语说法

③ 这几个问句的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说果戈理此处所看到和描绘的都不是事实:人不能像虫子一样死去(贫穷的老头子死后也有老婆婆们在惦记着);小孩对行将死去的父亲也不能如此无情;民间诗歌中描绘的都是真实的东西。作者想说明,果戈理没有注意到这一切。——译者注

④ 在《与友人书信选》里实际上可以找到确定其创作的内在过程的所有根据。一个十分清楚和准确的地方是:"我已经摆脱了自己许多缺点,所依靠的是,把它们转交给我的主人公,我嘲笑他们的这些缺点,并迫使其他人对这些缺点也嘲笑一番……还可以向你解释的是,为什么我至今没有给读者描绘令人安慰的现象,没有选择美德高尚的人作为我的主人公。**在脑子里是无法杜撰出**他们的。只要你自己不与他们多少有些相像,只要你还没有靠恒心和力量获取几种善良的品质,那么关于你自己的事情所描写的一切都是僵死的。"(《关于"死魂灵"给四个不

同的人的信》，第三封）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塑造其作品中所有人物形象的主观方法：这些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心灵特质的向外表达，至于说它们是对某种外部的东西的临摹，这甚至都没有被提到。这个塑造过程自身也是这样被决定的：抓住单一的缺点，其实质在主观生活中很熟悉，然后给它加上实例，或者是"带有道德"的实例。清楚的是，这个人物形象的每个特征在自身中都仅仅以自己的方式反映这个缺点，因为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没有另外的目的。这就是讽刺画的实质。

⑤ 参见伊·谢·屠格涅夫在《文学回忆录》中关于他的回忆（这是个多么聪明和多么病态的人）以及布斯拉耶夫（Ф. И. Буслаев）的回忆：《我的余暇》，莫斯科，1886年，第二卷，第235－239页，这里重复了果戈理具有历史性的话，这些话是（在死前几天）说给喜剧作家谢普金（Щепкин）的："永远成为这样的人"。

⑥ 指果戈理焚烧自己的著作。——译者注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开始谈论最令人窒息的形式之下的生活，还有人的尊严，这尊严在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也被保留着。在微型的和俊秀的故事《诚实的小偷》[①]里我们看到两个人物，这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人，但我们却不注意他们。贫穷的角落，简单的话语和事件，都是十分常见的——所有这一切仿佛是从某个遥远的世界落到我们心灵上的光线：我们暂时会忘记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仔细观察这光线。以前我们只是从外部了解到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甚至能看见在他们身上跳动的心脏。几分钟过去后，这光线又消失了，我们又返回到自己思想的平时进程之中，但在这些思想里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再可能存在了，而某些东西则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是——为人的实质的担忧，无论这个实质离

我们多么遥远、不再可能的是——对人的鄙视，无论我们在哪里遇到他。在我们所吸收的全部智慧里，在自己概念的整个高度上，我们有时突然停止，并问道：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那么纯洁吗，我们的心是那么热情吗，像我们在短暂的一刻所见到的，但永远铭记的那些平庸而贫穷的人们一样？于是使徒的话："若天使用你们的话语说话，但如果在你的话语里没有爱，那么这些话语将是鸣的锣，响的钹"[6]——对我们来说从来也没有如此清楚；我们明白，在这句话里给出了善与恶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永远也不能毁灭，我们把这标准用于检验各种智慧。

谁能在我们身上唤起理解，谁就能在我们身上唤起爱。我们跟着作者走，并下降到人的生存的浑浊的世界，人的生存至今一直对我们隐藏着，我们将和作者一起研究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就在这个浑浊的生存世界里忙碌着。他对我们说：

> 您曾以为，他们不再痛苦，也不再感觉任何东西，那么您就听一听他们的语言，看一看他们的面孔：难道您自己会这样感觉，难道在艰难的时刻您在周围的人中间遇到过这样的同情吗，在这个黑暗里，在这个寒冷里，他们就用这种同情相互温暖？请看，在他们心中有种什么样的信仰，他们远离软弱的抱怨，很少怨天尤人，并忍耐地承担着自己的十字架。您曾以为，他们只是干活和吃饭，而把思想和愿望都交给了您吗？不，在他们身上有我们的所有强烈情感，他们能够理解许多您所不理解的东西。他们是和您完全一样的人，他们保留了许多您已丢掉的东西，在您所获得的东西里，只有很小一部分他们没有来得及获得。您看到了他们：现在就上路吧，如果可能的话，您就忘记这个世界吧。"

当您忧郁不决地停下来的时候，他就用锐利的目光看您，并继续说：

您怎么不走了，是什么阻碍您？请记住在您身上被唤醒的东西，在您的思想中，永远也不要忘记：良心——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有，也在这些人身上。您看见的不是已经疲劳的手，不是寒冷的腿，不是空空的胃。您在自己面前看见的是上百万的人的心灵，当您想到，它们只需要温暖，喂养和安慰，——请回忆一下，您现在忘记了等待您自己的梦和食物，(您才需要这些东西呢)。我说完了。现在走吧，去研究您的哲学或古董吧。我则和他们在一起，假如我们不能分担他们的劳动，那么就分担他们的痛苦，也许总有一天我会为他们的喜悦而欢乐。"

透过重新包围您的哲学和历史的兴趣，透过艺术和文学里吸引您的整个美的世界的光辉，您从那时起有时就能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您就会记起一个奇怪的人，他有一次把您领进这样一个世界，它和您所知道的一切都不相像，他说出自己忧郁的话语后，仍留在那里。他是否强大有力，他在那里做什么，这几千年的历史是在什么之上经过的，我们的文明又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在闲暇的时刻您拿起他小说，以便更仔细地看他的面孔，试验一下他的肌肉的力量，他的思想的牢固性。

摆在您面前的是他的一系列中篇和短篇小说。有多少可笑的和严肃的东西，有时是不能容忍的荒谬的东西[3]：仿佛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准备说点什么之前，先是唾沫四溅，并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但话语很快被理顺了，您将忘记无用的东西，并理解话语的含义。这是多么丰富的情感，对人应该理解的一切最重要的东西的多么深刻的理解。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忧郁的和可笑的田园生活(《脆弱的心》)，散发芳香的诗歌《白夜》和没有完成的中篇小说中热烈的情感，其中疯狂的音乐家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在城市里黑暗的街道上奔跑(《涅塔奇卡·涅茨万诺夫

娜》)。还有充满真正欢乐的短篇小说《小英雄》(第2卷);我们看完这部小说后,就能了解到,这是在古堡监狱里写成的,就在审判和判决之前、也许是在死刑之前几个星期。于是我们不自觉地想到:"是啊,这是个严肃的人";"无论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创作在这个世界里继续,即使是面对坟墓,这个世界都是牢固的。"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并不是完全徘徊在我们把他留在其中的那个世界里,他很轻松地上升,在这里他几乎只是研究儿童世界(《涅塔奇卡·涅茨万诺夫娜》里的公爵小姐卡佳,《圣诞树和婚礼》中的包税商的女儿)。看到这个光明的和天真的世界后,他也变得清醒和活跃,就像在平庸的穷人中间一样;在他身上看到的还是那种为这个世界而产生的不安,这如同为那些被人们遗忘了的人们而产生的不安一样;当成年人走近这个游戏的世界时,他的目光变得不信任和阴郁。请看,这就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Юлиан Мастакович)、他扳着手指计算女孩的年龄和他为这个女孩所付出的资本的利润,他在儿童晚会上偶然了解到这个资本的数额:

这个重要的显贵低声说:"300,300……,11岁,12岁……5年后是16岁;假定利润是4%——12,12再乘5=60,对,就用这60……但是这个骗子不会坚持4,可能是8,或者他要10……"[①]

计算终止了;他在小孩的行列里悄悄走近摆弄玩具的孩子,并吻这孩子的头,用不安的声音说:

"可爱的孩子,您在这里做什么"。

儿童晚会在客人们兴奋的惊异中结束,他们感动地看着这个重要的显贵与富有的包税商的孩子之间礼貌的谈话。读者的眼睛闭上了,五年后重新睁开:这是一个阴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总是这种天气),教区的教堂,美丽的、刚刚打扮过的姑娘

和迎接她的未婚夫，人群中低声谈论着未婚妻的财富，未婚夫的尽管多少有些衰老，但却以熟悉的特征向作者解释了一切，——他回想起五年前的儿童圣诞树，那是个寒冷的夜晚，新年的前夕。

还是在这个晚会上，在愉快的孩子中间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一个胆怯的小男孩，主人家的家庭女教师的儿子，这孩子极其渴望到其他孩子跟前和他们玩，这些孩子却躲避他。孩子的大脑已经理解地位的差别，孩子的本性却驱使超越这些差别。他是一副胆怯和巴结的样子，要知道这样的晚会不会在近期重复，于是他就靠近其他孩子们，把来自他们的委屈隐藏起来，奉承地献媚，只希望他们不把他从自己身边赶走。您会感觉到，金钱与财富——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都可以被置于身外；作者的目光专注地指向在这一切的下面存在和活动的东西——指向人的心灵，它的最初的痛苦，最初的歪曲。

"但他是强有力的吗？……"在一个有些虚构的随笔中（其情节和基调后来在《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中重复），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幻想家和一个被遗弃的姑娘见面的故事。多么奇怪的见面，多么深沉而热情的坦白，这两个孤独和纯洁的人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在我们的全部文学里找不到如此深刻地触及人的心灵的内在世界的中篇小说，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感觉不到人世的生活，看不见人们喧闹的忙碌。只有那些没有月色的北方夜晚在看着他们，他们自己也是以纯洁的良心相互洞察。但是，当他向她说些毫无联系的话语，并指向天空时，一个阴影在他们周围闪过。这是第四个夜晚，是他们的第四次见面。她靠近他，她的手在颤抖。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他曾爱过这个声音，习惯了胆怯地服从这个声音：她尖叫着扑向她认为永远失去了的人——扑向自己出现了裂痕的爱，她相信热烈的爱的复苏和回归。

幻想家剩下一个人；他回到家里。他觉得在其孤独的角落里一切都已老化，——他自己，他房间的墙壁，还有邻居的房子。在热情的和恳求的信中她向他解释这一切，并请求不要责备她，也不要忘记她，——她自己也保留着关于他的永久记忆。信从他的手中脱落，他捂住了脸：

"……或许是阳光突然从乌云里探出头来，又躲到云的后面，于是一切又在我的眼里黯然失色；或者也许是我未来的整个前景在我面前如此凄凉和忧伤地闪过，而我看见自己就像过了整整十五年之后这样衰老，还在那个房间里，还是那样孤独，还是和玛特廖娜一起，她在这些年里丝毫没有变得聪明。

但是，要我记住我的委屈，娜斯简卡！要我把乌云都驱赶到你那清净安宁的幸福之上；要我痛苦地责备你之后，把忧伤驱赶到你的心里，用暗中忧伤刺痛你的心，并迫使它在幸福的时刻悲伤地跳动；要我把哪怕是这些花朵中的一朵捻碎，你曾将这些花朵编在自己黑色的鬈发里，当时你带着这些花朵走向祭坛……哦，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永远不会这样做！愿你的天空晴朗，愿你迷人的笑容明朗而不忧伤，你将获得祝福，哪怕是因为你曾让另外一个孤独而感激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与幸福。[5]

这些话仿佛是用月光编织出来的，不是吗？在这些话里还是那种安宁，还是那种自我限制，还是那种只因别人的幸福而高兴的准备。

但突然又是这样的声调："我是病人……我是'凶恶'的人。我是个不引人注意的人。我觉得我的肝有病。"[6]从地下室里传出了模糊不清的隆隆声。我们再翻过几页，

> ……我坚信，不但有许多意识，甚至任何意识都是病。我坚持这一点。我们连这一点也抛开一会儿。请您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当我最能意识到'一切美好而崇高的'所有细微之处时，偏偏在这些时候，我却不是去意识，而是去做这样不光彩的事，尽管人们都在做这些事，但这些事却偏偏在我最能意识到完全不应该做这些事的时候，发生在了我的身上，这是为什么？我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善和全部'崇高而美好'的东西，我就越是深深地陷入到我的泥潭里，不能自拔。[2]

再翻过几页：

> ……意识的合法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惰性。我特别要重复说：所有直爽的人和活动家之所以是积极的，那是因为他们迟钝和短见。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应该这样解释：由于自己的目光短浅他们把最近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原初的原因；这样，他们比其他人更快和更轻易地相信，他们为自己的事找到了无可靠争议的依据，——于是就安心了，要知道这就是主要问题。要开始行动，事先应该完全是心安理得的，也不要有任何怀疑。那么，比如我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我所依靠的原初原因在哪里，依据在哪里？我从哪里去找它们？我在思想里进行锻炼，因此在我这里，任何一个原初的原因立即就会引出另外一个更原初的原因，等等，直到无穷。一切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就在这里。因此，这又是自然规律。

在这里闪现的是可耻的坦白和天才的辩证法，展示的是金针，寂寞的克列奥巴特拉(Клеопатра)用它们刺自己女奴的乳房，回响起著名诗歌的诗句：

从迷误的黑暗中，

我用信念的热情话语，

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灵魂……

在软弱无力地平躺着的、兴奋的，之后是歇斯底里的姑娘的身体上，出现了一个忧郁的人物，他没有名字、没有形象，他喊到："我是人"。

是的，您会以为，这个人是强有力的。在其中产生了如此不同的各种声音和形象，以及所有这些思想的心灵，——确实能够与人有能力与其进行斗争的一切进行较量。他可能不被人听见，可能不被理解：任何一个先知也不能把荒漠上的沙子变成敏感的听众。但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沙子不能永远在那里存留，——那时就会出现他的收获。

和这个如此吸引我们的作家一起的还有一批作家。如通过梦幻而思索的冈察洛夫，他拥有对人的优美的爱，在阳光明媚的时刻，在神的无限的世界里注视着其中的一个角落，并慢慢地描绘着自己的图画，既没有发现这阳光，也没有发现这世界。还有忙碌的和软弱的屠格涅夫，是个极有天赋的人，进行了许多思索，把我们引入到自己迷入的语言世界，随随便便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却深刻地为人铭记，他描绘出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多少有些贫穷，但总是吸引人的。最后还有托尔斯泰，他的威力仿佛是无限的，他展现了人的生活的整个辽阔的全景，在这里，这个全景最终获得了坚固的形式。我们在犹豫；尽管我们沉醉于实现自己的使命，丝毫不溜号，但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强烈地把所有的人都引向自己。如果与这些作品比较一下，那么我们企图研究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作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他的形象常常遭到歪曲，他的语言缺乏和谐；这仿佛是一种混乱，量和数都还没有加在其上，或者仿佛在其中已经混淆了所

有的数和量。当我们看托尔斯泰的世界时，我们的犹豫更为严重：在这里，不仅仅是作品的一个难以表达的美在吸引我们，还有某种其他的，更深刻的和更迷人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他触及到了自然界的埃琉西斯秘密（Элевзинские таинства），俯在大地—母亲（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是从这里来的）身上，倾听荒凉的声音，观察模糊的影子。他努力捕捉每个生和每个死的意义，人的可怜的生存就包含在生和死的狭窄的田地里。但古老的传说告诉我们，就是在真正的埃琉西斯农庆（Элевзинии）上，生和死的意义也是从远处，以隐喻的形象向奉献者显现的。看来，人注定永远要受到这一限制。

无论美的世界有多么吸引人，还有某种比它更吸引人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堕落，生活的奇怪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深刻地淹没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和谐的音符。人类几千年的命运就发生在这个不和谐的各种形式之中。如果我们看看世界文学，那么就能发现，其中任何人的视线都没有如此深刻地指向这个不和谐的原因，如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因此，在他的作品的整个混乱中（然而我们在任何人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完整性和完满性），有他身上的某种亵渎神明的，但同时又是宗教的东西。他不在自然界里选择任何画面，以便去爱它和描绘它；他所感兴趣的只有连接所有这些画面的缝，作为一个冷静的分析家，他研究它们，并想了解，为什么上帝的世界的整个形象是如此地歪曲和不正确。他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在自身中把对一切受苦之人最热烈的爱的情感与这个分析结合在一起。仿佛发生在上帝世界上的歪曲特别深刻地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并触动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也明显地感觉到"真正的被造物"在自身中承担的一切痛苦，谁也没有像他这样，他接近了对这个痛苦的隐藏着的实质的理解。由此产生出其作品深

刻的主观性和它们的古怪性：他不是从外部召唤我们来和他一起分享自己的兴趣（我们可以和任何其他人一起关注这些兴趣），他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处传到我们这里的，当我们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孤独的和古怪的人，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其他人，这个人和我们谈论人的本性中无法忍受的痛苦，谈论对这些痛苦的忍受之完全不可能性、谈论寻找一切途径以摆脱这些痛苦的必要性。由此、才有其所有作品中病态的基调，缺乏各部分之间的外部和谐，他所揭露的难以消除的痛苦的世界与这样一个思考交织在一起，就是关于这个痛苦的世界的无法理解的原因的思考，关于这个痛苦的世界的无法认识的目的的思考。

正是这一点赋予给他的作品以永恒的含义，永不消失的意义。现在去研究比如屠格涅夫所描绘的典型人物，这将是一种时代错乱现象，尽管从创造这些人物至今并没有过去几年：这些典型人物迎合了自己时刻的利益，在当时被理解了，目前在这些人物的背后留下的只有艺术上的魅力。我们爱他们，他们是活生生的形象，但我们在他们身上已经无法猜测到任何东西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们找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弥漫在他的作品里的惊恐和怀疑就是我们的惊恐和怀疑，它们相对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在生活过得特别轻松的时代，或者生活的艰难还没有被意识到的时代，这位作家甚至可能完全被遗忘，其作品也不为人们阅读。但是，每当在历史生活的道路上陷入窘境的时候，每当在历史道路上前进的各民族受到某种震动或者遭受窘境的时候，这位关于这些历史道路进行过许多思索的作家的名字和形象就会出现，并且丝毫也不丧失力量。

他呼唤我们去这样的地方——歪曲和痛苦的世界，去研究自然界借助它们而被连接在一起的那些缝隙，确实可以到这样

的地方去，但必须忘记在艺术和诗歌中展现的美的世界，忘记科学的冷漠的领域，这些领域过分远离我们可怜的大地，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这可怜的大地。要知道到那里去——就意味着满足自己心中最深刻的需求，不知为什么心与痛苦有渊源关系，它对痛苦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倾向；带着这个目的到那里去，——这就意味着满足理性的最主要的询问，透过科学和哲学企图用来分散其注意力的一切，他再三地表达了这个询问。

[注释]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882 年，第 2 卷，第 463 页及以下的页码。下面我们在指出卷数时，都是指这一年的版本，这是他去世后的第一个版本，也是至今最好的版本。

② 试比较汉语和合本《圣经》，《哥林多前书》13:1，"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意思与现代俄文版《圣经》一样。——译者注

③ 比如《全集》第 2 卷中的《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和《女主人》。

④《全集》，第 2 卷，第 485－486 页。

⑤《白夜》，《全集》第 2 卷，第 539 页。

⑥《地下室手记》，《全集》第 3 卷，第 443 页。

⑦ 同上，第 446 页。

⑧ 参见：《地下室手记》中的《漫画溯雪》。《全集》第 3 卷，第 472－538 页。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唯一与它可以类比的是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描述"地下室主人公"的性格的最初随笔是中篇小说《斯杰潘奇卡村及其居民》中的福马·福米奇(《全集》第 3 卷)。

四

1863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黎逗留[1]，他离开巴黎几日，去参观伦敦和正在这里举办的一个国际博览会。在一篇从外表上

看有些杂乱，但实际上很有条理的和集中的文章里，他转达了这座"昼夜忙碌和像大海一样辽阔的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汽车尖叫着和轰鸣着，在街区住户之间延伸的铁轨，还有自己混乱的运动和构思的威力。"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被煤烟熏染的空气，富丽堂皇的街心花园和公园，可怕的城市角落，如魏特察贝里（Вайтчапель），还有半裸着的，粗野和饥饿的居民"——这一切在他那里形成了一副完整的画面，其各部分间是不可分割的。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除了个别的和忙乱的兴趣外，他对这副画的一般含义，它的永恒意义进行思索：您会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在这里它把所有这些无数的，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连接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您会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思想；您会感觉到，在这里某种目的已经达到了，这里有胜利，庆典……于是您就会不知为什么而感觉到可怕。您会想，这是不是在事实上已经达到的理想？这是不是终点？这是不是事实上的"'统一的羊群'"……您的精神会受到一种压抑：这一切都是严肃的，胜利的和高傲的。您看这几十万人，这几百万人，他们顺从地从世界各地涌到这里，他们带着一个思想来到这里，安静地，顽强地和沉默地聚集在这个庞大的宫殿里（指的是水晶宫展览馆），您会感觉到，在这里有一种东西已经彻底地实现了，实现了并结束了。这好像是个圣经中的画面，关于巴比伦的东西，出自《启示录》的某个明显地实现了的预言。您会感觉到，需要进行许多长期的精神上的反击和否定，才能不至屈服和顺从印象，不至崇拜事实，也不神化巴尔（Ваал），即不把现存的当作自己的理想。"[2]

在他所观察到的一切里，他都看出一种独立产生的，因此是强大的东西，而一切借用来的，因此是软弱的东西，他都放过了。在罗马，他想见教皇，但在伦敦他甚至没去看保罗大教堂。不过他访问了"白种黑人的安息日"，他这样称从星期六到星期天的

城市工人街区的夜晚：

> 50万男女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像海洋一样涌动，整夜都在庆祝，直到早上5点，吃饱喝足了，把一周该吃该喝的都吃了喝了。这一切就是他们自己每周的经济收入，这是靠沉重劳动和训斥而获得的一切……最粗壮的瓦斯火把在燃烧，把街道照得通亮。舞会正是为这些白种的黑人举办的。人们聚集在敞开的小酒馆和街道上。在那里吃着喝着。啤酒馆收拾得像宫殿。一切都处于醉态，但没有欢乐，只有忧郁、沉重，——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奇怪地沉默着。只有漫骂和流血的打架有时候才打破这可疑和沉默，这沉默忧伤地作用于您。所有人都匆忙地急于喝醉，直到失去知觉……妻子们并不落后于丈夫们，也和他们一起喝得大醉；孩子们就在他们中间跑着，爬着。"[③]

他发现，在知觉的丧失中有一种"系统的，顺从的，受到奖励的东西"。他也企图用自己概括的大脑捕捉这一事实的隐藏着的意义，把它与他白天所见到的，因自己的完成性，自己的完善而自豪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种热气，这种令人难受的淫荡，这种哪怕是在一周的几个小时里忘记自我的渴望，他觉得所有这一切就是上百万人的灵魂，他们被堆放在建好的塔的角落，确实，这塔几乎通天，然而将急剧地倒塌在地上！对这些遭到社会遗弃的人们来说，"预言长期不能实现，他们长时期内得不到棕树枝和白衣，他们还要长时间地祈求至高无上的神的祭坛：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④]

至于圣经上的形象，——这不过是历史和哲学所能想到的对事实的最高度的概括；"棕树枝和白衣"，——这只是对几百万受压迫的人的喜悦和光明的渴望，这些人现在是庞大机器的必要的附属物，这些机器包含着某种自我意识的完全是无用的遗

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完整性和完满性上理解事实的：他看到的不是冰冷的腿，不是疲惫的手；他看到的是被压迫的人，并问道：难道他不也和我们一样，在渴望，并配得上精神的喜悦吗？没有他们，我们是无法生存的。

这只是被压迫的，但还没有变坏的人们：上帝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暗淡了，但至少还没有被歪曲。他参观了盖－马尔凯特（Гай－Маркет），夜里有上千个妓女聚集在这个街区里。灯火通明的街道，用镜子和黄金装饰的咖啡馆，这里同时是

> 聚会和栖身之地；进入这群人当中是可怕的。这个人群的构成是奇怪的。这里有老婆婆，也有美女，你会惊异地停留在她们面前。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像英国女人这样美丽的妇女。人行道装不下这么多人，于是他们就聚集在大街上，这里十分拥挤、稠密。他们都在等待猎物，恬不知耻地扑向第一个遇到的猎物。这里既有漂亮的昂贵衣服，也有几乎是破烂的衣服，年龄上区别很大，——一切都混在一起。在这个可怕的人群里有醉醺醺的流浪汉，显贵的富人也到这里来光顾。能够听到谩骂声，争吵，强迫，以及多少有些胆怯的美女那温柔的、耳语般的邀请。有时也竟然有这样的美！

他描绘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外表，她有一张沉思的、发育成熟的脸，她喝过了杜松子酒；在她旁边坐着一位年轻人，显然是这个街区的生疏的光顾者。“在她那美丽的，多少有些高傲的目光里有一种深藏着的东西，有一种思索着的和思念着的意思。她因自己充分发育的面孔而高于这不幸的女人群，也不可能不如此；否则人的面孔将意味着什么呢？”[2]可以看出，年轻人在这里寻找过她，或者这是个预定的约会。两个人都那么若有所思，都那么忧郁，只说些只言片语，常常是沉默；显然，有某种重要的事情在

他们之间成了没有被说开的。最后，他站了起来，付了酒钱，握了她的手，就走了；在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也消失在从事不正当职业的这群妇女之中。

在盖－马尔凯特(Гай－Маркет)我发现了这样一些母亲，她们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去干不正当的事。小姑娘们都12岁左右，她们抓住您的手，请求您跟她们走。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姑娘，不超过6岁，浑身是破烂衣服，她很脏，赤脚，枯瘦，还被毒打过：透过破烂衣服就可以看见她身体上的青伤。她走着，仿佛忘记了自己，不慌不忙。天知道她为什么在人群里闲逛；也许她很饿。谁也不注意她。但最令我惊奇的是，她走在路上是这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在她脸上是这样一种绝望的神情，以致于看见这个在自己身上携带着这么多的诅咒和绝望的弱小的孩子，甚至有些不自然，极其地痛苦。她一直在左右摇动自己蓬松的头，像是在议论什么，分开自己的小手，做着手势，突然又把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自己裸露的胸前。我返回来，给她半个先令。她拿过银币，然后羞愧地，怀着恐慌的惊奇看我，突然急忙跑开，仿佛是怕我把钱从她手里夺回来。

我们可以重复这句话："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国际博览会，水晶宫，那里的某个地方还有个著名物理学家的讲演，出色的实验——这一切是否低得上用瘦弱的手捶打自己前胸的小孩的痛苦，还有这些妇女的痛苦，她们把年幼的女儿交给任何一个为此付了一个铜板的人。人们会说："一直都是这样，甚至有时比这还糟糕"；他们这是为了辩护，并引证未开化民族的野蛮残暴，我们当然不愿意回到这样的野蛮状态，因此我们仿佛应该容忍自己的恶，文明的独特的毒素。但这是谎言，并不非一直都是这样。在按照上帝的训诫生活的民族那里既没有野蛮残暴，也

没有卖孩子的母亲；那里的母亲在拾富人故意丢在田里的麦穗。[7]在我们这里也没有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话："首先寻找上帝的国，其余的一切都将加给你们"。[8]假如我们不是从结尾去解读，不是相反地使用这句话。

> 但是，当黑夜过去，白天到来时，还是那个高傲的和忧郁的精神重新又庄严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城市。它不关心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关心白天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事情。巴尔城在实行自己的统治，甚至不需要服从，因为它深信这个服从。它对自己的信仰是无限的：它鄙视地和安稳地发放有组织的施舍，只是为了解脱。它自己不回避野蛮的，值得怀疑的和令人不安的现象——贫穷，痛苦，抱怨，大众的迟钝，丝毫不使它感到不安。"（同上，第411页。）

对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因它们而引起的不安，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每个发展的正常过程里，发展主体自身的幸福安康是目的；比如树在成长，目的是实现自己形式的完满，——关于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这样说。在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所有过程里，这个规律只在一个过程里被破坏了，——这就是历史的过程。人是这个过程里发展着的主体，因此他是目的；但这只是在思想里，在幻想中：实际上人是手段，而目的是——机构，复杂的社会关系，科学和艺术的世界，工业和商业的威力。[9]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可遏止地发展着，一个贫穷的人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哪怕是随便某个时候不让这一切轻视自己，不睡在巴尔城中装饰华丽的车前，不把血溅在车轮上。[10]人群在车前流动；这车压死了上百万人后，已经去了其他国家，到那些野蛮人那里去，他们至今还天真地、孤独地相互蚕食，看来，现在欧洲准备一下子就把他们吃掉。

对一切个别的和个体的东西的敏感的理解力以惊人的方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与最高的概括能力相结合。所以，他不但理解了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普遍的和主要的意义，而且还感觉到了这个事件的难以忍受的恐怖，仿佛他自己体验到了由于对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破坏而导致的所有个性痛苦。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1]之后立即出现了我们在上边已经提到的忧郁的《地下室手记》[12]。

阅读这些札记，不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必须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注释版，这不是在文学作品的形式和产生方面的注释，这样的注释已经有了，而是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意义方面的注释，——以便最终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想法是否正确，或者它是错误的，为什么？而且是靠综合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充分地和严格地解决它，就像只有在科学里才可以达到的那种解决。比如，《地下室手记》的每一行都是重要的，几乎不能把它归结到通用的公式里；同时，任何一个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去讨论其中所发表的见解。

在我们的文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其理想彻底地脱离当前的现实。维持现实，只是在某些地方改变它——这个思想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由于自己大脑的概括的性格，他带着全部兴趣关注恶，这恶隐藏在历史地产生的生活的一般建制之中；他对企图通过个别的改变而改善什么东西的一切希望的厌恶和藐视就由此而来，他对进步党派和西方派的敌视就由此而来。由于只观察一般的东西，他便从现实直接过渡到思想中的极限，他在这里找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即借助理性建立人类生活的如此完善的大厦，以便它能给人以安慰，结束历史，根除痛苦。对这个思想的批判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但这个批判第一次，而且是最详细地表述在《地下室手记》里。

地下室里的人——是个走进自己深处的人，他痛恨生活，恶毒地批判理性的乌托邦分子的理想，其依据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确知识，他从对自己和历史的孤独的和长期的观察中获得了这个知识。

这个批判的一般意义是这样的：人在自身中，以隐藏的方式，携带着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萌芽的复杂世界，——它们的显现如此不可抗拒地将构成人的未来历史，就像现在在他身上确实存在这些素质一样。所以，我们的理性对历史及其圆满结束的预见永远只是一组没有任何实在意义的词汇。

在这些在业已实现的历史中已展现出来的素质之间，有许多不可认识的奇怪的、非理性的东西，以致于无法找到能够满足人的本性的任何理性公式。幸福是不是建立这个公式的原则？难道人有时不是在追求痛苦吗，难道有这样的享受，哈姆雷特可以为了它们而交出自己的意识痛苦吗？秩序和计划构成了人类关系的一切完成了的建制的共同特征；然而，我们有时不是更贪婪地喜欢混乱，破坏和无序，而不是合理性和建设性吗？难道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只做好事和应该的事，在长期地这样局限自己后，他能不体验到一种奇怪的厌倦吗，于是想过渡到无意识行为的幻想，哪怕是不长的时间？最后，对一个人来说，当对新事物的感觉，以及所有突如其来的，所有希奇古怪地改变的东西都消失的时候（要知道他的生活之路与这些东西已经获得一致），那么一切幸福不也将消失吗，他体验到了许多痛苦，但不也体验到了许多喜悦吗？单调对所有的人来说不与人的本性的根本原则——个体性矛盾吗，未来和"理想"的静止不与人的自由意志，对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某种东西的渴望矛盾吗？有时这个选择与外部的，即使是合理的规定对立。没有自由和个性，人会幸福吗？没有这一切，在长期缺乏新事物的情

况下,这样一些本能在人身上会不会以无法遏止的力量觉醒呢,这些本能将砸碎一切公式的金科玉律:人愿望痛苦,破坏,流血,愿望一切,除了他的公式永恒地把他束缚在其上的东西;这就类似于,太长时间封闭在光明而温暖的房间里的人用手砸碎玻璃,不穿衣服就跑到外面的寒冷之中,只求不再留在原来的状态?难道不是这个精神上疲惫的感觉促使塞涅卡(Сенека)走向阴谋和犯罪的吗?难道不是这个感觉迫使克列奥巴特拉(Клеопатра)拔出金针刺向黑奴的乳房,贪婪地看着她们的脸,看着这些颤抖的和张开的嘴唇,看着这些惊恐的眼睛?最后,死板地占有业已达到的理想能够满足这样的人吗,对他来说,愿望,追求,获得——是其不可克服的需求?难道理智能够完全地穷尽人的本性吗?显然的是,只有理智自己才能被赋予最终的公式,这公式是由它的创造者自身——理性赋予的。

就自己的完整本性来说,人是非理性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的彻底解释是理性所无法达到的,它也无法实现对人的需求的满足。无论思想的工作是多么的顽强,它永远也不能覆盖整个现实,它将适合虚假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在人身上隐藏着创造的行为,正是这个行为把生命带给他,也给他带来痛苦和喜悦,理性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改变这些痛苦和喜悦。

与理性不同的是神秘。科学的探索和威力所不及的东西,宗教却可能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神秘的东西的发展,以及他的兴趣在宗教问题上的集中,就由此而来,我们在其活动的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时期都能发现这一点,这个时期是由《罪与罚》开始的。

[注释]

① 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关于自己对欧洲的最初印象,他在《冬

天记的夏天印象》里做了描绘(1882年版文集,第3卷),间接地还在自己的许多长篇小说里进行了描绘,在这里他对欧洲的感受表达得更完整和更明确;比如《少年》的第453页以下,这一页具有很大的传记意义。

②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第5章:《巴尔》,《全集》第3卷,第406页

③ 同上,第407页。

④ 同上,第408页——原注。

关于棕树枝和白衣的象征,参见《启示录》7:9;关于"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参见《诗篇》6:3。——译者注

⑤ 同上,第408页。

⑥ 同上,第410页。

⑦ 参见《路得记》。

⑧ 参见《马太福音》6:33。——译者注

⑨ 在历史上有一个事实,用来解释这个思想是很方便的:在德国,在农民和骑士起义之前,罗马法已经广泛流传,把当地的封建法律习俗给排挤了。罗马法的负担对整个居民是如此沉重,那些起来造反的人们,那些并不高明的法学家以及普通的人们,顺便指出,要求的是在审判实践中取缔罗马法。但是,谁也不怀疑,作为一种法律,罗马法和中世纪的审判习俗一样,但罗马法不但比后者无比地高,而且比世界历史上在法律领域里任何时候出现过的任何法律都高。所以,罗马法的进一步流传并没有停止,这个法是自然的,可以说是内在必须的。这个例子表明,生活的个别领域里的完善,完全不必要与减少人的痛苦相关,这个完善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从外部看则是自律的,因此完善在历史上实现,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东西。

⑩ 个别的例子在这里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一般的历史过程:1)为了支持国家的国际地位,在这个国家里必须有几十万个男人专门从事军事事业,为了在军事事业上的更大的完善,他们应该摆脱家庭的负担;2)那些使国家的精神和物质文明保持一定高度的人们,必须尽可能地接受教育,以便实现自己的使命,必须更深入地走进复杂而艰难的纯粹科学

和应用科学的世界。于是,形成一个庞大的定额的人群,家庭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只有在很晚的年龄时才是可能的和方便的。根据没有必要解释的原因,将出现与他们相应的无家庭的定额妇女组成的人群;然而,这两个人群是有差别的,对前一类人来说,家庭是某种晚来的东西,家庭的暂时缺乏是一种方便,对后一类人来说,家庭将成为永远封闭的,她们是为了其他人方便存在的无个性的手段。如同大河流把小河流与小溪都纳入到自身之中一样,从蓄水池里出来的气体将产生潮气和雨水,它们最终又将回到蓄水池,完全一样,许多其他小的潮流也将加入到这一大股没有家庭的存在的潮流,这些小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大潮流的沉重,由每个小潮流的轻松和方便,以及由习惯而产生的。

⑪ 1863 年发表在《时间》(Время)杂志上。

⑫ 发表在《时代》(Эпоха)的第 1,2 和 4 期上,这本杂志取代了停刊的《时间》(Время)杂志。

五

人们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心灵的最深刻的分析家。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分析家,是因为他在人的心灵里发现了所有谜的集中点,人在思索这些谜,他还看到了对所有困难的解决,人至今还没有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前面称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为生活的完善形式的艺术家,这些形式已经获得了稳定性;在这些形式的范围内,他以无法企及的完善,穷尽了人的精神世界:心的所有最微小的活动,在业已形成的生活,业已确定的精神结构的形式里出现的思想的所有难以觉察的萌芽,都清晰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这个清晰性已不需要任何补充。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生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没有被他涉及,这就是产生和瓦解;这些方面无疑在自身中带有某种病态的东西,常常在自身中包含着不合理的东西,有

时是犯罪的东西。不知为什么他无法遏止地拒绝这一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却是无法遏止地迷恋;他在补充托尔斯泰伯爵;与托尔斯泰伯爵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生活和人的精神中尚未定型的东西的分析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今现实完全隔离,与它缺少任何有机的联系,缺少对它的好感,这一切当然是他之所以完全停留在产生和瓦解的方面的主要原因。他满怀等待或遗憾,永远地面向未来,或者面向久远的过去,但从来不面向现在。所以,观察在瓦解之后现在是如何灭亡的,或者在这个灭亡中间新的生命是如何出现的,这对他来说总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在长篇小说的长长的系列里,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看到业已确定的典型人物只是忽隐忽现,而且是从遥远的地方;在首要地位上活动的是这样的人们,他们不属于任何确定的类型,他们是惊恐的和正在探索的人,是破坏或建设着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因此具有了某些特殊性:这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心灵的分析、对人的心灵的各种状态、阶段、过渡的分析,但不是对个体的,单个的和完结的内心生活的分析(如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那里)。在他的作品里活跃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完成了的人物形象(每个这样的形象又都有自己内在的中心),而是某一个人物形象的一系列影子:仿佛是一个产生或死亡的精神上的人的各种变体、细微变化。所以,他所塑造的人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主要的东西是思考,而不是直观。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人的良心深处,看来他是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和揭示这样一种神秘的症结,它就是人的非理性的本性的集中点。

但是,无论如何,根据其兴趣的产生看,心理分析只是次要的和受决定的;这个分析只是从《罪与罚》才开始发展。对他来

说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是：人的痛苦及其与生命的一般意义的联系。在其第一部作品《穷人》里已经出现的正是人的痛苦，但只是作为一个形象，在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辨证地讨论的也是痛苦

如上所述，历史的根本之恶就在于其中的目的和手段之间不正确的关系：人的仅仅被当作手段的个性被堆放在文明大厦的底部，当然，谁也不能确定，这种情况将在多大的规模上，持续到什么时候。文明到处压制着下层阶级，它准备压制原始的民族，有时可以感觉到这样一个思想，当前活着的这代人可以为了未来一代人，为了未来几代人而做出牺牲。在历史上发生着某种可怕的事情，一个幻影抓到并歪曲了上面的这个思想：为了谁也没有看见的，只是都在等待的东西，做着某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事：至今一直是永恒的手段的人的本质被抛弃了，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是大众和整个民族都在抛弃它，为的是某种一般的，遥远的目的，这个目的还没有向任何活着的人显示过，关于它我们只能猜测。这种情况何时结束，什么时候能出现作为目的的人（牺牲只能为这样的人奉献），——这个问题谁也不清楚。

这个思想不能被表述出来，但却被实现着，支配着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这个思想参加了战斗，他也不是在清楚地意识这个思想，而是在感觉和感受这个思想。

对最终理想的可能性的批判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完成的任务的前一半。展示了人的本性的非理性，因此也是终极目的的虚幻性[①]之后，他出来保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而是绝对价值，——保卫每个给定的个体的绝对价值，它永远也不能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宗教思想都与此有关。在其对人的本性的公正分析的结果和斗争任务所需要的东西之间出现了

巧合,这个巧合是出色的和幸福的。前者在展示了人的本质的非理性之后,揭示了其中神秘的东西的存在,这个神秘的东西无疑在创造的行为自身里向他显现过。这一点与如下的必要性完全一致,即必须把人看作是比我们关于他所想的无比高尚的东西,看作是宗教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东西。作为生理功能的集合体(其中的一个功能是意识),人当然只是手段,——至少每当另外的,更多数量类似的生理集合体这样要求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在承认人的神秘的来源和神秘的本性之后,我们在他身上发现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他具有自己的造物主的反光,其身上有上帝的面孔,它不会暗淡,也不会服从任何东西,但却是珍贵的和应受保护的

应该指出,只有在宗教里才能显现人的个性的意义。在法律中,个性只是功能,是约定的义务都针对它的那个必要的中心,是财产的归属性等等;个性的意义在这里没有被显现出来,也没有被论证,如果个性这样或那样地被规定,那么,这样的规定将(不——译者所加)是首要的,而是派生的:它是条件,不同意这个条件也是可以的。个性自身在法律里可能成为契约的对象;一般的奴役就是纯粹的、无杂质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里个性完全消失:这里只有劳动力,针对劳动力来说,人是完全不需要的附属物。这样,通过意识,通过科学,都不能达到个性在历史中的恢复:我们可以尊敬个性,但这不是必须的,我们也可以藐视它,——尤其如此,如果它是愚蠢的和不道德的。把这些条件引进来,这自身就动摇了个性的绝对性:对希腊人来说,所有的蛮夷都是愚蠢的,对罗马人来说,所有的非公民都是愚蠢的,对天主教徒来说,所有异端都是愚蠢的,对人道主义者来说,所有的蒙昧主义者都是愚蠢的,对93年的人来说,所有的保守派都是愚蠢的。宗教给这个相对性,以及动摇和犹豫

都设置了界限;每个活生生的个性都是绝对的,是上帝的形象,是不可侵犯的。

这就能够解释下面的问题,比如涉及到奴隶制的时候,那么在宗教领域里,宗教越是软弱,或者越是被歪曲,奴隶制就越是被强化;相反,在法律里,奴隶制的强化是随着法律的彻底性,纯粹性和无杂质性而发生的。在历史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罗马民族那里,在法律的理解中这是最完善的民族:奴隶在这里被剁碎后充当牛肉喂养池塘里的鱼;最人道的奴隶制是在古代犹太人那里,他们生活在严格的宗教之下:在庆典的年代,在这里奴隶应该被释放,即他们是暂时的使用对象,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占有的对象,不是私有财产。

在《罪与罚》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最充分地[②]揭示了个性的绝对意义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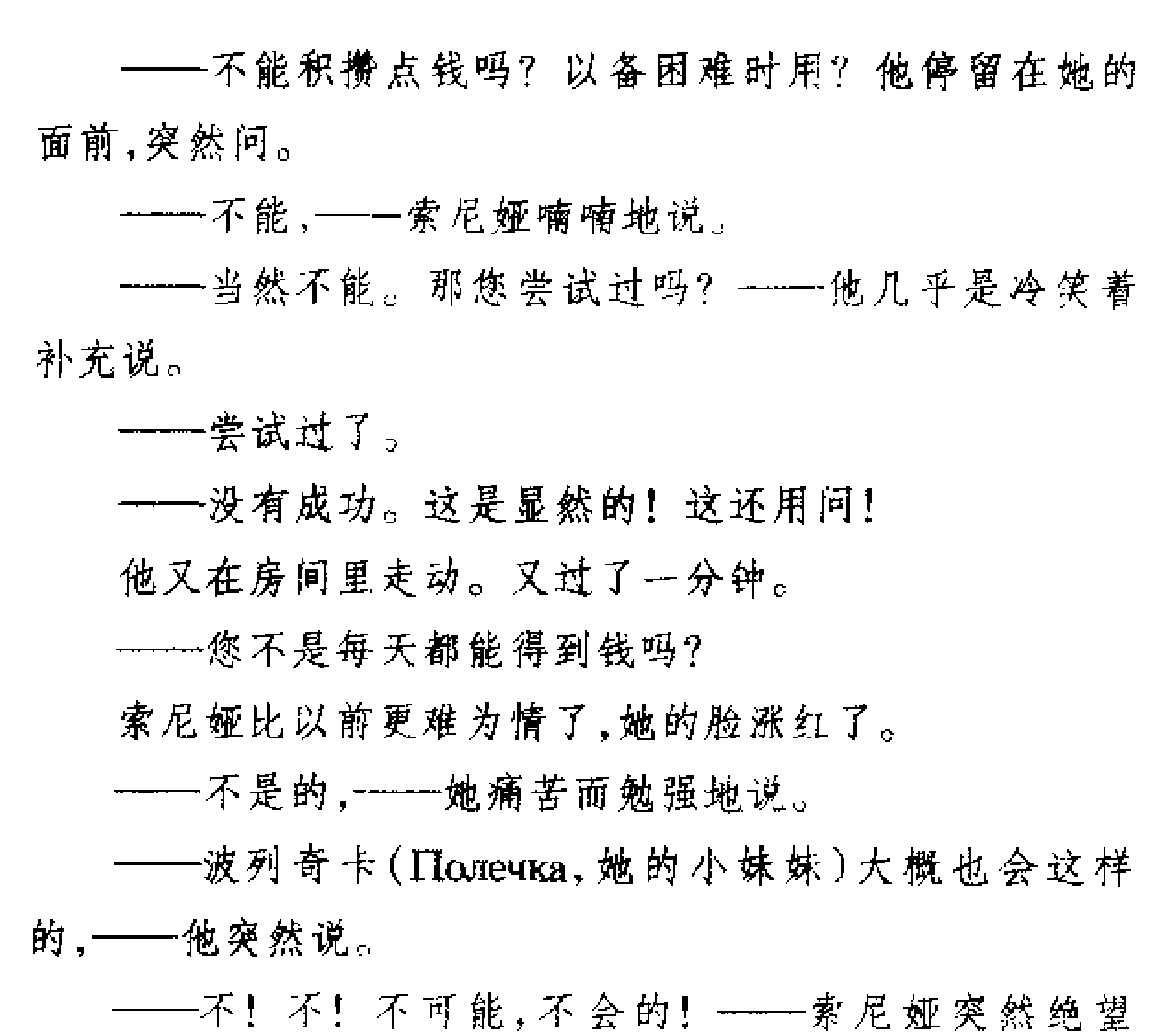
在无穷的痛苦中,在看到毁灭的和正在准备毁灭的人们之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纯洁的心灵开始愤怒,他决定违反人的不可侵犯性的法律。绝妙的辩证法被置于事实之下;事实发生了。就在这个事实发生之后,在杀人犯、被杀者和周围所有的人之间立即开始了一种神秘的相互作用。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心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非理性的;他最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杀害这个高利贷者。和他一起,我们用理性,辩证地也不能理解他的良心的状态,他的行为的本质。但我们用自己完整的本质完全清楚地感觉到他所实现的行为的所有后果的必然性。在他刚刚打碎了被反映出来的,确实被其载体所歪曲了的上帝的面孔后,就感觉到了,上帝的面孔对他(拉斯科利尼科夫)自己而也言消失了,整个本性也随之消失了。他在一个地方说:"我杀害的不是个老婆婆,我杀害了自己。"在他的心里确实有一种东西移动了,随着这个移动,一切都在新的形式里被展现出来,他以前知道的

东西现在都永远地封闭起来了。他感觉到，他与留在犯罪这边的所有活着的人之间已没有了任何共同的、连接的东西了；这个共同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了。于是他过渡到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离开所有的人，仿佛是到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与他在一起的只有一个被杀害的老婆婆。他的本质的神秘的症结，我们大致地称之为"心灵"，确实以一种神秘的联系与另外一个人的神秘的症结连接在一起了，这另外一个人的外部形式被他打碎了。在杀人犯和被杀者之间的所有关系仿佛已经结束了，然而，这些关系在继续着；当他与周围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仿佛还保留着，只是稍微有点变化时，那么，这些关系就完全中断了。在对犯罪的这个分析里，在对心灵的覆盖物和外壳的揭露里（这些覆盖物和外壳包围着每个"我"，它们之间有时相互作用，有时停止相互作用），人的本性的最深刻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人的本质及其绝对性的不可侵犯性的伟大而神圣的规律被揭示了。这个神秘现象不能获得解释，只能用话语简单地表示，据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它：我们在人身上观察到的东西，他的行为，言语、愿望，其他人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以及他关于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不能穷尽其存在的完满；在他身上还有在此之外的另外的东西，而且是主要的东西，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东西。[3]我们应该关切和喜爱人身上的这个主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时才不顾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而爱他；相反，我们只能痛恨人身上外部的和非主要的东西，以及他让自己遭到的某种歪曲。当把这两种东西混淆在一起时，或准确地说，不知道在人的外部表现的背后还有某种东西存在，那么我们就是在打破人的形象——我们在打破一个我们不曾发现的整体。这时我们突然触及到我们未曾想到过的主要的东西，我们便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没有包含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的东西。这样，只有跨越人的个性，我们才

能认识到个性的全部意义：个性的神秘的和非理性的意义便向我们展现，但这已经晚了。在做了这样一个不需要的类似实验后，在天才的表达中揭露出犯罪的良心的状态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服务。

本来，他解决这两个问题[1]后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针对的是作为受苦的和遭受践踏的存在物的人。然而，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又出现了理论的兴趣，按照这个兴趣，他进入了一个无限的研究领域，在这里他对我们称之为宇宙缝隙的东西进行了研究。我们在《罪与罚》中已经找到了思想的这个倾向的第一次闪现。

在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娅(Соня)之间的一个十分沉重的场面里，在索尼娅闷热的房间里，他对她说起她将染病的可能性，那时一个家庭就将毁灭，为了这个家庭她献出了自己：



——不能积攒点钱吗？以备困难时用？他停留在她的面前，突然问。

——不能，——索尼娅喃喃地说。

——当然不能。那您尝试过吗？——他几乎是冷笑着补充说。

——尝试过了。

——没有成功。这是显然的！这还用问！

他又在房间里走动。又过了一分钟。

——您不是每天都能得到钱吗？

索尼娅比以前更难为情了，她的脸涨红了。

——不是的，——她痛苦而勉强地说。

——波列奇卡(Полечка，她的小妹妹)大概也会这样的，——他突然说。

——不！不！不可能，不会的！——索尼娅突然绝望

了,高声地叫喊,仿佛被人用刀扎了一样,——上帝,上帝不能允许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但上帝允许其他人这样做!

——不,不!上帝会保佑她,上帝!……——她重复说,已经忘记了自己。

——是的,可能根本没有上帝,——拉斯科利尼科夫幸灾乐祸地回答说,他笑了,并看着她。索尼娅的脸色突然可怕地改变了。[5]

还是在这部小说里,在拉斯科利尼科夫和他的alter ego(另一个我),他的另外一半,愚蠢的一半,斯维德里盖洛夫(Свидригайлов)之间发生了一段围绕鬼魂和死后生命的主题的谈话。

斯维德里盖洛夫说:

我同意,鬼魂只向病人显现;但要知道,这只能证明,鬼魂只能向病人显现,而不是证明鬼魂自身是没有的。就是说,鬼魂是另外一些世界的碎片和片段,是这些世界的基础。显然,健康的人也没有必要看见鬼魂,因为健康人最大程度地是大地上的人,所以,他们应该仅仅是过此世的生活,为了此世的完满和秩序。但是,稍微有一点病,有机体里的正常的人间秩序稍微被破坏,立即就开始出现另外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病得越重,与另外一个世界的接触就越多,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那么他就直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关于这一点我早就做过论断。如果您相信未来的生命,那么这个论断也是可以相信的。

——我不相信未来的生命,——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斯维德里盖洛夫坐着,陷入到沉思之中。

——如果那里只有蜘蛛或者是类似的东西,那又怎么

样呢,——他突然说。

——这是个疯子,——拉斯科利尼科夫想。

我们一直把永恒想象为一个无法理解的思想,是某种十分庞大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必然是个庞大的东西呢?您想,如果突然不是这样,那里只是一个房间,就像农村的澡堂那样;它被熏得漆黑,各角落里都是蜘蛛——这就是整个永恒。您知道,我觉得有时就是这样。

——难道,难道您想不出任何比这更安慰人和更公正的东西来!——拉斯科利尼科夫带着病态的感觉喊道(以前他不想和斯维德里盖洛夫说任何东西)。

——更公正的东西?怎么晓得,也许这就是公正的东西,您知道,我会故意这样做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似笑非笑地回答说。

听到这个不像话的回答,拉斯科利尼科夫感觉到一股寒流。[6]

我们感觉到一些奇怪的思想或感觉的沉闷气氛。如果在这部小说里有为犯罪证明的辩证法,而在其整体上心灵毕竟为犯罪担当了惩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这样一种辩证法,它上升到对"新世界"的承认,在永恒报应问题上的感觉已经下降到一些蜘蛛上了。"颤栗的被造物",在这里有两次这样称呼一个人,无论是他自己犯罪的微不足道,还是其无益的美德,正好配得上这个称呼,不多,也不少。

宗教问题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就不再消失了:在每部小说里他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他是这样做的,以致于我们活生生地感觉到,他只能暂时地离开这个问题(直到某个时刻到来之前),这时他有能力这样做,没有外部的干扰,不慌不忙地,自由地。最后,这样的时刻到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现了。

[注释]

① 这样,《地下室手记》仿佛就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活动中的第一块基石,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构成了其世界观的第一条基本线索。

② 这样,这部小说在文学方面是最严格的,因此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好的作品,这是他世界观发展中的第二块基石。在这部小说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白痴》里就获得了肯定的保卫,但是在否定的形式里。

③ 返祖现象的事实或者天才出生于普通的父母这个事实揭示的是,在人身上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无论他在自己身上,还是别人在他身上都不认识这种东西。

④ 指前面提到的人的本性的相对性,即终极目的的虚幻性,个性的绝对意义这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地下室手记》的主题,后一个问题是《罪与罚》的主题。下面是在《罪与罚》里已初见端倪,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主要讨论的宗教问题。——译者注

⑤《罪与罚》,第七版,第 293 – 294 页。关于"积攒钱的企图"这句话的可怕意义在于一种匆忙,在于对淫荡的贪恋,这个姑娘在做这件事情,她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只是从外表看她才是堕落的。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某种地狱般的痛苦观察着,在触及到心灵的时候,物质上的贫穷仿佛能穿破心灵,并敞开心灵,以便内在的恶习进入其中。

⑥ 同上,第 264 – 265 页。

六

这部小说出版的时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当时是上一个沙皇在位的最后几年,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政府的动摇,喧闹的和有影响的报刊——这一切都在社会上传播了一种不安和期待。党派的斗争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其中与我们历史上两个世纪以来的思想流派相符的那个党派在文学和社会中享有无比的优势,我们指的是西方派和改革的拥护者构成的党。其实,这

个党的全部希望,几乎是要求,注定都要实现——甚至该党的反对者对此也不十分怀疑;后者仍在追求的一切就在于哪怕是短时间地控制该党派的彻底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最有影响的作家几乎是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自己最终的言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个翻开这些作品的人,甚至不用对它们进行分析,立即就会感觉到,这些作品出现的那个时刻是多么地值得怀疑,社会上的一切是多么的不正确,这些作品就是由这个社会的情绪所引起的。

和往常一样,屠格涅夫在《处女地》里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日常需求,但只是多少减弱了这些需求,并限制了它们。他所受教育的多面性和广博,没有原始地产,除了艺术之外对任何东西都报以冷淡的态度,尽管是没有被说出来,但这是明显的,——和以前一样,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迫使他努力进入这样一些思想和渴望的范围内,他与这些思想和渴望显然没有任何亲近感。有一次他说,在米洛斯的维纳斯(Венера Милосская)身上有某种比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中更无可怀疑的和永恒的东西,他在上了年纪的时候,不顾他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一切,却想投入到这样一些人的爱好之中,他们认为整个美和艺术的世界在自身里不包含任何重要性和意义。这个反常的企图是可以预料的,但它已达到了如此勉强和可怜的程度,以致于珍视他以前作品的所有的人都只能怀着最深刻的悲伤情感来看待这个企图。作家自己不能不感觉到这个悲伤和这个针对自己的遗憾。正是这个悲伤给其最后一批作品增添了活跃气氛和特殊色彩。每个人,无论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作家,在其本性的天赋中都携带着自己生命的痛苦和甜蜜。屠格涅夫是我们的作家中第一个获得欧洲知名度的人;当他获得了这个名声后,已经没有时间再

去追求点什么了,他却突然发现了,他获得的是某种最渺小的东西;一切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从他身边溜掉了。

相反,至今多少仍被屠格涅夫所掩盖的另外两个作家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开始说话了,他们所说的话与社会所希望的、社会所想的一切相反。如果要在历史上找一个例子,个性在其中的意义和影响是无疑的和清晰可见的,那么再也找不到比这两个作家创作活动最后阶段更好的例子了。在迷恋外部改革最强烈的时候,在绝对地否定生活中和人身上全部内在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东西的时刻,他们拒绝了一切外部的东西,将其视为完全无意义的——他们转向了内在的和宗教的方面。最初,社会感到惊讶和愤怒,但却被他们的话语迷住了,整个社会(起初是单个地,后来则是大量地)仿佛被他们引向了与当时所走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生活里发生了转折,我们现在所走的路与不久前所走的路完全不同。

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深刻而严肃的内容与尽善尽美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作家自己的思想在这里比在《战争与和平》里更能统治所有被塑造出来的各种人物类型,这就更紧缩了这些人物,使整个作品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人物群体和场景散布得不那么广泛,活动不是那么自由,所有的人物仿佛都倾向于一个不可见的、位于前方的中心。在《战争与和平》里充满着史诗般的安宁,这安宁赋予小说中所有事件和人物以有条不紊的从容,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感到存在着某种不安和胆怯,这就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抒情风格。放下《战争与和平》后,读者体验到一种清楚的满足感;相反,读完《安娜·卡列尼娜》后,读者将感觉到自己是惊慌不安的和愤怒的。痛苦的感觉,心里恐惧的感觉、对生活的痛恨以及对人的命运的怜悯的感觉,——这一切在都在读者身上混合了、都成为无法忍受的

了;于是在没有能力与自己斗争的情况下,读者将在打破了自己宁静的伟大的作家那里寻找帮助。作家没有让人们长时间地等待自己的话语;《安娜·卡列尼娜》只是一个学说的伟大的序曲,作者有时直接地,有时用隐喻的形式发展这个学说,已经十年了。他由怀疑过渡到信仰,再由信仰回到怀疑,只是在否定中才是坚定的,在肯定中他是动摇的,他用自己最后一系列著作仿佛在刻画一种寻找解决方案的怀疑主义:"我信仰一个上帝,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但我信仰什么样的上帝——这就是我不清楚的问题",他仿佛用自己最后几部著作的全部意义去如是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战线拉得很长,由若干片段组成,因此在形式上与《安娜·卡列尼娜》有明显的区别,但在精神上,就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而言,与它是同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是心理分析、哲学思想和宗教倾向与怀疑的斗争的综合。但这里的任务更宽泛些: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展示的是,一旦一个人从尽管不是他自己所预定的道路上偏离,那么他就将不可避免地和可怕地灭亡,而在这里(《卡拉马佐夫兄弟》)展示的是在行将死亡的人们中间新生命的神秘诞生。老头子卡拉马佐夫——是死亡和瓦解的象征,其精神本性的全部自然力量仿佛丧失了连接的中心,我们感觉到由他自己散发出来的一股死尸的气味。在他身上再没有调节的规范,在人的心灵里所拥有的一切令人极其厌恶的东西都不可遏止地从他的身上冒出来了,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被他玷污和败坏了。在我们的文学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对它而言,任何外部或内部法律的存在对这个老头子具有最少的意义;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是一切法律的抨击者,是一切神圣之物的玷污者——这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在没有传统的情况下前进,没有发展到任何宗教、任何义务的程度,然而它却以

为,它已经超越了任何宗教和任何义务,它是个宽泛的社会,但却只是由于自己内部的软弱无力——我们的社会的主要的特征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很真实,尽管太残酷了。这个人物的主要特征被揭示出来了,这就是缺少内在的、有抑制作用的规范,其结果——对一切的赤裸裸的贪欲,对所有敢于对他进行责备的人都报以厚颜无耻的讥笑。在这个瓦解着的死尸的臭气里滋生着他的产物。在他的全部四个儿子中间可以找到一种内在的对比关系,这个关系服从对立规律。斯麦尔佳科夫(Смердяков)是"落在地上,已经死亡的种子"的瘴气和腐烂的糟壳,他仿佛是纯洁的阿辽沙的对立的一个极,阿辽沙在自己身上携带着新的生命,这类似于新鲜的幼苗从自己黑暗的出生地里把生命带到有阳光的地方,类似于死亡的母亲机体规律。复兴一切死亡之物的秘密出色地表现在这个对立之中。第三个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是个善于克制的和封闭的人,他是德米特里的对立面德米特里是个杂乱无章的、多嘴多舌的人,其身上携带着善良追求,但却没有任何规范,——然而这个规范在最高的程度上集中在伊万的身上。德米特里倾向于阿辽沙,伊万则与斯麦尔佳科夫有某种连接的和共同的东西。伊万对阿辽沙"评价很高",当然是把阿辽沙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而且是具有同等力量的对立面。然而他与德米特里之间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这兄弟俩之间的所有关系纯粹都是外在的,这一点比他们最终甚至成为敌对的这个现象更重要。相反,伊万与斯麦尔佳科夫之间有某种类似性:他们之间只要一开口,一个暗示,就能相互理解,他们说起话来,仿佛在沉默的时候,在他们之间的交往也不中断。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如同阿辽沙和德米特里之间的联系一样。在阿辽沙身上以纯粹的形式突现出来的是肯定和生命的威力,而在伊万的身上也是以纯粹的形式集中了否定

和死亡的威力，恶的威力。斯麦尔佳科夫只是伊万的外壳、腐烂的废物，当然，还是隐藏在人的本性中的恶，这恶是巨大的，以致于不能仅仅表现在他的反常之中。在他身上有一种力量，有一种魅力，而这力量和魅力都集中在伊万的身上。德米特里注定要重新再生；他通过痛苦而被净化；刚刚开始准备接受痛苦的他在自身中感觉到一个"新人"，于是准备在那里，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从矿井里，从地底下唱"赞美上帝的歌"。与净化一起，在他身上有一种生命的力量觉醒了："在万般痛苦之中——我存在，我在痉挛中忍受折磨——但我存在"[1]，这是他在审判前夕说的话，他感觉到了，这个审判的结果将是判他有罪。在这个对存在的渴望中，以及在对哪怕是经过痛苦而成为配得上这个存在的人这一无法消除的渴望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猜中了历史最深刻的特征，最实质的特征，也许是核心的特征。几乎就在这个特征里，在人身上还保存着善对恶的优势，尽管他如此可怕地陷入到恶之中，他的每个单个行为，他的每个思想都是恶。但是，人在几千年里一直在肮脏的泥潭中爬行，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无法消除的渴望，就在这些行为和思想中，就在全部的肮脏底下，还是要爬行下去，总有一天会看到光明——这个渴望使人远远地超越了整个自然界，这个渴望是人在任何痛苦之中，无论什么样的灾难之中不遭彻底毁灭的保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看到自杀时，我们怀着这样的战栗转过自己的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觉得自杀甚至比杀人更沉重，它破坏了某种更高的法律——宗教也谴责自杀，把它看作是无法救赎的犯罪。从理性的观点看，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待自杀，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活着更好，还是死了更好。但是，普遍的和最高的法律（当然具有神秘的来源），迫使我们所有的人——活着，把这当作义务来要求，我们是不能从自己身上推卸这个义务的重负的。假如这个不道德的和

不幸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重新再生，因为他的人性基础毕竟是善，——那么从外部向其展开广阔的生活道路的伊万毕竟站在了这样一种偏斜的开端上，斯麦尔佳科夫就在这条路上跌倒和灭亡了，尽管伊万有很发达的智慧，有很坚强的性格。作为否定和恶的强有力的载体，伊万将长时间地和努力地与死亡斗争，死亡是来自于否定的自然结果；自然界的永恒规律最终将战胜他的威力，他的力量在衰竭，于是他也死了，和斯麦尔佳科夫的死是一样的。

这第四个兄弟的最后几天是引人注目的，对这几天的描述是围绕伊万和他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见面进行的。和在《罪与罚》里一样，我们在这里也是以某种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知道其秘密的独特方式又陷入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气氛之中，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和黑暗的气氛，——在什么也没有见到之前，在没有达到任何事实之前，我们就能体验到一种神秘的恐惧，它来自于对自然界规律的某种破坏性的接近，对某种犯罪的东西的接近；于是我们已经因期待而发抖。这种仇恨，斯麦尔佳科夫就是怀着这样的仇恨看着伊万的，伊万曾暗示他，"一切都是允许的"；这本书，就是斯麦尔佳科夫枕头底下的"已成为圣徒的我们的叙利亚的伊萨克"的书，它代替了他学习法语用的单词本，以及惊慌的女主人转述的癫痫病的那些发作，尽管我们自己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特别的东西；最后还有他从自己的袜子里掏出的一叠纸，而伊万这时正在颤抖，不知为什么往墙上撞；斯麦尔佳科夫讲述的关于杀人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故事，还有受害者对杀害自己的凶手、自己的私生子和委任的仆人、无力的懦夫和白痴的无缘无故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惊人的和沉重的，并且再次把我们引进一个犯罪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被破坏的自然界规律比在《罪与罚》里被破坏的规律高，包

围着犯罪分子的气氛也比笼罩在拉斯科利尼科夫周围的气氛更令人感到窒息和更加紧张。这就是为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自杀;他还有值得活的理由,经过几年的救赎,他将从自己的氛围中摆脱出来走向光明和阳光。斯麦尔佳科夫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再活下去;尽管对他而言在某个地方也有阳光和光明,但完全清楚的是,他不能到达它们那里,在最初几步里就因窒息而摔倒了。他和伊万的最后一次告别,把钱给了伊万,他就是因为这些钱而杀人的,还有关于上帝的话——这一切把我们引入到一个在自杀前最后几个小时的人的心灵之中:这是还没有被任何人表达的秘密,不向任何活着的人转达的秘密。

在这里我们想就两个兄弟的癫狂病的特征说上几句,一个是杀人犯,另外一个被卷入到杀父案里。众所周知,后者抱怨有魔鬼,"极恶的小魔鬼(дрянной, мелкий бес)"光顾他;前者谈论上帝,谈论拜访他的上帝。以前两人都是无神论者,而且是十分坚定的无神论者。仔细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后不难发现,正是幻觉构成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主要的痛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是怎么对阿辽沙说的:"这是他告诉你的";每当交谈者模糊的话语给他提供借口,让他想到,说话人也知道魔鬼出现的可能性,这时他就很兴奋("他是谁,谁在这里,谁是第三个人",他惊慌地问斯麦尔佳科夫);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他所感觉到的那阵冰冷,当他在与斯麦尔佳科夫第三次见面后,走到自己的房子前,一阵冰冷突然袭击了他的心,他正在想,那里将有个"来访者"在等待他,——还有在幻觉之后几乎是哭丧的抱怨的声调:"不,他知道,用什么来折磨我……他极其狡猾"……"阿辽沙,谁敢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他怕你这个纯洁的天使",等等。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无神论者冷淡而严肃的语调,及其确实强有力的气质,那么这个从一个强有力的人向抱怨

的小孩、向哭丧的妇女的转变，可以最清楚地使我们明白幻觉给他带来的痛苦的程度。"明天是十字架，而不是绞刑架"(《全集》第14卷，第360页)，他这样断定，并准备在法庭上讲述一切，这还是在那次幻觉之后。根据类比，我们应该假定，对斯麦尔佳科夫而言，主要的痛苦的对象是某种类似的东西。关于杀人的忏悔和回忆在杀人后最初几天本来应该更加强烈，然而，斯麦尔佳科夫在这个时候还是十分沉着的；疾病和癫狂是在几周后才开始的；和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那里一样，癫狂也不是连续的，而是有时候才发作。区别只在于，(斯麦尔佳科夫认为)"这第三个人"是上帝(Бог)，"就是这个上帝(Провидение)自身"，甚至在客人面前他也确信这第三者的存在，尽管当他谈论这个第三者时，仿佛是在谈论某种与主题无关的东西，对伊万关于上帝的问题，(他回答说)："不，我不曾信"。显然，他们当时谈论的东西，他们的决定，完全是另外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当自然界的规律被他们破坏时，他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个人感觉到他称之为"魔鬼"的东西，而另外一个人感觉到他称之为"上帝(Провидение)"的东西后，他们都体验到了某种完全是突如其来的东西；他们以前关于死后的存在以及关于上帝的话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继续与伊万的类比，我们就应该认为，正是期待"来访"的恐惧导致斯麦尔佳科夫癫狂的慌乱，这个恐惧致使他自杀。和平常一样，作为一个人，他选择了更少痛苦的方向。显然，承担肉体上窒息的痛苦对他而言比再次体验与折磨他的幽灵的冰冷地接触更容易些。

斯麦尔佳科夫(癫痫病)的发作显然是更加严重的，作者并没有向我们描述，只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幻觉)发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有消息说，当《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的时候，一个心理医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封信，[2]在这封信中他对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描述与客观观察的疾病发作所显示出来的状态之间的深刻一致性感到惊讶;客观观察当然不了解幻觉的内在的内容,这个内容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被赋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的描述添加了几分嘲笑的语调,但如果仔细阅读其整个作品系列,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经常是给自己所喜爱的思想从头至尾附加上轻松的讽刺,[2]——至少每当他预料这些思想可能遭到嘲笑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做的。显然,他不愿意过分地引起读者大众对自己的反感,——但留下这样或那样一些东西不表达出来,这对他也是很难做到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整个幻觉期间都不相信幻觉的客观性、即暂时他还处在有病的状态,他是不相信这个客观性的;相反,当他健康的时候,当不再体验幻觉的时候,他一直相信这个幻觉的实在性;甚至只害怕这个幻觉,光想它。病人在其健康状态下说的话实在是太严肃了,一旦接近这些话,作者就成为十分顽强地集中的人。这一切都迫使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转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噩梦》时,在他身上存在的双重性和隐蔽性:他未必仅仅是打算向我们描绘幻觉,其真正的见解几乎是在讽刺的语调中隐藏着,——斯维德里盖洛夫关于另外世界的十分细致的想法(参见上边),"另外这些世界的碎片向处在病态的人显现",这几乎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至少可以看一看他让佐西马长老说的话,这次已经没有任何讽刺了:

> 地球上还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被赋予一种对我们与另外一个世界,与崇高世界的活生生的联系的神秘而内在的感觉,甚至我们的思想和感觉的根源也不在这里,而在另外那些世界里。这就是为什么连事物的本质也不能在大地上去理解的缘故。上帝从另外那些世界里拿来了种子,播种在这块大地上,培育自己的花

园，一切能长出来的东西都长出来了，但长出来的东西得以生存和具有活力，只是靠自己与另外一个神秘世界相连的感觉；如果在你身上弱化或消除这个感觉，那么长出来的东西在你身上将死亡。那时你就将成为对生活冷淡的，你甚至会痛恨生活。[1]

就其中所包含的思想的深度而言，就人物形象的美而言（这些形象看来十分符合隐藏着的事物现实），以及就其信念的力量而言，这些话是令人惊叹的。我们的艺术文学已经无可比拟地超越了我们的科学的无精打采的运动，它已上升到直观的高度，只有柏拉图和为数不多的其他人才在这个高度上，对我们的文学而言，这已经是第二次了。[2]在罪犯的感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看见了与"另外世界"的联系，这个联系突然变得清楚了，可以感觉了，对于其他所有没违反自然规律的人而言，这个联系也有，但没有被意识到，它完全是不可感的和模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远离任何严重的错误，当我们揭示其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时，我们也没有陷入严重错误，能使我们坚信这一点的是我们应该对如下两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在阅读《罪与罚》，以及在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写杀害父亲的凶手之间的会见时自然会产生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理解这里所表述的罪犯们的心理状态的真实性，尽管我们自己没有体验过这个状态？为什么在犯了罪之后，因此就是在周围人中间突然从自己的高度上坠落之后，罪犯却在某个方面上升，超越我们所有的人？犯罪之前，在伊万面前是个颤栗的昆虫的斯麦尔佳科夫在犯罪后和他说话时，像是个拥有权柄的人一样，像个统治者。伊万自己对此表示惊奇，并说："你很严肃，你比我想的还聪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犯罪前在其他人中间只是个 primus inter pares（同事中居首位者），在犯罪之后就从他们的水平上积极

地走出来;有一个斯维德里盖洛夫,也是个杀人犯,与拉斯科利尼科夫谈话时,仿佛是个具有同样力量的人,他嘲笑地指出,他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点"。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解释,而我们只是说出我们觉得可能的东西。如果对从来也没有杀过人的我们而言,罪犯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后,我们感觉到惊奇的不是其幻想的刁钻古怪,而是其分析的艺术和深度,那么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评价的手段,有了这个手段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完全不应该清楚的东西的表达的真理性进行自己的评断,这不是完全清楚的吗?这样的手段只能是对这个状态自身预先的知识,尽管我们对这个知识是不清楚的,这不是显然的吗;当另外一个人向我们表达我们还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时,——作为对他所说的话的响应,在我们身上将产生一种此前一直是隐藏着的知识。这只是因为被引起的知识与从外部给我们的知识一致,并与之合并在一起,因此我们才对从外部给我们的知识的确切性和真理性做结论。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从外部给我们的知识是假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说我们对其仿佛没有任何思想和观念的东西。这个奇怪的事实在我们面前揭示了我们心灵的一个最深刻的秘密——它的复杂性:心灵不仅仅是由在其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东西组成的(比如,我们的理性不仅仅是由它所意识到的那些知识、思想和观念组成的);其中还有许多我们在自己身上还没有发现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只是在一些十分特殊的时刻开始发挥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直到死我们也不了解自己心灵真正内容;也不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真正面貌,因为这个世界随着我们加给它的那个思想或感觉而改变。随着犯罪的出现,我们的思想和感觉的一个黑暗源泉便被揭示出来,于是在我们面前立即就显露出精神方面的一些线索,它们连接着宇宙以

及在其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正是这个对所有其他人都封闭着的东西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使罪犯超越其他所有的人。生和死的规律对他而言将成为可以感觉到的，一旦违反这些规律，他就会意外地感觉到，他在一个地方扯断了这些线索中的一条，于是，在这之后，他也就奇怪地死亡了。那个毁灭他的东西，只有在破坏它之后才能感觉到它的那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他与其接触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只能预感到它，靠某种模糊的知识去猜测它。

我们说过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人的心灵的伟大的分析家向我们展示了新生命从行将死去的旧生命里的再生。根据无法解释的和神秘的规律，整个自然界都将获得这样的再生；我们在这些规律中发现的主要东西是——生和死的不可分割性，如果死不发生，那么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作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的题词，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解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约翰福音》12:24)堕落，死亡，瓦解——这只是新的、更好的生命的保证。我们就应该这样看待历史；在看待我们周围生命中的瓦解因素时，我们应该习惯于这个观点：只有这个观点才能拯救我们于绝望之中，当对任何信仰而言仿佛已经出现了终结时，只有这个观点才能给人以最坚定的信仰。只有它才符合现实的和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支配时间的流程)，而不是我们理性的微弱地闪烁的光，也不是我们的恐惧和忧虑，我们正是用这些东西填充历史，但根本不是在支配历史。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构思的画面最终没有画完。在这位作家的心灵里，和谐、均匀、连贯性的某种缺乏无疑与对黑暗、混乱、瓦解的理解相关。其实，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仅仅

表达了旧的东西是如何死亡的;至于说再生的东西,尽管也被勾勒了,但却是紧缩的和从外部进行的;而这个再生自身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秘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到棺材里去了。根据《罪与罚》的最后一页判断,他一生都准备对这个秘密进行表达,这个表达最终应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后几卷里出现;但是,在作者死后,这个表达注定是无法实现了 他只是勾勒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却没有完成它。

但是,他完成了在这个任务前面的东西,(而且完成得很出色,)其中包含着意义的广泛,理解的深刻,无论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是在其他文学中,都没有任何与此类似的东西。我们指的是《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上边已经指出过,任何生命都代表着善与恶的结合,在死亡的时候,它在自己身上,以纯粹的方式把善分离出来,也把恶分离出来。恶当然面临着灭亡,但不早于它与善进行顽固的斗争,在这个《传说》里,正是这个恶以无可比拟的力量被表达出来了。

[注释]

①《全集》第 14 卷,第 294 页。

② 如果这封信被保留了下来,那么把它发表出来是很有意思的。

③ 比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检察官在法庭上的发言就是这样,这个发言整个都是在对检察官的讽刺的语调中进行描述的;然而,这个发言的许多思想都包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的名义写的《作家日记》中所表达的思想的重复。

④《卡拉马佐夫兄弟》,"佐西马长老谈话和训导选"、《全集》,第 13 卷,第 357 页。

⑤ 第一次我们指的是莱蒙托夫的著名诗作:《天使在夜半星空中飞过》,等等。

七

在一个小酒馆里，在屏风的背后，兄弟俩第一次聚在一起：阿辽沙是个爱幻想的，有宗教信仰的青年，是佐西马长老所喜爱的见习修士，很平静地从通常的生活轨道转向了修道生活的孤独之路，还有比他大几岁的，比他更有经验的伊万。四兄弟中只有他们俩为一个母亲所生，斯麦尔佳科夫和德米特里和他们是兄弟只是就父亲而言。四个月的长期分离后，他们在这里相遇了，——只是现在，在新的分离之前，也许这是永远的分离，他们聚在一起，单独地进行交谈。在这几个月里，阿辽沙好奇地观察自己的哥哥，他了解哥哥的信念和所受的高等教育；同样地，他有时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哥哥投过来的长长的目光。他们相互沉默着，然而，只有他们才有什么可以说的，他们和其他人谈过话，或者是冷淡地，或者是服从地（阿辽沙和佐西马），或者是占统治地位（伊万和米乌索夫）。一个出发点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了；尽管正是在这个出发点上开始分开，各奔对立的方面，然后再就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了，但是，在这一个出发点上的接近却比在众多旁岔上的接近或者是在自己精神发展的顶峰上的接近更显著，更重要（在这些方面的接近是他们和所有周围的人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在他们谈话的引言部分里表现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为我的走感到不安，——伊万对阿辽沙说。——在动身前我们不知还有多少时间呢，这是永恒的时间，是永生！

——如果你明天走，那么还有什么永恒呢？

——这又关我们什么事呢？——伊万说。要知道，我们毕竟来得及谈完自己的事情，我们为了什么来到这里？

你为什么惊奇地看我？请回答：我们为了什么聚在这里？是为了谈老头子和德米特里？为了谈'国外'？谈俄罗斯的灾难性的状态？谈拿破仑皇帝？是这样吗，是为了这个吗？

——不，不是为了这个。

——就是说，你自己明白是为了谈什么。其他人要谈一件事情，乳臭未干的我们需要谈另外的事情；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永恒的问题。整个年轻的俄罗斯现在只谈论永恒的问题。正是现在，那些老头子们突然都在忙于研究实际问题。你为什么整个三个月来怀着期待看我？是为了盘问我：'你信仰什么，还是完全不信仰任何东西？'……

——也许是这样，——阿辽沙笑了。——你现在是在嘲笑我吗，哥哥？

——我在嘲笑你？我不想让三个月来怀着期待看着我的弟弟伤心。阿辽沙，请你直接看我：我和你完全一样，都是个小男孩，只有一个区别，我不是见习修士。俄罗斯的小男孩至今是怎样活动的（就是说俄罗斯的男孩是另外一类）？比如说，这个肮脏的小酒馆，他们就在这里聚会，坐到了角落里。以前他们素不相识，等走出小酒馆，又会多少年不相见：那有什么呢，他们利用在小酒馆的时机，在谈论什么？讨论世界性的问题，这就是：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永生？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就谈论社会主义，谈论无政府主义，谈论按照新的编制重建整个人类，——但要知道，结果是一个，还是那些问题，只是从另外一头谈。许许多多极有天赋的小男孩都在做这件事，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永恒的问题。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对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永生，或者如你所说，从另外一头看的问题，当然是首要

的问题，首先，也应该这样，——阿辽沙说道，仍然带着那种平静的，审视的微笑看着哥哥。

在这个"也应该这样"里，兄弟俩一致了。——我们在这里所引的片段将永远成为历史性的，大概确实有过这样的时代，当时人们在这些"永恒的问题"上发生一致和分歧，在对待这些问题的兴趣上，他们比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更不用说社会地位或状态方面的共性的了。幸福的时代、幸福的人们；道德上的败坏离他们甚远。但是，这一切仿佛都已经过去，也许永久地过去了。最有意思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很快就成了最没有意思的东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未来的历史将对此做出自己的评断。只有一点是无疑的，理性上的冷淡主义，对一切问题的漠不关心，还从来没有达到这样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正在成长的，取代我们的这几代人身上那样。

兄弟俩已感觉到在主要问题上的共性了，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已经不再相互不好意思了，伊万在见习修士阿辽沙面前表白自己的本性：对生命的渴望是他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最主要的东西。他说："即使我不相信生活，不相信心爱的女人，不相信事物的秩序，甚至，相信一切都相反，是无秩序的，是可诅咒的，也许是魔鬼般的混乱，[①]即使我遭受人的失望中的所有恐惧，——我仍然还想活下去，[②]既然我伏在这酒杯上喝酒，那么在没有把酒喝干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抛弃它的。不过，在三十岁之前我也许会抛弃酒杯的，尽管我没有喝干，我将离开……不知道向哪里。"对生命的这个渴望是直接的和无意识的："在我们的地球上还有许多向心力"这是在他感到难以解释这个渴望的时候指出的。"我活着，因为想活下去，哪怕这违反逻辑。"在人身上有某种与自然界的生命，与另外一种生命类似的东西，这另外的生命就在自然界的怀抱里展开，我们称之为历史；人对这一切纠缠不休：

这就是一些联系，它们远比思维推理的冰冷的联系更稳固和更有活力，它们召唤人接近大地，而人便爱大地，这是无法解释的和高尚的爱："发黏的、春天盛开的嫩叶是我所珍爱的，我爱蔚蓝的天空，我爱另外的人，有时你不知道，为什么爱他，人的另外的功绩是我所珍重的，也许你早就不再相信这样的功绩了，但根据旧的记忆，你还是用心去景仰它……"

"——我认为，世上的所有人都应该首先爱生活，——阿辽沙若有所思地说。

——爱生活甚于爱它的意义?"

阿辽沙回答说"是"，并且说对生活的意义的理解总是随着对生活的这个直接的爱而出现，理解生活的意义，那是早晚的事。

在伊万那里，与对昏睡的自然界的爱、对"春天发黏的嫩叶"的爱不可分割的是对另外一种自然界的爱，这个自然界却有着完全的意识：我们说的是人和他所创造的美妙世界。伊万说："我想去欧洲一趟。"他有两千卢布，这是根据他和阿辽沙的启蒙女教师的遗嘱留下的，这个女教师选择了他们，是出于可怜，也是为了对他们的母亲的纪念，当时他们的父亲抛弃了他们。现在，大学毕业了，他打算去国外，准备在路上用这些钱。

伊万继续说：

阿辽沙，我就从这里动身。我知道，我只是走向坟墓，走向非常非常珍贵的坟墓，如此而已！在那里躺着珍贵的死人；在他们上边的每块石头上都写着过去灿烂的生活，对自己的功绩，对自己的真理，对自己的斗争和对自己的科学的狂热信仰(这我以前都知道)，以致于我将倒在地上，去亲吻这些石头，在他们的坟墓上哭泣，[1]——与此同时，我心里深深地坚信，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仅此而已。我不是因为绝望

而哭泣，只是因为我将由于我所流的眼泪而感到幸福。"

这些充满热情的话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颗伟大的心和伟大的脑，还有全部的忧伤，这样的心灵不可能不带有这样的忧伤。这里的忧伤来自于爱的力量，同时也来自于高尚的意识，这意识与爱是分离着的，并与爱对立。在没有体验到眷恋，或者无意识地眷恋的情况下辩证地否定欧洲，以及不理解欧洲，——这是两种对待欧洲的态度，它们同样是轻率的，因此在我们这里几乎完全占统治地位。很少有人能上升到这两种态度的结合，类似的结合当然不能不引起最深刻的痛苦。真理只在这个结合里，不管这有多么艰难，每个想成为公正的人都应该加强在自己身上发展这个爱的情感的能力，这样一种意识的能力，即可爱的东西——已经不再死亡。

每个在自己身上有对别人的，与他没有个人联系的某种东西的兴趣的人，不可能是不真诚的和公正的。他的思想过分集中在这个兴趣上，因此无法研究微不足道的东西，一般人通常都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把自己围起来，目的是把自己的渺小掩盖住。因为这一点，真正的伟大总是如此之简单；伟大永远也不能在生前获得承认，这个承认总是赋予虚假的，因此是骗人的伟大，这也是因为这一点。心灵上的孤独，自己的思想没有被分享——只是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这种状况最终将转人封闭，不愿意与人分享。然而，表达自己的企图毕竟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对这样一些见面的时刻和深刻的坦白的解释，在它们到来之前一分钟也无法预见，它们给谈话者的一生都留下了印象。

伊万说："阿辽沙，我没有朋友，我想和你接近。"一切伴随他和其他人之间无法逾越的界限现在突然消失了；阿辽沙开始和他开玩笑，还没有任何人与他开过玩笑呢，他自己也笑着对阿辽沙说："小兄弟，我不想把你引坏，使你离开自己的根基；也许，我

想用你来治疗我自己。"阿辽沙惊奇地看着他;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微笑过。

[注释]

① 在《群魔》里,基里洛夫(Кирилов)在自杀前说:"我们的整个地球都是谎言,位于谎言和粗鲁的嘲笑之上;地球的规律自身——是谎言和魔鬼的独幕轻松喜剧。如果你是人的话,请回答,为什么活着!"(1882年版,第553页)。根据重复和带有强烈情感的语调显然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意见放在这里了,他长时间地和艰难地同这个意见进行了斗争。

② 在《传记与书信》里可以找到很多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生命力的东西,只有这个生命力赋予他以力量,以便把一生中落到他肩上的一切都表达出来。他在一封信中做出这样的结论:"猫一样的生命力(在我的身上),不是这样吗"。

③ 这里也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欧洲的感受;试比较《少年》里韦尔西洛夫(Версилов)的话,第453－454页,以及《传记与书信》里的札记,第295页。

④《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卷,第259页。

八

——从什么开始呢,从上帝开始?——伊万问,并开始阐述关于同情着的上帝与痛苦的人类之间,公正的上帝和没有遭到报应的犯罪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伊万开始说:

一个老罪人[①]在上个世纪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就应该把他造出来。上帝事实上存在,这并不奇怪,这并不希奇,希奇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关于上帝必要性的思想——能够

钻进像人这样野蛮而凶残的动物的脑子里:这个思想是多么神圣,它是多么动人,多么智慧啊,它给人带来了多大的荣耀啊。

这样,人的败坏和宗教的神圣就是人首先打算确定的东西。宗教是某种高尚的东西:使宗教成为对人而言是可能的,成为有能力进入宗教的世界观里去的人——这就是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最高满足。但要合理地,真诚地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不违反自己的知识的特性,而只是遵照它们,按照造物主把它们安排在他身上的那个样子,宗教自身教导的就是这个。

因此,在这里根本没有对现在将要激烈争论的东西的任何敌视、高傲或蔑视;所采用的论证手法的最深刻的独特性就在这里。在世界文学里类似的争论是很经常的,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在接近一个特殊的,在世界文学里从来还没有出现过的东西,接近一个还没有任何人坚持的观点。我们还能感觉到,从攻击的方面看,这个观点是唯一严肃的观点,对被攻击的方面而言,这也许是唯一有威胁的观点。

思想运动中的这个独特性在下面的问题上继续保持着:上帝的存在的问题,关于上帝存在的不可证明性对人的理性而言(无论在哲学里,还是在科学里)通常是其宗教世界观的第一块绊脚石,在这里,上帝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反驳,这种反驳是根本无法制止的。宗教尽最大努力进行保卫的东西,但它又难保卫的东西,根本没有遭到攻击,而是在没有任何争论的情况下就让步了。这个论证方法的严格的科学性是不能不承认的:人的思维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是最精制和最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几千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但现在终于被揭示了。这个相对性的惊人的和清晰的证据是不久前出现的一种怀疑,人所熟悉的空间,人可以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能穷尽真正的空间吗?所谓的非

欧几里德几何学[2]产生了，现在欧洲最出色的数学家们在研究它，在这种几何里平行线相交，三角形内角之和比两个直角之和小一些，非欧几何的产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对所有的人都清楚的事实，它使下面的思想也成为无可争议的，即存在的现实没有被在理性中思考的东西所覆盖。上帝的存在也可以归结为不可以思考的，但却是存在的东西里，上帝存在的不可证明性不是上帝的实在性的任何反驳。从人的思维的这个相对性出发，伊万拒绝评断关于这样一种东西的宗教的断言是否正确，它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和一切思维的支配者和立法者。他说：

> 我谦卑地承认，我没有任何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我的大脑是欧几里德式的，是人间的，因此我们怎么能够解决不是来自此世的问题呢？我也建议你永远也不要想这样的问题：他（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这都是完全不适合大脑的问题，大脑的构造是只具有关于三个维度的概念。因此，我接受上帝，不但十分愿意，而且还接受他的智慧和他的目的，这些已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了；我相信秩序，相信生命的意义，相信永恒的和谐，我们仿佛将在这个和谐里融合；我相信道（Слово），整个宇宙都都向往它，它"和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3]

[注释]

① 这个思想被认为是由伏尔泰第一次表述的。

② 它是由罗巴切夫斯基第一个发现的，他是喀山大学的教授，该大学以自己的名义和费用出版了他的全集以纪念他，（一卷，喀山，1883年）。这里包含了他的这样一些著作：《虚拟几何》、《几何学新原则及充分的平行理论》和《泛几何学》。关于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详细情况以及这方面的文献，参见维亚欣科·扎哈尔琴科（Вященко

Захарченко):《欧几里德原理以及解释性导论和注释》,基辅,1880年。
③ 这里指的是《约翰福音》开头的几句话:"太初有道(道=理性、意义、言、是表述出来的思想),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1-2。

九

"但我不接受上帝的世界",伊万是这样结束自己的坦白的。

我们又遇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思维方法:被造物不否定自己的造物主,它承认并认识他;被造物起来反抗造物主,否定他的创造,与这个创造一起也否定自己,因为它感觉到在这个创造的秩序里有一种与被造物自身的被造本性不相容的东西。最高的和智慧的意志是从一个无法认识的源泉里流出到宇宙中来的,在一个被称为人的部分里,它自己起来反抗自己,并抱怨它按照其进行作用的规律。

伊万说:

> 我应该向你做一个坦白,我永远也不理解,怎么能爱自己的近人。我认为不能爱的就是近人,只有远人才可以爱。有一次,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我读到(一个圣徒)慈悲的约翰(Иоанн Милостивый)的故事,说一个饥寒交迫的行路人走到他跟前,请求温暖他,——这时约翰竟然与他一起躺在被子里,抱住他,并开始朝他的嘴里吹气,他的嘴由于一种可怕的疾病而腐烂并发出臭气。我坚信,约翰这样做肯定是带着一种谎言的冲动,出于义务所强迫的爱,出于强加给自己的宗教上的惩罚。要爱一个人,你就应该隐藏起来……抽象地爱近人还是可以的,甚至有时可以从远处爱近人,但从近处爱近人,这几乎永远也不可能。

在这些话里可以听到一种可怕的仇恨,其基础是某种巨大的痛苦。关于人有这样的说法,"任何人也不痛恨自己的肉体,每个人都喂养它,温暖它",这个说法指的是人的本性的一般规律。但在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对自己肉体的痛恨,一种"不温暖它和不喂养它"的愿望,但是,相反的是,这是出于一种惊恐的忙乱:当然,慈悲的约翰在这样做的时候,带着幸福和喜悦,这几乎不用解释。但是,这个在一闪而过的人物身上出现的错误判断不改变任何东西;我们放过这个错误,继续往下听。伊万说:

> 我想让你明白我的观点。我本想谈论一般的人的痛苦,但最好还是谈一谈小孩的痛苦……第一,小孩在近处也可爱,甚至肮脏的、面目丑陋的小孩也是可爱的(然而,我觉得,小孩子从来也没有面目丑陋的)。第二,我之所以不谈论大人,还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他们令人讨厌,不配爱之外,他们还遭到了报应:他们吃了禁果,认识了善和恶,并成为'类似上帝'的了。现在他们还在吃。但小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吃,暂时还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你爱孩子吗,阿辽沙?我知道你爱孩子,你会理解的,我为什么只谈论他们。如果他们在人间也遭受极大的痛苦,那么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因为自己吃了禁果的父辈才受惩罚的,——但是,这个论断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在人间,人的心是不能理解这个论断的。一个无辜的人不能替另外一个人受苦,更何况还是一个如此无辜的人!阿辽沙,你会觉得我很奇怪,我也极喜欢小孩。你要注意,残忍的人,贪婪的、淫荡的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有时很喜欢孩子。当孩子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比如在七岁之前,他们与大人有很大的区别:仿佛完全是另外一种存在物,具有另外一种本性。我知道一个在牢

狱里的强盗;从前有一次他还杀过孩子、但在坐牢之后,他奇怪地爱孩子了。从牢狱的窗口里他做的事情就是望着在院子里玩的孩子们 他经常让一个小男孩到他窗前来,那个小男孩甚至和他交上了朋友……阿辽沙,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些吗?我的头有点痛,我很忧郁。

——你说话的样子很奇怪,——阿辽沙不安地指出,——好像是有点神经失常。

出于同情的渴望而制造痛苦是人的心灵极化的特征,这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揭示的就是这个特征。众所周知,在自己的作品里,他自己经常地,怀着极大的痛苦着重描写孩子的痛苦,在描写这些痛苦的时候,仿佛是在描写可见的东西一样,仿佛是他自己在经受他们的痛苦,仿佛他善于渗透到这个痛苦之中:这个场面是通过细微的变化描绘出来的,朝向颤抖的身体的刀子深深地、深深地插进无辜的、发抖的人,他的眼泪刺痛了作家的心,而流出来的血灼痛了杀人犯的手。可以感觉到这个行为是犯罪的,可以渴望撕碎自己的如此构造的肉体;但是,暂时肉体没有被撕碎,暂时对人的心灵的歪曲还没有被改正过来,那么,忽视下面的问题是徒劳的企图,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或者至少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而能遇到。当然,表达了这个坦白后,可能会由于这样一种意识而导致"神经失常":人类历史还没有结束,这个结构不合理的肉体还要在几千年内生活,遭受折磨和痛苦。

"有时常说人的野兽般的残忍",伊万稳定情绪后继续说:"但这对野兽是极其不公正的和委屈的:野兽从来也不能像人这样残忍。老虎只会咬,撕,——也只会这些。"相反,人在自己的残忍里加上了某种精制的东西,神秘的和享受的幸灾乐祸。无论民族性还是教育程度,或者相反,原始野蛮性,甚至宗教,都不

能使人摆脱这个特征；这个特征在人身上是永恒的和无法消除的。克列奥巴特拉(Клеопатра)，优雅的希腊女人，当幸福生活的单调使她厌烦时，便将这种单调多样化，有时用索福克勒斯或柏拉图的著作，有时则用女奴苍白的脸上变化的微笑，她看着这张脸，这张脸也在看着她，与此同时，她的手把一根针刺进女奴黑色的乳房。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和野蛮人，而且是在进行忙乱的起义时，但仍然抽出时间，以便体验对人而言的最高享受——享受别人痛苦的无限性；请看，他们走进农舍，找到一个抱着吃奶孩子的惊慌失措的母亲。

> 他们抚摩孩子，发笑，以便也使孩子发笑，他们成功了，孩子笑了。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土耳其人在离孩子的脸四俄寸的地方举起手枪对准他。小男孩高兴地笑着，伸出双手去抓手枪，突然，这个能手直接对着他的脸扣了扳机，把他的脑袋打碎了。顺便说说，听说土耳其人喜欢甜食。[②]
>
> ——哥哥，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阿辽沙问。
>
> ——我想，如果魔鬼不存在，因此是人创造了它，——那么人也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它的。
>
> (——这样一来，上帝也是这样创造的了。)
>
> ——你真能玩弄字眼，就像《哈姆雷特》的波罗尼(Полоний)一样，——伊万笑着说。——我很高兴；上帝是好的，既然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样式创造了上帝。

于是他继续发展人的痛苦的画面。在和平的、热爱劳动的和新教的瑞士，大约在五年前，一个罪犯被执行死刑，这个死刑以自己的细节而引人注目。某个里查(Ришар)还在小孩子的时候就被自己的父母(姘居而生了他)送给了一个牧人家，他们接受了他，把他当作未来的劳动力。他就像一件东西一样被交给他们，他们也像对待一件东西一样对待他。在恶劣天气里，在寒冷的

时候,他没有衣服穿,几乎从来没有吃饱过、给牧人家到山上去放牧。"里查自己见证,在那些年里,他像福音书里的浪子一样,甚至极想吃哪怕是喂猪的饲料,这些养肥了的猪是用来卖钱的;但是这家牧人连这饲料也没有给他吃,而且当他从猪那里偷了饲料时,遭到毒打。他就是这样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年的,直到长大,有了力气,自己就出去行窃了。这个野人开始在日内瓦靠打零工赚钱,赚到的钱都被他喝酒了,生活得像个败类,结果是,他杀死并洗劫了一个老头子。他被逮捕了,被审判了,结果判了死刑。"社会、宗教和国家都来注意和关心这个已经被判了刑的人,已经毁灭了的人。牧师们到监狱看望他,基督学说之光第一次在他面前展现;他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写信给法院,承认自己是个恶棍,"最终,他也受到了恩惠,上帝照耀了他,给他以恩赐。"社会感动了,骚动了;人们去看望他,吻他,拥抱他:"恩赐降到你身上了,你是我们在主里的兄弟!"……里查哭了;新的,从未体验到过的感受进入他的心灵,软化和感动了它。这个野人,从猪群里偷饲料的小野兽,突然认识到,他也是人,他不是外人和孤独的人,他有近人,这些近人爱他,温暖和安慰他。"我也获得了恩赐",受感动的他说道:"我将在主里死去"。"是的,是的,里查,请你死在主的怀抱里,你杀了人,你应该死在主的怀抱里。当你渴慕猪食,当你因为偷了猪食而遭到毒打的时候(你这样做很不好,因为偷窃是不允许的),你根本不知道主,因此你没有罪过,但是,你杀了人,因此你应该死。"最后一天到了。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天,我要到主那里去。"人们则对他说:"对,这是你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你走向主!"无数人围着把他送到广场的囚车,所有人都满怀感动和爱意地看着他。到了断头台前,周围的人对他说:"死吧,我们的兄弟,在主里死吧,你获得了恩赐!"人们和他告别,热情地亲吻他,他走向断头

台,把头放进断头台的颈套里;刀落下了,这颗长时间处在黑暗中的头,最终开悟了的头,被砍下来了,落到开悟了他,并为他哭泣的兄弟们的脚下。"[3]爱的感觉与这个更能温暖、激发人的热血的结合是人的紊乱的心灵的安慰,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和下面的结合一样精制的,即虚假的贞洁和过一分钟就将这个贞洁砸碎的玩笑意图的结合。

人不但自己在体验痛苦,在堕落,而且他还把堕落和痛苦尽可能地到处传播,传播到整个自然界。在使一切都适合自己的时候,他歪曲了动物的本能[4],他在动物和植物那里强行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动植物类型,迫使它们进行违反自然的杂交[5],如果不是遇到自然界神秘规律的顽强抵抗,那么,这样的杂交是无止境的。他是个卑鄙的违法者,在这些规律面前仍然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违法这些规律,排除所有界限,以自己的道德败坏和恶行跨越它们。他急于捕捉自然界里每个丑陋,每一种疾病,——保护和珍惜这一切,——而且还扩展它。[6]他搞乱了气候,改变了所有的生活条件,更换了不可更换的东西,分割了完整的东西,把上帝的面孔从自然界里消除,把自己的歪曲了的面孔加给自然界。他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主宰和折磨者,就处在这一切破坏之中,他自己也在受折磨,却还为自己的双手所建立的事业创作诗歌。

在从遥远的国度和别的类型的痛苦转向自己的国土,转向我们自己的痛苦后,伊万还粗略地研究了这样的诗歌。确实,如果不理解人给自然界带来的全部丑陋,就不能理解他自己身上的恶的全部深度。

只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恩赐降临到他的身上就砍去一个人的头,尽管在我们这里这是荒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并不比他们的差。我们这里有对残酷殴打的历史性的、

直接的和最亲近的享受。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有一首诗歌,其中说到一个农民是如何用鞭子抽打马的眼睛,抽打'驯服的眼睛'。谁没看见过这样的事呢,这就是俄罗斯的特色。他描绘道,一匹瘦弱的马拉车负载过重,陷入泥潭而无法拉出来。农民就打它,忘我地打,直打到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像喝醉了酒似的狠狠地打着,不知打了多少下:"没有力也要拉,死也要拉!"那匹驽马在挣扎,——他又开始抽打这匹无力防卫的马,抽打它那哭泣的、"驯服的眼睛"。它拼命地挣扎,终于把车拉出来了,"浑身哆嗦,不敢喘气,仿佛是斜着身子,跌跌撞撞地,不自然地,难看地"继续往前拉。

在这里,可怕的就是人给天真无邪的自然界带来的非自然的和丑陋的东西。但是,如果抽打马的"驯服的眼睛"能够使人血液沸腾,那么小孩子的哭声,在您身上寻找帮助的、自己的小孩的哭声将无可比拟地更能够使血液沸腾。——"一个有教养的老爷和他的太太用树条抽打过自己的女儿,一个七岁的小孩。"父亲在选择带枯枝的树条,他说:"这样将更狠些"。"抽打了一分钟,最后是五分钟,十分钟,继续打,越打越起劲,越打时间越长,越打越狠。孩子喊着,最后已经不能再喊了,因为已经喘不上气了:'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①]还有一次,受人尊敬的、有教养的和宦官家的父母不知为什么痛恨自己的小孩,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打她,用脚踹她,最后,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把"她关进厕所里,整整一个寒冷的夜",又责备她夜间不说自己要大小便(仿佛睡得十分踏实、做着天使般美梦的五岁小孩在这样的年纪里就能学会说自己要大小便似的),因此还把粪便往她脸上涂抹,还强迫她吃这粪便:这是做母亲的强迫她吃的!这个母亲在夜里听着被关在肮脏的厕所里的可怜的孩子的呻吟声,

竟然还能睡着觉!"…伊万继续说:

> 你明白吗,这个甚至还不理解别人怎么对待她的小生物在肮脏的厕所里,在黑暗和寒冷中,用自己的小拳头捶打受尽折磨的胸脯,流着自己善良而温顺的血泪,向"上帝"哭诉,求他"保卫她",——你明白这样的胡说吗,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见习修士,上帝的和谦卑的修士,你明白吗,为什么如此需要这个胡说的故事,为什么被编造出来?人们说,没有这样的胡说的故事,人就不能在世间生活,因为他将不能辨别善与恶。如果辨别善与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要辨别这该死的善与恶呢?甚至整个认识世界也不值祈求'上帝'的小孩的这些眼泪。我说的不是大人的痛苦,——他们吃了禁果,不去管他们,就让鬼把他们都抓去吧,但是,这些孩子呢,这些孩子呢!阿辽沙,我在折磨你吗?你仿佛是不舒服?如果你愿意,我就不说了。
>
> ——没关系,我也想受点折磨,——阿辽沙喃喃地说。

——还有一个画面,我只再讲一个画面,——无法自控的伊万继续说,——在黑暗的农奴制时代,有一个做仆人的小男孩,大约八岁,不小心用石头把地主的一条心爱的猎狗的腿砸伤了,就因为这事,根据这个地主的指令,这个小男孩在母亲面前被一群狗给撕烂了。[8]这个退役将军带着自己的大批猎犬和养犬人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去打猎。全体仆人都集中起来接受"教训",在前面的是小孩子的母亲:小男孩自己在此前的昨天就从母亲那里给拿走了。人们带来了小男孩,把衣服脱光:"他在颤抖,吓得发呆,不敢叫喊。"——"赶他跑",将军喊;"快跑,快跑!"——养狗的人喊道,当小男孩丧失理智地奔跑时,将军把全部猎犬放出去扑向他,过了一分钟,这小男孩连块碎片都没剩下。

喂，应该怎么处置这个将军？枪毙？为了满足道德情感，枪毙他？你说！

——枪毙，——阿辽沙低声说，带着某种失神的、扭曲的微笑，抬起眼望着哥哥。

——太棒了，——伊万高兴地喊叫起来，——如果你说了，那么就……

——我说了荒谬的话，但是……

——问题就在这个"但是……"里，——伊万喊道，——你要知道，我们人间太需要荒谬的话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谬的话上，没有这些荒谬的话，也许，在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我什么也不理解，——伊万继续说，仿佛是在说谵语，——我现在什么也不能理解，我想停留在事实上。我早就决定不去理解。如果我想理解什么东西，那么立即就背叛事实，但我已决定停留在事实上……

——你干吗总是折磨我？——阿辽沙悲哀地叫道，——你到底能不能把话对我说完？

——当然了，我要向你说，而且已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了，——伊万说着，并做出自己的结论：——你听着，我之所以只讲小孩，是为了讲得明显些。关于从外到内浸透整个地球的其他人的眼泪——我一句也不提了，我故意缩小了我的话题。我——一个臭虫，我完全谦虚地承认，我什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一切竟是这样安排的……噢，根据我的看法，根据我可怜的、欧几里德式的大脑，我只知道，痛苦是有的，而罪魁祸首却没有，一切都是一个从另外一个里直接地和简单地引出来的，一切都在流动，都在平均化，——但

这只是欧几里德的胡说，因为我知道这个；因为我不能同意按照这个胡说生活！[12]没有罪魁祸首，我知道这一点，但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应该报复，否则我将毁灭自己。这报复不在无限远的地方，不在某个地方，不在某个时候，而是在这里，在人间，以便我自己能够看得见。我相信过，我还想自己看见；如果在此前我已死去，那么就让人们使我复活，因为如果一切没有我而发生，那就太令人扫兴了。我遭受痛苦，可不是为了把自己，把我的罪恶和痛苦当作肥料去给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我想亲眼看见，鹿睡在狮子的旁边，被杀的人站起来和杀他的人拥抱。我希望当所有的人都了解到这一切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我也在场。人间所有的[13]宗教都建立在这个愿望之上，而我是个相信宗教的人。然而，还有孩子——我应该如何安排他们？这是个我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应该遭受痛苦，为了痛苦，——为了用痛苦换来永恒的和谐，那么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请你告诉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也要遭受痛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换和谐？他们为什么也要成为材料，用自己做肥料去为什么人去培育未来的和谐？在罪恶方面人们之间要共同负责，这我理解，在复仇中的共同负责我也理解，但是，总不应该和孩子在罪恶中共同负责吧?！孩子们在父辈的所有罪恶行为中和他们共同负责，如果事实上这是正确的，——那么当然，这个真理不是来自此世，我也不理解它。爱开玩笑的人会说，反正小孩总会长大的，好像也来得及犯罪[13]；但问题是他还没有长大，八岁时就被狗撕成了碎片。噢，阿辽沙，我不是在亵渎神明！我明白，那将是对宇宙的多么大的震撼，如果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融合为一个赞扬的声音，所有活着的和曾经活过的人都

高声赞美:你是对的,主,因为你的路敞开了!当母亲和用狗撕碎她的儿子的凶手拥抱,三个人含着泪喊:你是对的,主,那么当然,这是认识的最高成就,一切都将被解释清楚。但是……正是这一点我不能接受。只要我在人间,我就抓紧采取自己的措施。你看,阿辽沙,事情也许确实会这样发生,当我自己活到那个时刻,[34]或者我复活,为的是看见这个时刻,那么我自己,看着拥抱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大概也会和所有人一起喊:"你是对的,主!"但是,到那时我就不愿意喊了。暂时还有时间,我赶紧保卫自己,所以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这个和谐还抵不上一个孩子的眼泪,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打胸脯并且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用自己无法补偿的眼泪向"上帝"祈祷的小孩!之所以抵不上,就是因为他的眼泪没有获得补偿。这些眼泪应该获得补偿,否则就不可能有和谐。但是,用什么,你用什么来补偿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难道是用这样的方法,即为这些眼泪报仇?我为什么需要它们的报仇,为什么我需要让折磨人的人下地狱,当人们已经遭受残害,地狱能改变什么呢?如果有地狱存在,那还会有什么样的和谐:我愿意宽恕,我愿意拥抱,但我不愿意让人们再遭受痛苦。假如孩子的痛苦用于补充痛苦的总数,即赎买真理所必须的痛苦的数目,那么,我预先声明,全部真理都抵不上这样的代价。[35]最后,我不愿意让母亲和用狗残害自己孩子的凶手拥抱!她不应该宽恕他!如果她愿意,就让她为自己宽恕,宽恕折磨者给她带来的母亲的极大痛苦;但是,她没有权利宽恕自己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她不应该宽恕折磨者,哪怕孩子自己向折磨者请求宽恕这些痛苦!如果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应该宽恕,那么哪里还有和谐呢?在整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够,

而且有权利宽恕？我不要和谐，由于对人类的爱，我不要和谐！我最好还是和没有获得报复的痛苦在一起。我最好还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保留我的没有获得报复的痛苦，我的没有被消除的愤怒，即使我是不正确的。是的，人们给和谐的估价太高了，为了进入和谐世界，我们付不起这么高的代价。所以，我急于把入场券退回去。只要我是个诚实的人，那么我就应该尽早把它退回去。我就在做这件事情。阿辽沙，不是我不理解(原文如此，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此处的"理解"应为"接受")上帝，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退还给他。

[注释]

① 在《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里——涅丽(Нелли)的性格和命运，在《群魔》里——斯塔夫罗金(Ставрогин)和沙托夫(Шатов)的谈话，以及他和基里洛夫(Кирилюв)之间的谈话，当时后者正在与一个小孩玩球，在《罪与罚》里——马尔梅多夫(Мармеладов)的孩子们，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两章：《在农舍里的折磨》和《在清新的空气里》，在这里，儿童的痛苦甚至在阅读的时候几乎都是无法忍受的("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他如此地侮辱了你！"——伊留莎(Илюша)歇斯底里地对自己的父亲说)。在这个痛苦里有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和强烈的东西。在这一章里，所有的人都被称为"病人"和"孩子"(224 页。)在这些场景之后是《Pro 和 Contra》，这是一切宗教和基督教的伟大的辩证法，是许多年前构思的辩证法，在作者这里仿佛还是突然地、在与小说中的情节进程无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出现的。

② 同上，268 页。对土耳其人喜欢"甜食"的暗示具有更一般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本性中对残酷的倾向处处与人的本性对欲望和淫荡的倾向联系在一起。

③ 在日内瓦编出了一个小册子，其中详细地描写了这个事件，小册子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里发行,顺便指出,也在俄罗斯发行,免费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类似的事实完全是地方的(在民族和宗教的意义上),在我们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他接着说:"大概,自从路德派的说教在我们最高的社会里传播后,我们这里也习惯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意见是十分深刻的:在人的心灵的多种不同的能力中间,有一种相互关系,我们用发展、教育或宗教触动其中的一种能力后,我们就必然要按照新的方式改变所有与之相对应的能力,这种被触动的能力在外部作用下接受了这个新方式。伤感的虔敬主义是新教的独特产物,它也需要靠犯罪和痛苦来唤醒自己,但只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这和在另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他类型的精神结构一样。比如,在天主教国家里上边描绘的里查的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想出来的极其巧妙的、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痛苦体制在新教国家里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到处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到处都是人在折磨人

④ 拜伦在一个地方公正而深刻地称驯养的、家养的动物为"堕落的动物"。

⑤ 关于这个现象的十分详细的情况,比如可以参见波格丹诺夫:《医学动物学》。

⑥ 参见丹尼列夫斯基:《达尔文主义:批判研究》,圣彼得堡,1885年(关于信鸽的品种)。

⑦ 这里显然是指克罗内别尔格先生和热金格女士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2月份的《作家日记》里对这个事件以及斯帕索维奇先生的维护性的言论做了分析和评论。(《全集》第11卷,第57－83页。)

⑧ 这个事实是真的,其实,上边所列举事例的都是真实的;这个事实是在我们的一个历史杂志上刊登的。

⑨ 并行的地方参见《卡拉马佐夫兄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一章,在这里,魔鬼开玩笑地解释说,他存在"只是为了使事件发生",尽管我有自己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对余下的自然界进行"歌颂",——因为那样的话,立即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⑩ 这是个非常高尚的地方，是对人类精神的一个忧伤而深刻的承认，不应该否定其公正性。其意义就在于，在外部现实的规律(一切都按照这些规律在自然界和人的生活里运行)和隐藏在人身上的道德判断的规律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由于这个不和谐，人或者放弃后者，与它们一起还要放弃自己的个性，放弃自己身上的上帝的火花——与外部自然界融合，盲目地服从自然界的规律；或者保卫自己的道德判断自由——与自然界对立，和自然界进行永恒的和无力的纷争。这个思想的第一次闪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在1864年找到，在《地下室手记》里(第一部分，第四章，1882年版，第450－451页)，这个思想在这里表达得急躁和无序，但很有特色："上帝，当我由于某种原因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二得四，那么自然规律和算术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显然，如果我真的没有力量，那么我不会用脑门撞这堵墙，但我不能和它妥协，只是因为在那里有堵石头墙，因为我的力量不够。仿佛这堵石头墙确实是个安慰，确实包含着某种和平的词汇，只是因为这堵墙是二二得四吗?! 噢，真是荒谬至极呀！理解这一切，承认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不可能性和石头墙，那该多好哇；如果您厌恶妥协，那么就不要与这些不可能性－石头墙中的任何一个妥协；通过必然的逻辑组合获得对永恒主题的结论，这个主题是，甚至在石头墙的问题上，你自己也仿佛是错的，尽管十分清楚的仍然是，你根本没有错。因此，你默不作声，咬牙切齿，贪婪地在那里木然发呆，并幻想着，甚至你连个发怒的对象也没有；没有找到对象，也许永远也无法找到；这里发生的是偷换论题，颠倒是非，招摇撞骗(《群魔》中的'魔鬼的独幕喜剧')，尽管有这些不清楚和颠倒是非，您仍然会感到疼痛，越是您不清楚的地方，您就越会感到疼痛。"在最后这几句话的嘲讽和痛苦中已经包含了"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思想萌芽。参见附录。

⑪ 即在痛苦和犯罪中如果没有报应，以及因报应而获得的满足，那么我就消除自己犯罪的和遭受折磨的肉体，以便寻找满足。这是对自杀的解释。并行的片段在《作家日记》里，1876年，十月和十二月。参见附录。

⑫ 在这几句话里承认的是，宗教没有任何例外地来自于人的心灵深处，来自于心灵所具有的矛盾和从中尽力摆脱出来的渴望，而不是从外部给定人的。即宗教的来源被认为是神秘的，只是在这样的层次上，人的心灵自身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才是神秘的，仅此而已。这个观点与关于宗教来源的所有通常的理论矛盾，无论是绝对神秘的，还是自然主义的。

⑬ 在哲学里和在所谓的"道德神学"里有类似的解释，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⑭ 并行的地方，参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一章，在这里魔鬼说(350页)："我知道这里有一个秘密，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把这秘密对我公开……我也知道我最后要妥协，我也会走完我的亿万公里的路程，并揭开这个秘密。但暂时这一切还没有发生，我还要压住心头的怨恨，生闷气，完成一项使命：毁掉上千人，以便拯救一个人……不，在没有揭开秘密之前，对我来说存在着两个真理：一个是当地的，他们的，是我暂时根本不理解的，另外一个真理是我的。"

⑮ 在《附录》里参考关于"水晶宫"的类似的思想。

十

"——这是叛逆，——阿辽沙低下头轻声说道。"

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是人在其历史中所能勉强说出来的最痛苦的话。在不拒绝上帝的情况下，他对上帝不再有好感；他不怀疑对自己痛苦的最终报答，——但他不再希望这个报答。在他身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被如此歪曲了，某种神圣的东西被如此损害了，以致于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天空，满怀痛苦地祈祷，以便最终这个损害不被补偿，这个歪曲不被消除：你，就是把折磨近人的贪欲放到我的本性之中的那个人，靠贪欲的力量把我的孩子夺去了，折磨他们，你为什么赋予了(我)对他们的爱，这爱甚至抱怨起你来？为什么你搅乱了我的心灵，扯断了其中的所有

联系,因此我既不能爱,也不能恨,既不能认识,也不能停留在无知当中,既不能仅仅成为义人,也不能仅仅成为罪人?如果你混淆了心灵的果实,这果实是从识善恶树上来到我身上的,你为什么培育了这棵树来诱惑我,或者为什么不用无法逾越的界限把树围起来?最后,为什么造了我之后,放在我身上的顺从的牢固性要比对诱惑的贪欲少?大概,这是奖赏;但是,我们的孩子们毁灭了,——就让这奖赏离开我吧。请把我身上的意识熄灭,与此同时赋予我遗忘的能力,把我重新和我来自于它的泥土混合吧。但如果我的意识没有消失,那么我想最好还是为我那些受尽折磨的孩子哭泣,而不是直观你的真理的胜利。我不想要安慰,我想在我心的痛苦中永远分担我毁灭的孩子的痛苦。

这里表达出来的是人的力量的消沉,这些力量已经无力继续人靠上帝从隐蔽的开端到隐蔽的终点所走的那条路了。这条路人走了几千年,顺从地忍受一切,寄希望于对上帝真理的最终认识和上帝真理的胜利早晚能解除心中的痛苦。然而,最终这个痛苦以如此巨大的力量增长,以致于他无意识地停止了,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他回顾全部走过的路,记住了一切,掂量自己的重负和自己剩余的力量,问道:我到哪里去,我能达到吗?我的希望是一种丧失理智,恶就在把这希望加给我的那个意志里。

无疑,对人在大地上的命运的最高直观包含在宗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哲学,或者是纯科学,在自身中甚至连宗教里所具有的观念的那种共同性和完整性的影子都没有。宗教为什么对人这么珍贵,为什么宗教如此提高他的理性,如此照耀它,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了解了整体和共性后,就很容易找到自我,在部分中确定自己;相反,无论我们知道多少部分——历史、科学和哲学只提供部分——总是可以遇到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使我们处在困难的地步。如果生命是宗教的,那么由此

就有了生命的坚固性,它的稳定性。

有三个伟大的、神秘的行为,它们是宗教直观中的支点,人的命运仿佛就附着在它们之上,悬挂在上边,就像悬挂在自己的支柱上一样。这就是堕落的行为:它解释的是,什么存在;还有救赎的行为:它在人所是的东西里巩固人;最后是为善和恶而进行的永恒的报应行为,是真理彻底胜利的行为:这行为把人引向未来。

只有在动摇了这些基本的支点中的某一个之后,才能动摇人的命运。否则,无论人遭受什么样的灾难:战争、饥饿、瘟疫、消灭整个民族,他都能够忍受,因为在这一切之中他的本质自身还被保留着;人们将死亡,但人还会留下来,人们还会再生;变革涉及的是表现形式,而不是被表现的本质;树叶将落下,但果实和木工还会留下。只有一个东西是人不能忍受的——这就是自己的存在和意识与三个神秘行为的中断,他就靠对这三个行为的信仰而生活。如果没有任何灾难,处在完全的满足之中,那么他将因惊慌失措而死亡;在存在了一段时间后,表现形式将消失,因为隐藏在这些表现形式背后的本质(指人的存在和意识与三个神秘行为的联系——译者)将消失;人们不会再生,因为人已经死了。

人怀着仇恨看待向自己存在的这些支点的任何敌视的接近,这个仇恨因此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别动,我以此而生活",他仿佛在对所有的人说,只要他们企图接近它们,打算称量或测量它们,改变其中的任何东西,补充或者洁净它们。对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的一切宗教迫害的解释就在这个本能的仇恨感中,这些迫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最大的同情,无论这些迫害有多么残酷。

人的人间命运的这三个行为,三个支点,他关于自己的知识

的源泉，人的力量的源泉——正是它们借助一种辩证法而发生动摇，这个辩证法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上边指出了 救赎的行为，它是第二个，连接着两个极端行为，在这里还没有触及到。但是，第一个行为——人们的堕落受到怀疑，最后一个行为遭到否定——为了善和恶而进行的永恒的报应行为，这是上帝的真理彻底胜利的行为。这个行为遭到否定，不是因为它是不可能的，它将不再存在；而是因为它不再需要，不再为人所接受。

应该指出，辩证法从来没有在如此强烈的形式里指向反对宗教，如在这里那样。这个辩证法（即对三个神秘行为进行否定的辩证法——译者）通常来自于对待宗教的恶毒的感觉，也只属于为数不多的偏离了宗教的人。但在这里，辩证法则来自于这样的人，他明显地更忠实于宗教，而不是自然界、生命和历史中一切其他的东西，这个辩证法肯定地依靠人的本质中善的方面。可以说，这里起来反抗上帝的是人身上的神的东西：即人身上的公正感和他对自己价值的意识。

这就使整个辩证法带上一种危险的、几分魔鬼的特征。关于第一个堕落的天使有过这样的话，他"高于所有其他的天使"，"与上帝最近"，即特别地类似上帝，——当然是就自己的纯洁性，就自己的神圣性而言的。在这个辩证法上有某种宗教的特征，每种宗教都唤起对自己忠诚的情感，每个触犯宗教的人都会引起对自己的仇恨，这种忠诚和仇恨仿佛也成为对辩证法的屏障，尽管这个辩证法正是指向反对宗教的。也许只有在不喜欢人的情况下，才能企图破坏这个辩证法，因为它整个地来自于对人的充满爱意的担心。辩证法暗中破坏人的存在基础，而且是这样做的，以致于不在人身上引起痛苦的侮辱感，就无法保卫这些基础。他自己无意识地参与保卫自己的灭亡，这不是暂时的或部分的死亡，而是普遍的和彻底的死亡。

建立对这个辩证法的反驳机制(这个反驳是和辩证法一样深刻和严格的),无疑是我们的哲学的和神学的创作在未来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当然,如果哲学和神学最终能够意识到自己有解决在我们社会中游荡的令人不安的怀疑这方面的义务的话,而不仅仅是成为在德国文化的意义上对几个人的满足,这些人不知什么原因必须真正地了解哲学和神学。我们不做这种建设的企图,而只是说出两个意见。

在上边我们引用过的那段话里,拒绝接受报应或者甚至拒绝只看见上帝真理的胜利,确实建立在人的心灵的一个真实的、敏锐地被看出来的独特性上:每当心灵的痛苦过分沉重,伤害无法忍受时——在心灵里就有一种不与痛苦分离、不从自己身上取消这个伤害的渴望产生。在下面的意识里有某种能够消除痛苦自身的东西,根据这种意识,痛苦是不公正的(比如孩子的痛苦),痛苦不可能受到奖赏(即不能因所遭受的痛苦而受到奖赏——译者):一旦出现这个奖赏,消除痛苦的要求就将消失,痛苦的疼痛将成为无法忍受的。这样,奖赏中就夹杂着新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喜悦。但奖赏完全能取代以前的痛苦,丝毫不消除这个痛苦。这是人的心灵的规律,这个心灵就是这样给定的,就是这样构造的。不能否定,在这个特征里有许多高尚的东西,这个特征来自于人对自身中的价值的意识,来自于某种高傲,同时也来自于谦卑,但没有任何愚蠢的杂质。

就是这样;暂时人还处在自己精神和肉体存在的那些形式里,现在他就在这些形式中,他在自己身上认识的只有这些形式,那么他确实想"最好和自己没有获得报仇的痛苦"在一起,而不是接受为了它而获得的报偿,并与它妥协。但是,以为人的存在的这些形式是某种绝对的和永恒的,不受任何东西约束的东西,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在自己的思想里,在概念和感觉里、人

的精神密切地，十分密切地与他的身体的神秘组织相联系；他被固定在这个组织上，受它的约束和决定，如同正在出生的，但还没有被生出来的孩子与自己母亲的肚子相联系一样。但这个联系的状态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的思想流向随着我们组织里的每个变化而发生改变，那么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当我们的精神摆脱组织，精神成为纯洁的，那么精神将感觉到什么，它将怎么想。现在对精神而言妥协是不可能的，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到那个时候，这个妥协将是必要的和不由自主的。将出现"新地和新天"，关于最后的日子(《圣经》上)已经说过了，在那一天"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1]在这些话里指明了暂时我们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最终解决。

下面是孩子的痛苦，看来它们和最高的公正完全不兼容，但根据对原罪，对人的心灵的本质，对生的行为的更严格的观点，这些痛苦可能成为多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上边已经说过，在人的心灵里，除了其中清楚地和明显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外，还包含着一个内容的完整世界，它没有被表现出来，没有显现出来。当人犯了某种罪行，那么他对这个罪行的实现只是次要的，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则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它先于这个罪行的实现，从其中产生了这个犯罪的行为。这个精神活动给人的心灵增加了一种独特的结构，使之具有了一种无法消除的特征，并遭受某种歪曲。请问，这个特征，这个歪曲就是清楚地表现在心灵里的那些东西吗：记忆以及包含在其中的知识，日常的愿望，表现出来的情感？显然不是：悉进人心灵中，就像是进入整体里，心灵是在自己内容的完满中被歪曲的，——既在这个内容的清楚的部分里，也在其没有表现出来的部分中。关于整个犯罪我们知道，它是以一些不清楚的途径产生的，来自于人的心灵的黑暗的内部。其次，在生的行为里，无疑生者给被生

者传递的不但是他的组织，而且还有仿佛是组织的规律和连接的中心的东西，即心灵。性格、特殊天赋或其他倾向的遗传性现在已经是完全公认的事实了，以致于我们对此根本不能怀疑。生的行为的多样性和被生者的个体特殊性使人有理由这样想，在每个个别的行为里都传递着构成生者心灵的复杂内容的某个部分；而且，当传递着表现出来的部分时，就可以观察到遗传性，当传递着没有被表现出来的部分时，大概就没有遗传性。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本性，每个部分自身中都包含着恢复成为整体的能力，引起没有表现出来的部分出现的能力，所有这些部分和它们的秩序一样，都在自身中被其与整体的关系预先决定了，每个部分都是从整体中出来的，比如，就像与圆周分离的一段小弧线一样，圆周上消失了的所有部分都预先被决定了，根据这小段弧线都可以恢复。每个出生者的心理机体的这些被恢复的部分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新的东西；但是，在这些部分中间，无疑也有以前的部分，不是产生的部分，只是过渡来的部分。这部分在自身中携带着属于生者心灵所固有的普遍歪曲，有时是某种独特的、深刻的恶，某种犯罪，这个犯罪在这个部分里也是个部分，它隐藏在其他部分里，现在只剩下它一个了，它在自己周围恢复了一个整体。由于在自身中携带着犯罪，这个部分也携带着犯罪的罪过，以及报应的必然性。这样，孩子的无过失性，因此也是他们的无辜性，只是表面的现象：在他们身上已经隐藏着他们父辈的恶习，与这个恶习一起，还有父辈的罪过；这个恶习只是不在任何破坏性的行为里显现和表现自己，就是说，它不招致新的罪过；但由于旧的罪过还没有获得报应，因此这旧的罪过在他们身上已经有了。孩子在自己的痛苦中获得的就是这个报应。父亲所犯下的过错可能如此沉重，以致于在他身上不可能被报应，甚至通过他的死亡也不能获得这个报应；比如假定他残害了一

个小孩,使一个满怀信任地接近他的纯洁的人堕落了。他自己靠自己的全部本质能回答这个罪行吗?不能,他的罪行仍是隐藏着的,没有受到惩罚的。但是,过几代人后,报应将出现在痛苦之中,这个痛苦表面上是无法理解的,并破坏真理的法律。实际上这个痛苦是在补充真理。

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十分深刻的现象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解释:这就是每一种痛苦的洁净意义。我们在自身中携带着大量的犯罪性,与它一起还有可怕的罪过性,这罪过性还没有被任何东西赎买;尽管我们在自身中还不知道它,不能清楚地感觉到它,但它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用无法解释的黑暗填充我们的心灵。每当我们体验某种痛苦的时候,我们的部分罪过性就获得抵消,某种犯罪就从我们身上离开,我们就感觉到光明和喜悦、成为更高尚的和更纯洁的。人应该祝福一切痛苦,因为上帝在痛苦里光顾他。相反,谁的生活过的很轻松,他们就应该担心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报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解释的可能性,他以为,孩子的痛苦是某种绝对的东西,它重新来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先前的罪过;他的问题由此就可以理解了:谁可以宽恕这个罪行的罪魁祸首?与这个困难相关的是关于救赎的问题,即第二个,核心的神秘行为,人的命运与这个行为相连。根据救赎者的名字,我们的宗教被称为"基督教";在以下的辩证法中它被卷入讨论。救赎遭到争议,如以前堕落和永恒地狱遭到争议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辩证法的第二个部分与第一个部分,即圣经旧约的部分相对立,因此可以根据其对象称为福音书的,它包含在《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有些离奇的形式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与对救赎行为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是对天主教隐藏的思想的表述。[2]这个思想在展开自己的内容

时,在天主教里表达的是自己对基督的生活和学说的审判,同时论证了自己出现在人间的必然性。在分析了人的本性,并把这个本性与基督的学说对比后,在揭示自己的教会的思想时,年迈的宗教大法官在前者和后者之间找到了不一致的地方。基督带到人间的恩赐过分昂贵,是不可能被人容纳的;所以,人也没有能力接受这些恩赐,就是说既没有能力理解基督的话,也没有能力实现他的训诫。由于要求与能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个不一致性,人应该成为永远是不幸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精神上强壮的人,如果跟随基督,理解救赎的秘密,那么他们能够而且必将获得拯救。因此,怀着如此崇高的尊敬对待人的基督在行为上"仿佛是不爱人似的"。他没有考虑人的本性,实现了某种伟大的和神圣的行为,但同时对人而言却是不可能的,不可实现的行为。天主教就是对基督事业的修正,是把天上的学说降低到人间的理解,是让神的东西适应人的东西。但是,天主教在这样做了之后,隐藏了自身上发生的改变的秘密:各民族跟随着它,都以为是在跟随基督。携带这个欺骗的秘密要付出巨大的痛苦,欺骗的一个方面指向上帝,另一方面指向人;担起这个欺骗的是为数不多的人,是领导西方教会的人,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其余整个人类的痛苦,为了消除(原文如此,疑有误,"消除"应为"安排"——译者)人间的命运。这样,对人的爱在这里也是整个辩证法的动力原则,辩证法的武器是分析人的本性。

这一切的一般意义就在于,救赎的行为自身是不存在的:只有错误;作为宗教秘密的保卫者的宗教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幻想,人必须靠幻想才能成为被欺骗的,以便不论怎样在人间安排好。

作为自己辩证法的最终一个结论——在现实中没有宗教,以及由于缺乏对宗教而言的外部基础而导致的宗教的绝对不可

能性：即缺乏神秘的堕落行为、救赎和永恒地狱。

现在我们转入对这个思想的详细评论，前面我们对这个思想只是提出了一个主题——对阿辽沙的惊叹："这是叛逆"，伊万满腔热忱地回答说：

——叛逆？我不想从你那里听到这句话。是否可以靠叛逆生活，这我不管，但我愿意这样生活。你直接告诉我，我叫你，请回答：假如你自己建立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后使人们幸福，最终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是，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哪怕是小小的生灵，比如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前胸的小孩，在他那没有获得报偿的眼泪之上建立这座大厦，那么你是否同意在这些条件下成为建筑师，请你回答，别说谎！

——不，我不能同意。——阿辽沙低声说。

——你是否允许这样的思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立大厦的那些人自己同意在一个被残害的小孩没有获得报偿的血的基础上接受自己的幸福，在接受了这个幸福后，他们将成为永远幸福的人？

关于反抗上帝自身的问题就被归结为人的良心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和高尚的特征，只有这个特征使其拥有者超越于残酷的自然界，面向仁慈的上帝。在答案上是不能犹豫的：如果人类说："是的，我能接受"，那么它立即就不再是人类，不再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是变成野兽的集合；但否定的答案肯定和证明了对永恒和谐的放弃，——以此把一切都变成了混乱……

阿辽沙处在惊慌之中；他否定在这个条件下接受世界和谐的可能性，突然，他闪烁着两眼说："哥哥，你刚才说：整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能够而且有权宽恕？但这样的人有，他可以宽恕一切，宽恕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并为了一切去宽恕。你

忘记了他，大厦将建立在他上面，人们对他喊：你是对的，主，因为你的路敞开了。"

——"啊，这是唯一无罪的人和他的血。"伊万说，他没有回答，而是建议给弟弟讲述一个传说，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时，这个传说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描绘出来了。阿辽沙准备好了要听下去，伊万开始讲述。

[注释]

① 约翰《启示录》21:1,4.

② 这个思想的第一个概要是在《白痴》(1868年)里，1882年版，第537－538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经常返回到这个思想(比如1877年五—六月的日记，第三章)。参见附录。

③ 在《普希金讲话》里(《作家日记》，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研究塔吉扬娜(Татьяна)以及她的拒绝后(为了满足自己爱的情感，不伤害一个年迈的丈夫)，他已经以自己个人的名义问："难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不幸的基础上？幸福……在于精神的最高和谐。用什么来安慰他，如果发生的是一个不幸的，残酷的和惨无人道的行为……请问，如果您自己建立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在最后使人们幸福；最终给他们以和平和安宁。你再想一下，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仅仅是一个人……您会同意在这个条件下成为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第7卷，第424页。)由这个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说的一切，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说的。

十一

场面转移到一个遥远的国度，遥远的西方，时间流逝，16世纪开始了，这是欧洲文明的各种因素混合和斗争的时代：去新发现的美洲的最初旅行和宗教战争，路德和罗耀拉(Лойола)，轰动

一时的人文主义者和耶稣会的第一批将军。然而，这场斗争的喧哗和慌乱发生在大陆的中心；在另一个地方，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Пиренеи)的背后，人们只能看到这遥远的斗争，这里的人们牢固地封闭在自己之中，仍然是没有什么举动。在更远的地方，在很久远的年代，看得见一个贫穷的、受阳光沐浴的国家，在这里实现了伟大的救赎秘密，为这大地的罪恶，为拯救深受折磨的人类，在这里，血流向了大地(指耶稣之死——译者)。这个秘密的实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五个世纪了；庞大的帝国灭亡了，在它的群岛上产生了其他新的民族和国家，它们有了新的信仰，靠着自己的上帝和救世主的救赎的宝血而获得巩固。他们怀着难以遏止的渴望和希望等待着上帝，等待着他的弟子留下的诺言的实现："看哪，我必快来"，[1]关于这个时间，他自己在人间的时候就曾说过："那日子，那时辰，子也不知道，惟独天父知道"。[2]甚至人类怀着更深刻的信仰等待着他的到来，因为人们已经有十五个世纪没有听到从天上来的保证了：

没有来自天上的保证，
请相信内心的声音……

只有对神圣的话语的无限期望在支持着人。"但魔鬼不肯打盹，在人类里已经发生了怀疑。正巧在北方，在德国，出现一个可怕的新的异端。一个好像火把[3]的庞大星体落在了水源上，于是水变苦了。"但是，剩下的信徒更热情地相信了。人类的眼泪涌向他；一如既往地等待他，爱他，寄希望于他，渴望为了他而受苦和死亡，和以前一样。于是，"人类怀着信仰和热情祷告了许多世纪：主，向我们显现吧！许多世纪人类都在祈求他，他怀着无限的同情愿意下来到祈祷者面前。"

场面继续发展，故事开始集中。塞维利亚城(Севилья)出现了，在其炎热的街道上，一个安宁的夜晚来临了。人群来来往

往;突然他出现了,——"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还是在十五个世纪前当他33岁时在人们中间出现的那个人的形象里出现的。"从形象和外表上看,他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但奇怪的是,

所有人都认出他了。人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拥向他,围着他,聚集在他周围,跟随他。他默默地在他们中间走,带着无限同情的宁静的微笑。在他心中燃烧着爱的太阳,在他的眼睛里闪耀出光明、启蒙和力量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身上,用响应的爱震撼他们的心。他把手伸向他们,祝福他们,只要一接触他,甚至只是碰一下他的衣服,就有治疗的力量。人群中一个从小就瞎了眼的老头喊道:"主,治愈我,让我看见你",仿佛一个鳞片从他的眼睛上脱落,盲人看见了他。人们哭着,吻着他走过的土地。孩子们把花扔到他面前,唱着歌,对他喊着:"奥莎那(Осанна)!"——"这是他,这就是他",所有的人都在重复着,"这应该是他!这不是别人,就是他!"这时他在塞维利亚教堂前的台阶上止住脚步,就在这时,人们哭着把一个敞开的儿童的白色棺材抬进教堂:在棺材里躺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她是一位著名公民的独生女。死去的孩子整个躺在鲜花里。人群里有人对小孩的母亲喊:"他会让你的孩子复活的"。出来迎接棺材的教堂神父疑惑地看着,皱着眉头。这时,传来了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痛哭声,她跪在他的脚前,把手伸向他,喊道:"如果这是你,那么就让我的孩子复活吧!"送殡队伍停下了,棺材放在了他的脚前,他同情地看着,他的嘴唇再次轻声地说:"塔利法,库米"——"起来吧,女孩"。小女孩在棺材里仰起身,坐起来,睁大眼睛惊讶地朝周围看着[④],笑着。在她的手里有一束白色的玫瑰花,她曾拿着这束花躺在棺材里。人们惊慌了,发出叫喊声和哭泣声。

在这个时候，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子走过教堂，他的脸十分消瘦，穿著一件粗糙的毛制的教士长袍，他是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同时是国家的宗教大法官（Великий Инквизитор）。他停住了脚步，从远处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他的目光变得阴沉起来，人们的呼喊声传到他那里，他听见了老头子们的哭声，以及孩子们喊的"奥莎那（Осанна）"，看到从棺材里起来的小孩；他转过身来，用手势召唤神圣卫队，把慌乱和庆祝会的肇事人指给卫队。"已经被驯服的，顺从的，战战兢兢的"人们向两旁闪开；军人走到他跟前，抓住他，把他带走。人群跪在这个闷闷不乐的老头子面前，他为人群祝福，并继续向前走。俘虏被带到神圣法庭黑暗的地下室里，被关在那里。

晚上的一幕结束了，开始了"安宁的和寂静的"南方之夜。空气仍很热，充满着强烈的"开了花的桂叶和柠檬的"香味。在一片寂静中突然监狱大门生锈的合叶嘎吱嘎吱地响了，门开了，老头子——宗教大法官走进地下室。在他进来之后，门立即被关上，他和自己的俘虏单独在一起。宗教大法官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脸，把昏暗的灯放在桌子上，走近他，低声说：

——真是你吗？是你吗？但他没有得到回答，又急速地接着说："你别回答，请沉默。你又能说出什么来呢？我太了解你要说的话了。你甚至没有权利在你以前曾经说过的话之外再加上任何东西。你为什么来妨碍我们？因为你来妨碍我们，你自己知道这个。但你知道吗，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想知道：这是不是你，或者只是他的类似物，反正明天我将审判你，在火堆上把你烧死，就像烧死一个最凶恶的异端教徒一样，今天吻你腿的那些人们明天将在我一挥手之下，争先恐后地去给你的火堆添柴，——你知道这个吗？是的，你可能知道这个"。

他在深刻的沉思中加上了这句话,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的俘虏。

在这些紧张而激动的话语里已经包含了以后辩证法的全部变化形态:对他的神性的承认直到对他的清楚的感觉,到直观;对他的恨达到了威胁的地步——明天就把他除掉,烧死他和踏死他。这是人的心灵及其永恒根源在历史上的最大的结合,同时也是一种分离。从远处看,展示的将是对待人民,对待上百万教民的心灵的某种奇怪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关怀,就是说已经是一种爱,同时是一种轻视,是某种欺骗,是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在俘虏的沉默中,以及在"是的,你可能知道这个"这句话里,流露出一个亵渎神明的思想,即对救世主自己而言这里展现的场面揭示着某种新的和突如其来的东西,某种伟大的秘密,他以前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是现在才开始理解它。人企图向他说出这个秘密:这个"颤栗的人"感觉到自身有这样一种信念的力量(这信念是从自己全部命运中得来的),以致于他不害怕在自己的造物主和上帝面前带着这个信念,站在这个信念一边。

在下面的全部坦白中(这是老头子说的),揭示的是罗马教会的主导思想;但很难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即这个主导思想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信仰,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最智慧的和最深刻的意识,既有过去的命运,也包括未来的命运,后者是这是主要的。当然,西方教会只是对基督教的罗马式的理解,如同东正教是对基督教的希腊理解、新教是对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的理解一样。但问题是,普世教会分裂为三个分支,在所有这三个分支中,只有第一个分支长到了自己力量的整个顶点、其他两个只是在成长着。天主教在自己的内在结构上已经完成了,结束了,它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意义,直到我们的时代它一直不可遏止

地企图把这个意义贯彻到生活中去,使历史服从它;相反,其他两个教会与这种对自己的如此清楚的意识格格不人。[①]不过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大法官在与基督独处的时候表述的奇怪的坦白无法自制,必然要扩展到极限,扩展到整个人类,整个历史。

他从这样一个论断开始,即基督留下的全部学说,如上帝所保留的那样,是某种永恒的和静止的东西,如同教堂封顶的石头,如同放在整个历史的已经建好的部分的基石,现在要在其中进行某些修改,解释或限制都已经晚了:那将动摇十五个世纪里的创造性的工作。这不但是针对人类,人类是不能经常地重建的,而且还针对上帝——那将是新的启示、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补充,这不就是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不充分性的意识吗?这是谁说过的东西?是上帝自己说过的!最后,这是最主要的,类似的补充将是对人的自由的破坏:基督给人类留下了自己的形象,人类可以靠自由的心来仿效这个形象,把它当作符合自己的(隐藏的神的)本性的理想,这理想能满足自己模糊的嗜好。这个仿效应该是自由的,其道德价值就在这里。然而,任何来自天上的新启示仿佛都是奇迹,都将把强迫带入历史,都将把选择的自由从人们那里剥夺,与它一起被剥夺的还有道德功绩。因此,宗教大法官不顾及基督,在想到基督已经许诺的第二次来到人间时,他说:"现在你根本不要来"……"至少暂时不要来",宗教大法官对自己进行了纠正,他考虑的是自己在人间的事业暂时还没有结束。

他一直奇怪地若有所思;在救世主面前,他觉得在他的伟大训诫和现实之间的对比是十分清楚的,这在他身上引起忧郁的讽刺。他提醒基督,在十五个世纪以前,他经常对人们说:"我想使你们成为自由的人",并补充说:"现在你看到了这些自由的人

们了"。这个批评的讽刺不但针对基督想要用自己的学说提升的人,而且也针对他自己,他继续说:"这个事业对我们来说代价太高了,但我们以你的名义终于完成了这个事业。十五个世纪以来我们受这个自由的折磨,但现在这一切结束了,彻底地结束了。"

这里说的是权威的原则,这个原则一直深刻地贯彻到罗马教会里。不容忍偏离教义,这也是其他教会所固有的,但在罗马天主教会那里,这个不容忍性远比在其他教会里更强,其原因就在这个原则上。描绘的场面发生在十六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权威和不容争议的服从的必要性特别地是由罗马强行制造的,这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威胁性,它破坏了西欧一千多年的精神统一。这个统一表现在这样的现象里:宗教裁判制度和书刊检查;这个思想的创始者是:托兰特会议(Тридентский собор)和耶稣会及其关于绝对服从[6]长者,彻底压制个体意志的学说[7]。在我们所研究的《传说》里,到处都在指明天主教的基本特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特征符合了人类的某种永恒的需求,因此表达了人类历史永恒而必然的特殊性。这一点从宗教大法官的进一步解释里可以看清楚;他说:

"只有现在,当我们克服了自由的时候,才有可能第一次想到人们的幸福问题。人造出来就是叛逆的;难道叛逆者能够成为幸福的人?"——他问道。

基督把真理带到了人间,宗教大法官则说,人的人间生活是由痛苦和永恒地逃避痛苦的规律支配的,或者,如果这个逃避成为不可能的,——那么就永远地循着最小痛苦的道路。在真理(绝对的,只属于绝对的上帝)和这个痛苦的规律(人由于自己本性的相对性而服从这个规律)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深渊。谁有本事,谁就引导人走第一条路,宗教大法官永远走第二条路。

宗教大法官就是这样表达的：他不否定救世主带来的真理的高度，他否定的只是这个真理和人的本性的一致性，同时还否定人跟从真理的可能性。换言之，他否定在救世主的训诫上建立人的人间命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断定，必须在另外一些原则上建立人的人间命运。

他立即转入到这些原则上。但在对它们进行研究之前，我们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自由的观点上的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地下室手记》时期开始发生的。和在这里一样，在那里，人的自由意志被描绘成在人间彻底地安排人的命运的主要障碍；但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被否定的只是类似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自由本身仍留给人，被当作是人的最珍贵的特征。在那里，在对这个自由的观点中有某种赞许，而且在这个赞许里可以听见一个还没有疲劳的人的精神饱满的语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明显的满足为自己描绘这样一副画面，在终于达到了的普遍幸福的时刻，突然出现一个人，他有一副"冥顽不灵的和好讥笑人"的面孔，他对自己幸福的，只是多少有点寂寞的兄弟们说："怎么样，我们是否用脚把这一切高尚理性一下子消灭干净，唯一目的是把所有这些对数都打发去见鬼，以便我们重新按照我们愚蠢的意志生活。"[⑧]从那时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他语调中没有了以前的精神饱满，再也没有嘲讽和玩笑。他在自己身上承担了多少为人而遭受的痛苦，多少对人的痛恨——他以后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对此的见证，其中就有《罪与罚》，在这里有顺从的受苦者，以及无谓的折磨者。疲劳和悲伤在他身上替代了从前的信心，而对安慰的渴望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说》里。自由、真理、道德功绩的最高恩赐——这一切都被消除，因为它们成了人的负担和累赘；有一个东西在呼唤：这个东西就是对"可怜的叛逆者"而言的某种幸福，某种休

息,这个叛逆者毕竟是受尽折磨,毕竟是个病态的存在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对他的同情压倒了其他一切,包括对神的和高尚人性的东西的任何激情。"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人的命运的彻底安排的思想,这在《地下室手记》里无疑被否定了;但区别是,在那里说的是理性的建设,它建立在对物理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规律的精确和细致的研究基础上,而这里说的是宗教的建设,它来自于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最深刻的研究。

大法官对基督说:"人们曾警告过你,在警告和指示方面你是不缺的,但你没有听信这些警告和指示,并放弃了可以把人安排成为幸福的人的唯一道路。"之后他表述自己的思想,如果严格地遵循这个思想,那么就不能不感觉到某种恐惧,越是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思想的不可抗拒性,这个恐惧就越是增长。业已实现的世界历史的线索,可以预测到的人的未来命运,神秘的昏暗以及不可遏止的对信仰的渴望和对相对于他而言的某个客体的存在的失望之间无法认识的结合,这一切在这里都以惊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整体上构成了下边的话语,我们不能不把这话看作是人关于自己所能想出来的(从对人而言的一个可能的观点看)最深刻的、最具洞察力的和最智慧的东西。

[注释]

① 《启示录》,22: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② 参见《马太福音》24:36。——译者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即教会"。从天上降落的星的形象是从《启示录》(8:10,11)里借用来的,和以下的那些类比一样,它们都表达着基督教会在人间的命运。在此处表达的是对宗教改革的观点,把宗教改革看作是教会的类似物,这个类似物用其与教会的表面上的类似来吸

引人们,借此使人们离开真正教会;"水源"——在这里是指被教会的"类似物"给污染了的"纯洁的信仰"。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这副惊人的画面注入了惊人的活力:我们仿佛不是在读这些文字,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是——基督在人们中间的第二次出现的场面,几乎是在我们的时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里有一些地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个幻想的和超现实的情景的奇怪的、无法认识的活力。在这个传记里写道:"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人们的聚会,这些人与一切宗教都格格不入,甚至是敌视一切宗教。在说话的人中间突然有一个人提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不十分尊敬地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色突然可怕地苍白了,他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这还是在他青年时期,显然,那时他已经富有洞察力地思考基督的形象了。"后来,在他流放的时期,福音书是他可以阅读的唯一的书,他经常重复阅读福音书上的故事,显然他十分深刻地领会了这些故事,清楚地感觉到了那里所传达的一切……最后,他对女孩的复活的描写到了这样的地步,仿佛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为自身的发生,这个描写也有传记方面的解释。我们在他的履历(参见《传记与书信》,第一部分,296页)中可以读到:"女儿的出生(1862年2月22日)对夫妇俩是巨大的幸福,并且使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活跃。他在她的小车旁度过了自己所有的自由时间,对她的每个动作感到喜悦。但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三个月。她的死是个可怕的、突然的打击。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生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第一个女儿,总是满怀内心痛苦地回忆起她。在去埃姆斯(Эмс)的一次旅行中,他特意去了日内瓦,到她的墓地前呆上一会。无疑,在写上边我们引用的那个片段时,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即希望可爱的女儿奇迹般地从棺材里起来。

⑤ 新教为个性地理解基督教发现了自由,它不但在现在不是某种完成的、彻底的东西,而且在将来也不是,显然,它永远也无法获得类似的完善。至于东正教,那么至今它还处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外部的排挤,有时来自于野蛮(蒙古人的残暴统治),有时来自伊斯兰教(土耳其人的残暴统治),最后来自天主教自身。因此,保持自己的存在,履

行在被分离的和被贬损的各个民族中间进行灵魂的拯救所必须做的一切——暂时就是东正教的全部历史工作；至于说把自己隐藏着的内在内容揭示出来，放在清楚的意识上，——它还没有能力关心这个问题。斯拉夫派（如霍米雅科夫和尤·萨马林）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解释东正教在历史上的独特性及其理念的企图，都可以用东正教的这个状态来解释，而且在另外一个状态下这些企图是不可能的。

⑥"在年长于你的人手下你要驯服，如同朝圣者手中的拐杖"等。

⑦"Cadaver esto"，即你要成为无个性的，像死尸一样安静。

⑧《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第九章。另见第十章，选择社会－历史建制中临时的鸡窝，而不是"水晶宫"，正是因为鸡窝不是最终的，不永远地消灭自由，水晶宫正是由于自己的不可毁坏性而令人痛恨。

十二

宗教大法官开始说道：

可怕的和聪明的魂灵，自我毁灭和非存在的魂灵，伟大的魂灵曾经在旷野里和你说话，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似乎曾诱惑你……是这样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他在三个问题中向你宣布的东西更真实了，但你拒绝了，在圣经里这被称为诱惑。然而，如果说在人间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真正的、伟大的奇迹的话，那么它将发生在这三个诱惑出现的那一天。这三个问题的出现就是个奇迹。如果可以这样设想（只是为了实验和例证），可怕的魂灵的这三个问题在圣经里已经完全消失，但应该把它们恢复，重新构想和编造出来，以便重新再放进圣经里，为此召集地球上所有智者——统治者、最高祭司，学者和诗人——给他们提出任务：构想和编造出三个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但要符合事件的规模[①]，而且除此之外还要把世界和人类的整个未来历史表达在三个词里，只

表达在人类的三句话里——那么你是否认为地球上的整个智慧联合在一起能够想出就力量和深度而言哪怕是与当时勇敢和聪明的魂灵在旷野里确实曾给你提出的那三个问题类似的某种东西来？仅仅根据这些问题，仅仅根据这些问题出现的这个奇迹，就可以理解，你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人类日常智慧，而是永恒的和绝对的智慧。因为在这三个问题里预示着人类整个未来的历史，这个历史在此处仿佛集中为一个整体，——这里显现出三个形象，在这三个形象里聚集了整个地球上人类本性中无法解决的全部历史矛盾。这在当时还不能被如此明显地看出来，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现在，当过了十五个世纪后，——我们看到，在这三个问题里，一切都被如此准确地猜测到和预言到了，被证明了，以致于再不能对它们进行任何的增加和减少了。

过去历史上的十五个世纪在这里之所以被提到，仅仅是因为宗教大法官和基督的谈话自身是发生在十六世纪里的事件；但这个谈话是在十九世纪里写的，假如我们可以不严重破坏逼真性的话，那么宗教大法官应该同意这样的说法，即这件事针对的是整个十九个世纪；他下面所说的和用"这在当时还看不出来"这句话所指的一切，——只有在我们当今的世纪里才彻底地表现出来，在所描绘的场面发生的那个时代，甚至任何前兆都没有。无论有多么奇怪，把在十九世纪里展现的历史矛盾转移到发生在十六世纪里的谈话中，不会产生任何不好的印象，甚至这个做法都无法被觉察到；在我们所研究的《传说》里一切暂时的东西完全都退居次要地位，只有人身上的深刻而永恒的东西才到前面来，以致于在《传说》里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混合在一起，仿佛是把整个历史时间合并到一个时刻上来，这不但不是某种荒谬的东西，相反，是完全合适的，显得是必要的。在上边引用

的宗教大法官的话里我们感觉到，他自己仿佛忘记了自己说的话是针对另外一个人的：这话听起来仿佛是独白，是一个90岁老人信仰的自白，这话越往下展开，就越清楚地表现出一个因其"高大和挺直的体形"而显得矮小的和衰竭的十九世纪的人的身材，这个身材更多地是在自己的心灵里承受着，而不是这个老人体力上承受的，尽管他也"在旷野里吃过蝗虫和野蜂蜜"，然后又"ad majorem gloriam Dei（拉丁语，为了上帝的伟大荣誉）"而烧死上百个异端。

宗教大法官从这三个仿佛形象地代表了人的未来命运的诱惑的观点出发，在分析这些诱惑自身的意义时，开始谈论这些命运。于是，对历史意义的揭示，还有仿佛是对人的道德力量的衡量，在这里都是以对福音书上一个片段的广泛解释的形式给出的。关于包含在第一个"魂灵问题"中的诱惑自身在《马太福音》里是这样记述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十四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1－3)

> ——你自己判断，——宗教大法官说——谁是正确的，是你，还是当时问你的那个人？你回忆一下第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原话[2]，但其意义是这样的：你想进入人世，却空着手去，带着自由的某种誓言，但是他们由于自己的平庸和天生的粗野而不能理解这个誓言，他们担心和害怕这个誓言，——因为对人和人类社会来说再也没有比自由更难以忍受的东西了！[3]你看见这不毛的炽热的荒漠上的石头了吗？只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人类会感激和顺从，尽管它永远在颤抖，因为担心你

> 会收回自己的手，不再给他们你的食物。但是你当时不愿意剥夺人的自由，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你是这样想的，如果顺从是用食物换来的，那么这还算是什么自由呢。你反驳说，人不单靠食物活着：但你知道吗，就为了人间的这个食物自身，大地上的魂灵起来反抗你，与你厮杀，战胜你，于是所有人都会跟魂灵走，并喊着：谁能和这野兽相比，他从天上给我们取来了火！

在这里，在启示录的形象里表达了人身上全部人间的、向下降的东西对人身上全部天上的、向上升的东西的反抗，并指出这个反抗的胜利的结局，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个胜利结局的忧伤的见证人。贫穷、令人忧郁的痛苦、没有被温暖的肢体和饥饿的肚子的疼痛将压制人的心灵里的神的东西，他将拒绝一切神圣的东西，去敬拜粗野的，甚至是低级的，但却能给人以食物和温暖的东西，如同敬拜新的圣物一样。他将嘲笑自己以前的义人，如同没有用的人一样，敬拜新的义人，开始用新的义人编制新的圣人日历，纪念他们的生日，并把他们当作是"人类的恩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基督教是正在衰老的宗教，他企图用新的宗教崇拜的某种类似物取代基督教，也有为纪念伟大人物而设立的节日和庆祝，——随着对上帝的服务减弱，崇拜为人类服务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广泛地传播着。人类把自己神化，它现在只注意自己的痛苦，用疲倦的眼睛四处寻找，看谁能消除这些痛苦，平息或者至少压制这些痛苦。胆怯的和颤抖的人类准备奔向任何一个能够为它做点事情的人，准备虔敬地敬拜能够用成功的机器减轻它的劳动的人，用新的化合物给它的土地施肥的人，哪怕是通过永恒的毒药的途径来解除其暂时疼痛的人。慌乱的、遭受痛苦的人类似乎是丧失了完整的意义，仿佛在自己生活的细节之外看不见主要的和巨大的恶，这恶从四面八方向它的生

活逼近：人越是企图克服自己的痛苦，这痛苦就越强大，成为无所不包的，——于是人们忘记上帝，诅咒自己，并且已经不是单个地死亡，不是成千地死亡，而是上百万地，整个民族都将死亡，越来越快，越来越无法遏止。

下面我们引用圣约翰的启示录里的宏伟形象，启示录是关于上帝教会在人间的命运以及人类命运的启示，这人类在教会周围骚乱，努力消灭教会；这里的形象寓言式地表达了这些命运发展中的各个环节，并以自己的特征决定这些命运共同的、摆脱了一切细节的意义：

> 我站在海滩上，看见一个兽从海中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龙[1]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2]，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它与圣徒交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它，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它。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启示录》13:1－10)

在这个惊人的形象里表达的是：知识和佣金：能供给食物的，但已经不能照耀人的知识；用来换取物质恩惠的精神恩惠的巨大佣金，纯洁良心的佣金。随着对"单一的食物"的关心，祭坛被关闭，伟大的建设性的力量消失，人们重新开始在沙土上建立大厦，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智慧建造自己生活的巴比伦

塔、宗教大法官在自己感人的话语里指明了这一切，并预言，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你知道吗，——他说："再过几个世纪，人类将借助智慧和科学之口来宣告，没有犯罪，因此也就没有罪孽，只有饥饿的人。""先给食物，然后再向他们问美德！"这就是他们举起来反对你的旗帜上写的话，他们将用这旗帜摧毁你的圣殿[①]。在你的圣殿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大厦[②]，重新建造可怕的巴比伦塔；尽管这塔不能长久，这和以前的那座塔一样，但你毕竟还是可以防止人们建造这新塔，使人们的痛苦缩短几千年，——因为他们会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受这塔折磨已一千年！[⑧]那时他们会在地下，在地下墓穴里寻找藏在那里的我们——因为我们将再受驱逐[⑨]和折磨——他们会找到我们，并对我们喊："给我们食物吃吧，因为那些许诺给我们天上的火的人们[⑩]，没有给我们这火。"那时候我们将建造完这塔，因为谁能给他们食物，谁才能建造完这塔，只有我们能给他们食物，用你的名义，——我们假借你的名义。噢，没有我们，他们永远也不能喂饱自己，永远也不能！只要他们还是自由的，那么无论什么样的科学都不能给他们提供食物，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并对我们说："最好还是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⑪]最终他们自己会明白，兼得自由和地上充足的食物对任何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在自己之间合理分配！[⑫]他们也会坚信，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人，因为他们是软弱的、罪恶的、渺小的，是叛逆者。你向他们许诺天上的食物，但我再重复一遍，在软弱的、永远是罪恶的、永远忘恩负义的人的种类眼前，这天上的食物能够和地上的食物比吗？如果说有上千人、上万人为了天上

的食物跟随你，那么上百万、上亿的人该怎么办？他们没有能力为了天上的食物而放弃地上的食物

[注释]

① 他对现实的感觉是十分清楚的；我们突出这个语调，是因为经过变化后，它出现在《传说》的各个地方，在感觉的清晰性上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仿佛"事件"自身从来未曾有过。

② 确实，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魂灵诱惑了神人不是在他为拯救人类而进行服务的中间某个时候，而是在进入这个服务之前。因此，这个和上帝斗争的老斗士，人类的敌人仿佛是引其他可能的拯救方法来诱惑神人的，指出了为此应该走的另外的道路，而不是他的神圣学说和十字架上的死亡。诱惑正是针对耶稣基督的整个服务事业，所以，诱惑者所建议的食物、奇迹和权力确实是三个另外的，不是天上的、不是神圣的，不是恩赐的和神秘的拯救方式。

③ 这个十分深刻的思想最初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7年在其最混乱的作品之一——《女主人》里表述的，参见《选集》第2卷，1882年版，第347页。在那里是这样说的："软弱的人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克制自己的……只要给他一切，他自己就会来，把这一切都退还；你试一试，把半个人间的国家给他拥有，——你认为会怎样？他会到坐椅底下躲你，——他会这样来请求你，让他这个软弱的人自由——他自己会把这自由捆起来返回给你"，等等。这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主要思想在他那里很早就产生了，只是在对这些思想进行肯定或否定上，他后来犹豫了几十年，但在这些思想中他没有再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④ 即根据启示录，这是从上帝那里堕落的第一个魂灵。

⑤ 我们宁愿等待"兽"，——然而，启示录的形象保留了惊人的精确性、以及这些形象与现实意义的一致性。

⑥ 这里指的是犯罪相对性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犯罪和人所实现的其他事实系列没有任何区别，和其他事实一样，犯罪也是由环境、教育和一般的外部状态的影响引起的，完全由这些外部状态决定的意志没

有能力不去实现某个事实，在这里就是犯罪的事实。所以，这个意志是不自由的，因此也是无辜的("没有罪孽")。《罪与罚》，《群魔》(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最后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被看作是对十九世纪的这个思想的艺术—心理的批判，在这个世纪里不知为什么最伟大的思想家也都迷恋这个思想，还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个思想的否定，把它当作是与事物本质不符的、非真理的思想。关于这一点，参见上边的叙述。

⑦ 由于个体意志的无辜性的理论，所有犯罪，和任何恶一样，都被归结为社会不合理的建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原因。由此，关于与恶斗争的问题就被归结为人类社会的完善建制的问题，——这就把一个理论思想作为根本原则引入到历史之中，取代了在历史里起作用的无意识的力量。

⑧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坚定地指出(比如在《群魔》里)，科学在推翻人身上的自由意志和犯罪中的绝对性之后，便使人达到了吃人的地步，——到那时，"大地就会在绝望中为旧的神哭泣"，人们将重新转向宗教。因此，他认为，对上帝的皈依将结束历史，在未来等待人的灾难越多，这种情况就越是必然地要发生。

⑨ 这里说的是无法忍受的迫害的本质，自我毁灭的和不幸的人类就用这些迫害来反对宗教，但只是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即在皈依上帝之前。迫害不是反对教会，而是反对人身上的宗教原则自身，在上个世纪末的法国有过迫害，现在，迫害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仍在爆发，这些迫害可以被看作是彻底根除宗教原则，在人间处处消灭宗教原则的企图的最初的和表面的预兆。

⑩ 即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在人间安排人的理性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新的劳动和财产的组织形式的理论家。

⑪ 经济灾难将导致(已经导致)忘记所有其他理想，这些理想一开始是与平均分配财富的理想不可分割的：极端的民主主义者现在对政治和社会自由(立宪制)漠不关心，对待科学和教育的成就也一样，他们准备无所谓地与军事专制，以及与教会对国家的胜利结合在一起，只要力量

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给所有人以食物",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教会的力量。

⑫ 对"单一的食物"的关切将使人们的良心暗淡,与良心一起暗淡的还有同情心:因为既不能把这些情感加到"食物"上,也不能从"对食物的关切"中推导出这些情感。每个人都为自己拿最多的东西,而不是他有权根据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应该拿的那么多,因此天才便要求,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应该离开丰盛的宴席,因为他们将从他那里拿走多余的东西。在关于在经济原则上建立社会的问题中,根据权利——suum cuique(各得其所应得),根据"人的心的真理"——"上帝为了所有人",进行分配生产产品是最主要的难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理论家之间无限分歧的对象;如果他们在思想上是如此不可调和,在著作中如此不能一致,那么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在现实中的无法解决将导致什么样的冲突混乱,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欲望,嫉恨和愤怒因有需要而不减弱,怜悯心也十分顽强,最终,任何辩证法在这里都因有心灵的人的诚实的不理解而瓦解。现在就可以预见,社会危机根据自己内在的愿望而被解决后,它将以直接对立的口号出现,"消除没有能力的人,把他们藏起来,消灭干净,奴役他们",还有——"不要天才,天才是多余的……他们会用自己精神之美来伤害我们的贫穷,他们是危险的。"尼采的哲学在我们的眼前在欧洲获得传播,这个哲学是前一个口号的早期的、但十分勇敢的表述。

十三

——或者你所珍重的只是几万个伟大的和强有力的人,——宗教大法官接着说,——其他上百万人,多得像海边的沙子一样的弱者,但却爱着你的人,只能成为伟大的和强有力的人脚下的泥土吗?

这些话在他的思想里开始了一个转折，这个思想转向了历史的永恒意义，这个意义与绝对真理以及仁慈是不相容的。暂时这个思想只是粗略地被指出来了，以后宗教大法官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否定。

有这样一种十分著名的观点认为，文化的高层社会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优秀人物造就的，他们具有很高的能力；为了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和不匆忙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获得了保障和空闲时间，依靠的是大量群众的劳动和赤贫生活的痛苦。我们越过这个观点，它太粗陋了，不值得研究。为了使宗教大法官以下的话更清楚，我们引用约翰启示录，就是关于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被拣选的人和义人是很少的"。显然，在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思想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个高尚的和深入人心的形象：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的羔羊。

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约翰福音》14:1－5)

在这个形象里有多么神奇的和多么诱人的理想；它在我们身上激起了忧郁的愿望；只要我们看一看它，我们将很少对福音书在从古代世界向新世界的过渡中所实现的、深刻的和快速的

变革感到惊讶。

但这毕竟是因为，这个理想的美是如此伟大，以致于仅仅向它的突破就能给予幸福——在我们身上立即就会唤起对那些"多得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的"人的无法遏止的怜悯，这些人从自身中分离出"十四万人"——他们自己却不知被遗忘在哪里了，成了历史上被践踏的人了。[1]

这个怜悯感也充满了宗教大法官的心灵，他坚定地说："不，我们也珍重弱者"，于是在他的大脑里很快闪现这样一个思想，他和那些理解他的人如何安置这些弱者：但这时完全剩下他们自己来安排，以他的名义，但没有他，尽管缺乏另一个建设性的思想。

他接着说：

> 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叛逆，但是，最终他们会成为驯服的。他们将对我们惊叹，把我们当作神，因为我们作为他们的首领，同意承担起自由，并统治他们，——最终他们是十分害怕成为自由的人！但我们说，我们听从你，以你的名义统治。我们又在欺骗他们，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让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痛苦就在这个欺骗里，因为我们必须说谎。

然后他过渡到人的心灵的永恒要求，他知道这些要求，并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可以也应该建造人的人间生活的最终的、永恒的大厦。他接着说：

> 在食物的问题上，包含着整个此世的伟大秘密；如果接受了食物，那么你就回答了人的普遍而永恒的烦恼，无论是作为个别人，还是整个人类的烦恼——这就是："该崇拜谁"的问题。对于已经成为自由人的人而言，再没有比尽快寻找一个可以崇拜的人更令他不断地和痛苦地关心的问题

了。但是,人寻找崇拜的对象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以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同意对它的普遍崇拜。因为这些可怜的造物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说出我或者他人应该崇拜什么,而是说出所有的人都相信和崇拜的是什么,以便必然是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对崇拜的普遍性的这个要求就是每个人单独地以及整个人类从纪元之初开始以来最主要的痛苦。为了普遍的崇拜,他们用剑相互残杀。[②]他们制造了诸神,相互挑战:"放弃你们的神,来崇拜我们的神,不然的话就让你们和你们的诸神死亡。"如此将持续到世界的末了,甚至持续到诸神在世界上都消失的时候:反正都一样——人们都会陷入到偶像崇拜的。你知道,你也不能不知道人的本性的这个基本的秘密;但是你拒绝了那唯一的、绝对的旗帜,这面旗帜给你是为了迫使所有的人无可争议地崇拜你,——这就是地上食物的旗帜,你拒绝这旗帜是为了自由和天上的食物。你看,你以后又干了些什么,——而且一切又都是为了自由!我告诉你,人所关心的是找到这样一个对象,以便可以尽快地把自由的恩赐交给它,这个不幸的人一生下来就带着这个自由的恩赐,对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关心更痛苦的了。但是,只有安慰人们良心的人才能控制人们的自由。与食物一起给你的是一面无可争议的旗帜:只要给食物,人就崇拜你,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食物更无可争议了:但是,如果同时假如有个人在你之外控制人的良心,——噢,那时人甚至抛弃你的食物,跟随那个诱惑其良心的人。在这一点上你是正确的。因为人的存在的秘密不在于仅仅是活着,而在于,为了什么而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而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将不愿意活着,宁愿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哪怕他的周围全是食物。[③]确实是这样。

但是,结果又怎么样?你没有控制人们的自由,你却又增加了他们的自由!难道你忘记了吗,安宁,甚至死亡,对人而言要比在分辨善恶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更珍贵?[4]对人来说,最具有诱惑力的是他的良心自由,但这也是最痛苦的。于是,你不去提供使人的良心一劳永逸地获得安宁的坚实基础,而是拿来了一切不寻常的、猜测的和不确定的东西、拿来了一切人们力所不及的东西,因此你的行为仿佛是根本不爱他们似的,——这是谁呢?这就是来为他们献出自己生命的那个人!应该控制人们的自由,而你却是增加了这自由,并且用自由的痛苦永远地加重了人的精神王国的负担。你希望人的自由的爱,以便他自由地跟随你,受你的诱惑和俘虏。古代牢固的法律被取代了,[5]以后人应该自己靠其自由之心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在自己的面前只有你的形象作为指导[6],但是,难道你没有想到,如果用自由选择这样可怕的重负来压制他,那么他最终将拒绝和反驳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他们最终会叫嚷,真理不在你那里,——因为你给他们留下了多少烦恼和没有解决的任务,再没有谁能像你这样置他们于慌乱和痛苦之中了。因此,你自己为破坏自己的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你就不要再责备任何人了。

换言之,来拯救世界的学说正是以自己的高度损害了这个世界,给历史带来的不是和解与统一,而是混乱与仇恨。历史没有结束;然而,它应该结束,各民族在对找到共同的和一致的崇拜的渴望中所寻找的就是这个。它们相互消灭的目的就是为了哪怕是通过许多不妥协的人的灭亡的途径,使剩下的人最终联合起来。基督教没有满足人类心的这个需求,把一切都赋予个体的决定,错误地寄希望于人类对善恶的区分的能力。甚至古

代的,并不十分高尚的,但精确的和严格的法律更能满足这个需求:用石头毒打驱逐了任何违反它的人,因此人们处在统一之中,尽管这个统一是强迫的。能更好地满足这个需求的是"地上的食物",让人们不知道天上的食物,当然,这已经是极其粗俗的手段了。这个手段喂饱人们之后,将使其良心的不安熄灭。

我们下面的说法仿佛没有离开真理太远,即在控制了人类命运之后,为了救赎而求助于"地上的食物",在这里指的是从历史矛盾中的一个可怕的、但确实强大的出路:这是对人身上的心理水平的降低。消除人身上一切不确定的、令人不安的、痛苦的东西,简化[2]他的本性直到一些简单而清晰的愿望,强迫他在此世里去认识,**在此世里去感觉,在此世里去愿望**——这就是满足他的手段,最终安慰他的手段……

[注释]

① 一般地说,《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一章是《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章的变体,在前一章里魔鬼说:"需要毁灭多少灵魂……才能获得一个正义的约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卷、第355页,1882年版)。为数不多的人需要"自由的空闲时间",仿佛他们能够"制造科学和艺术"(贫穷的人和生活在经常性的劳动中的人确实不能制造它们),为了这个空闲时间,需要其他人大量的和过分繁重的劳动,我们丢掉这个肤浅的思想,——我们指出另外一种确实存在的关系,这就是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一个人的拯救"依靠许多人的死亡:通过艰难获得拯救,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过分的;另一方面,在为自己和他们担忧时,杀害他们。唯一最好地解释我们的思想的例子是:高等教育这很好,受所有的人景仰,并诱惑所有的人;因为在童年的时候,针对任何人也不能下判断,他是否有能力接受教育,所以,成千上万的孩子要在困难的、复杂的学校里遭受摧残,以便分离出来几十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不过这些其余的人并不像没有受过教育的、堕落的大众那样,聚集

在这几十个人的周围

② 在《少年》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Макар Иванович)——一个老头子,就形象看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佐西马长老类似,他说:"不崇拜,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忍受自己的,而且任何人也不能忍受自己。于是,上帝被否定,——因为崇拜偶像,木制的偶像,或者是金制的偶像,或者是想象出来的偶像。"——人们拒绝真正的上帝而陷入其中的"偶像"在这里指的是"想象出来的"偶像:神化着的理性及其产物——哲学和纯粹科学;或者,最后,完全是粗俗的偶像,这个理性自身,这个科学或哲学构造的某些个别的偶像:比如,功利主义思想。但在《传说》的这个地方说的是神秘的崇拜,宗教的崇拜,比如对基督的崇拜,对穆罕默德的崇拜等等。

③ 这是一个被正确地指出的特征,这个特征自身以自己的唯心主义使得在《传说》中赋予给人的一切低级的东西都平均化了。

④ 无疑,这是失言,应该是"更方便,更有利、更需要和更好"。

⑤ 即旧约的法律,与新约法律相比其突出特征确实是说明详细、划分清楚和牢固性,还有因违反它的规定将受到的惩罚措施的精确性(参见《申命记》)。如果这一切用法律的术语,可以说,在旧约里给定的是规范,在新约里给定的是原则。

⑥ 在这三行文字里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基督教的实质的观念,并指出基督徒行动的指导性原则:永远在思想上把即将发生的事与基督对比,并自问:他是否会这样做,或者看到后,他会赞同这事,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破坏自己思想中他的形象的完整性(这个形象是由福音书作者向我们转达的),不破坏其全部特征。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真正的原则,如果遵循这个原则,福音书永远也不能遭到强行的应用,如在历史上福音书所遭遇到的应用那样,即从福音书里拿来个别的说法加以应用。比如,天主教文明在"compel intrare"——"迫使他们(被召的人)进来"这个说法(在未婚夫娶亲宴席上,在《关于被召的和没有被召的寓言》里)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存在法律;或者:"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至今许多人还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论证教会对待"世界"(指

整个社会－历史建制）的罪恶、犯罪的不参与态度。
⑦ 在《群魔》里有一个人物，只是隐约被提到（希加廖夫．Шигалев），他表达了对人的本性进行简化，降低其中的心理水平的思想。可以把这个思想看作是《传说》中的这个片段的早期的、更加详细的、有论据的表述。参见附录。

十四

宗教大法官越来越使自己的话倾向于从基督教及其关于自由的学说把人类引入其中的混乱向揭示人类在地上未来的和彻底的安宁的过渡，他转入分析魔鬼的其余两个诱惑。下面就是福音书作者马太和路加记录这些诱惑的话：

>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
>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事奉他。
>
> 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太福音》5:5－11；《路加福音》4:5－13）

在说完基督教里充满的自我破坏性的因素后，宗教大法官转向基督，继续说：

> 然而，向你提供的是什么呢？有三种力量，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它们能够永远地战胜和俘虏这些软弱无力的叛逆者的良心，为了他们的幸福。这三种力量是：奇迹，秘密和权

> 威。你拒绝了这三个东西，自己以身作则。当可怕的和聪明的魂灵把你置身于殿的顶上，对你说："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带着飞走，因此你不会掉下去，不会碰到脚，那时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时你就会证明，你对你的父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听完后拒绝了这个建议，没有听魔鬼的话，没有跳下去。噢，当然，你的做法是高傲的和庄严的，和上帝一样，但是人们，软弱的叛逆的种族，他们是上帝吗？噢，你当时明白，只要你迈出一步，向下跳，那么你就是在考验上帝，就会丧失对他的全部信仰，而且还会摔死在你前来拯救的大地上，诱惑你的那个聪明的魂灵将会欢喜的。

令人惊奇的是对救赎的神秘行为的不信仰，这个不信仰表现在最初几个被标出词里，它与对耶稣的诱惑的彻底信仰结合在一起，这甚至是对这个诱惑的神秘意义的信仰，对魔鬼阻碍作为救世主的他来到世界上的企图的信仰，这个信仰表现在最后几个被标出的词里。

宗教大法官继续说：

> 但我重复一遍，像你这样的人多吗？难道你事实上可以假定，哪怕是一分钟，人们有能力抵御类似的诱惑？人的本性造出来就是为了拒绝奇迹吗，——在这样可怕的生命时刻，最可怕的，最基本的和最痛苦的心理问题[①]的时刻，只能靠心的自由决定吗？噢，你知道，你的功绩被保留在圣经里，直到永远[②]，直到大地的边缘，你指望人跟随你后，不需要奇迹就能成为上帝。但是，你不知道，人一旦抛弃奇迹，立即就会抛弃上帝[③]，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是奇迹。因为没有奇迹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他就

为自己制造新的奇迹,这已经是自己的奇迹了[1],崇拜巫医的奇迹,女巫的妖术[2],尽管他曾经上百次地做过叛逆、异端和无神论者。当人们讥笑你,嘲弄你,对你喊:'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这是你,'你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之所以没有下来,同样是因为你不想用奇迹来奴役人,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你渴望自由的爱,而不是一个奴隶在强大力量面前的那种奴性的惊叹,他永远地被这强大力量吓坏了[3]。但在这方面你对人的评价太高了,因为显然他们尽管生来是叛逆,但他们是奴隶。看一看,然后再进行评价;已经过去十五个世纪了,去看看他们:你把谁提到了你自己的高度?我发誓,人生来比你关于他所想的还要软弱和低贱……[4]你这样尊敬他,但仿佛你不再同情他,因为你对他的要求太多了,这又是谁呢?——就是那个爱他甚于自己的那个人!。你少尊敬他,就会少要求他一些,这将与爱更接近,因为他的负担会更轻些。

由救世主训诫的非凡高度导致的是人对这些训诫的不理解,因为人的心被歪曲了,他的理性暗淡了。他对训诫的高尚的纯洁性、神奇的简单性和神圣性进行嘲笑和侮辱,——与此同时,他还崇拜庸俗的、粗俗的但却能震动其胆怯的想象的东西。宗教大法官强有力的话描绘了一副反对宗教的画面,世界历史刚刚看到这个反抗的一个小角落,他还用具有洞察力的目光看隐藏在这个反抗背后的东西:

人是软弱的和低贱的。他现在到处反抗我们的权力,并且以他在反抗而自豪,但这又有什么呢?[5]这是孩子和小学生的骄傲。这等于小孩子们在班级里起来造反,把老师赶走。但是,小孩子的兴奋将结束[6],他将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把圣殿推倒,血溅大地[10]。但是,这些愚蠢的孩子最终

会猜到，尽管他们是叛逆者，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叛逆者，他们无法承受自己的叛逆自身[11]。最终他们流着愚蠢的眼泪承认，那个把他们造成叛逆者的人，无疑想嘲笑他们。他们将在绝望中说这句话，他们所说的话将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将由这个行为而变得更加不幸，——因为人的本性不能忍受对上帝的亵渎，最终，它自己总是为此进行报复。

然后，宗教大法官给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做一个普遍的总结，他过渡到对自己的秘密的揭示，这个秘密就是通过接受"荒漠里强大而聪明的魂灵"的所有三个建议来修正救赎的行为，——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对人类的爱，为了安顿人的人间命运。他对这个罪恶修正的证明使人想起为数不多的被拯救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上边已经引用过这个形象，即启示录第14章；宗教大法官在想起这个形象时说：

所以，不安，骚乱和不幸——这就是你为人们的自由遭受许多痛苦之后，他们现在的命运！你的伟大先知在幻觉和寓言中说，他看见了第一次复活的全部参与者，每个部族里有十二万人[12]。但是，如果确实有这些人，那么他们仿佛也不是人，而是诸神。他们背起你的十字架，几十年来在饥饿的和不毛的荒漠中煎熬，吃蝗虫和树根，——当然，你可以为这些自由的孩子，自由的爱的孩子，自由而庄严地为了你而牺牲的孩子而骄傲[13]。但你要记住，他们总共只有几千人，而且还都是神，那么其他人呢？这其他软弱的人错在何处，是他们没有能够忍受住强者忍受住的痛苦吗？软弱的心灵错在何处，是它没有能力容纳如此可怕的恩赐吗？[14]难道你真的只是到选民这里来，为了他们才来的吗？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个秘密，这个秘密是无法理解的。

[注释]

① 这里说的是人对救赎的神秘行为的态度，他将靠对这个行为的信仰而生活，——应该用某种更多的东西巩固这个信仰、这个生活，而不仅仅是用基督高尚的面孔。

② 又是一处，在这些话了包含着多么惊人的信仰！

③ 这里带着公正的轻蔑的口吻说的是，在历史上——直到我们的时代——反对宗教的斗争几乎都与反对奇迹的斗争等同，反之亦然；以前觉得是自然界里的超自然的东西一旦被弄清楚，那么人就胆怯地由信仰转向不信仰。

④ 这里指的是科学的最新发现，在更大程度上是指技术发明，在我们的时代，人就靠这些发明过活，他十分喜欢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发明，勉强相信，这些发明是存在的，而且是他自己——人发现了它们。

⑤ 这里说的是一种独特的兴趣，在无神论时代，人们怀着这样的兴趣听从一切奇怪的，独特的东西，在其中自然界的规律将被破坏。可以说，在类似的时代，除了寻找奇迹外，人们不会怀着这样的贪婪寻找任何东西，——但只有一个必然条件，就是这个奇迹不能成为神的奇迹。在《作家日记》里带着讽刺意味提到过的对通灵术的迷恋，无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了人身上的这个心理特征的共性和经常性（试比较当罗马社会在2－3世纪陷入到彻底的无神论时，这个社会的迷信状态）。

⑥ 这里说的是基督教及其简单性和人性相对于人间所有其他宗教的难以理解的高度，在其他这些宗教里，奇迹的因素相对于一切其他因素占绝对优势，这些宗教在历史上是由于对这个奇迹的恐惧而产生的。

⑦ 这是《传说》的主要思想。下面我们还将标出几句话，其中将集中这个思想的含义，或者准确地说——指出这个思想的出发点。

⑧ 这里说的不是与《传说》里的对话同时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因为渗透在这个运动里的深刻信仰的精神十分高，以致于不能用这样轻蔑的话来谈论它（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普希金的讲话》里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句话，论《有一次在荒漠上漫步》等诗）。无疑，《传说》中的话是

由反宗教运动引起的，部分地是十八世纪的，但主要是我们的十九世纪的反宗教运动，在十九世纪里，在与宗教的斗争中投入的努力和严肃性都很少，这和与某些偏见的斗争一样。

⑨ 比如这很类似于在我们的时代对待不久前的反宗教运动的态度，以及在任何其他的，更严肃的时代对待任何发生在反宗教运动之前的起义的态度。比如，宗教改革自身，作为教会的个体探索，是在不敬地对待宗教的人道主义之后产生的，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之前出现的是夏多布里昂（Шатобриан）和若瑟夫·德·梅斯特尔（Жозеф де Местер）和其他人，还有他们的别具一格的思想以及惊慌的情感。对待这些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的合理态度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这不是真正的、简单的和强有力的信仰，而是昨天的不敬的小学生们的惊恐和慌乱；这不是在人身上起作用的上帝，而是这样的人，他表面地模仿上帝在他们身上真正地起作用的、上帝确实曾经把他们召到自己身边的那些人（义人）的动作和话语。

⑩ 这里说的不是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尽管应该这样想，这里说的是在未来必然发生的事情——强行压制人身上的宗教意识的企图。这些话符合上边已经引用过的《传说》中的片段。

⑪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站得比自己的主人公高（他从来不观赏他们，而是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喜欢观察，并发现，尽管这些主人公都有其巨大的力量，但他们在精神痛苦的压力下变得软弱，他们不能承受住自己的"广度"和犯罪，尽管以前他们把这上升到一种理论（《群魔》中尼·斯塔夫罗金和莉莎的最后一次谈话，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的最后一次见面）。对强有力的人的描写，如果不是以忏悔结束（如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就是以对其力量的弱化，以对"从前的强有力的人"的贬低和侮辱的描写结束，几乎到处都是这样。

⑫ 在《启示录》第7章里对被拯救的人做了预先的计算，每个部族里有12万被拣选的人，在第14章里选民总的数量被说成是14万4千。

⑬ 是对精神自由的真正含义的多么惊人、深刻和正确理解；这是相对于自己的自由，相对于自己本性中低级东西的自由，为了高尚和神圣的

东西的自由，人感觉到并承认这是在自己之外的自己的最好的方面。在这里，这个自由是在与对自由的粗俗理解对立的情况下被指出来的：即人自己身上低级的东西相对于外部指导的独立性，或者是服从某种高尚的、在他之外的原则。

⑭ 这是《传说》的第二个核心思想。

十五

在这里，以最高形式实现的救赎的秘密把无辜的弱者留在自己之外，这是无法理解的，依据这个无法理解，宗教大法官的辩证法向新的、更高的范围进攻：拒绝救赎自身；这和上边在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自白里的情况一样，他就是在对无辜痛苦的无法理解这个基础上否定未来生命、最后审判。但在这里并没有否定这两个行为的存在，相反，这里有对它们的清楚的感觉，这个清晰性达到了使人目眩的地步：有反抗这些行为的起义，有从上帝那里的堕落，这是第二次堕落，发生在人的命运结局中，在结束了的历史之后，但这次堕落在一切方面都与第一次堕落类似，那次堕落是在这些命运开始之前发生的，——但这次却是有意识的，这个意识深入到这些命运的全部负担之中。

宗教大法官说：

> 如果这是秘密，那么我们有权来宣扬秘密，并教导他们，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心的自由选择[1]，也不是爱，而是秘密，他们应该盲目地服从这个秘密，甚至不顾他们的良心。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修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秘密和权威之上。人们也很喜欢，因为他们又像羊群一样被人带领着，从他们的心上终于卸下了如此可怕的、给他们带来了众多痛苦的恩赐[2]。你说，我们这样教导和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如此恭顺地意识到人类的软弱，满怀爱意

地减轻它的负担,哪怕是让其软弱的本性去犯罪,当然是在我们的允许之下,难道我们不爱人类?你现在为什么来妨碍我们?你为什么沉默,用自己温顺的目光深切地看着我?你生气吧,我不需要你的爱,因为我自己不喜欢你。我有什么可向你隐瞒的?或者我不知道我是在同谁说话吗?我能够对你说的一切,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在你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是我在向你隐瞒我们的秘密吗?也许,你正想从我的嘴里听到这个秘密,那你听着:我们不拥护你,我们拥护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放弃的东西:就是当他把地上的所有王国都指给你看时建议给你的最后的恩赐,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罗马,还有恺撒的宝剑。

对历史上天主教个别的思想的揭示就是从这几句话开始的。以前所说的一切都具有一般的意义,即是基督教在其基本思想中的辩证法,鉴于对人的本性的揭示,鉴于对人的本性的谴责,以及对它的同情,这个思想对所有信徒都是一样的。随着向前一步步展开,最后以关于人的命运在地上的宗教建设(彻底的和普遍的)而结束,这个至今还是完全抽象的辩证法与历史事实一致了,这个历史事实符合它,它不自觉地把这个事实吸引到自己身边,靠思想的表达方法与现实的显著特征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是——罗马-天主教会,及其普遍的追求,及其外在的联合力量;这个事实是——在古代多神教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基督教的种子。

宗教大法官预先说明了,他们的事业还没有"彻底完成",它"刚开始",但是他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事业会完成的:"还需要等很长时间,"他说,

大地还要受许多苦,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成为恺

撒,到那时我们将考虑人们的普遍幸福[3]。本来你可以在那时拿起恺撒的剑。你为什么拒绝了这最后的恩赐?如果接受强大魂灵的第三个建议,那么你就可以填补人在大地上寻找的一切,即:崇拜谁,把良心交给谁,最后,所有的人如何联合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普遍的、和谐一致的蚂蚁窝[4]。因为要求全世界的联合是人们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痛苦[5]。在自己的整体上,人类总是渴望必然是在全世界的意义上安排自己。有许多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但是,这些民族越是高尚,那么它们就越是不幸,因为它们比其他民族更强烈地意识到联合人们的全世界性的要求。伟大的侵略者帖木儿和成吉思汗,像旋风一样掠过大地,企图征服宇宙;他们也表现出人类对全世界和普遍的统一的那个最伟大的需求,尽管是无意识地。如果你接受恺撒的紫袍,就能够建立全世界的王国,并给予全世界的安宁。因为能够控制人们的,正是那些控制人们的良心、人们的食物在他们手中的那些人。我们拿起了恺撒的剑,拿起这剑以后,当然我们抛弃了你,跟随了他。

这样,"强大而聪明的魂灵"在旷野中诱惑了基督,在他的建议中,包含了全世界历史的秘密和对人类本性的最深刻要求的满足;这些建议是罪恶的,但这是因为人的本性自身已经被歪曲了。除了犯罪外,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满足人的本性的要求,除了把这个歪曲自身当作基础外,通过其他方法不可能安排、保卫和可怜被歪曲了的人们;——只能用被歪曲了的思想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个思想的谎言将满足人们本性的谎言。

[注释]

① 众所周知,这个原理确实是天主教学说的特点,正是它导致了西方

教会中的全部形式主义和教会所沐浴的各个民族的道德堕落。由这个形式主义导出了所谓的"善事"的学说，无论善事是怎么实现的，哪怕是机械地实现的，——对心灵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拯救作用（由此——赎罪券，即开始是赎那些参加十字军，为信仰和教会献出生命的人的罪，后来是赎以某种方式促进了这个行为的人的罪，最后是赎所有为教会的需要施舍钱财的人的罪；由此到按照各种价格出卖已经写好的赎罪券只有一步之遥）。新教正是在这个证明手段上与旧教会分裂了，与旧教会通过僵死的事业拯救人的心灵的形式方法对立，——在新教里是靠信仰证明的，即靠活生生的内在运动的行为证明

② 即自由和对善与恶的自由区分。

③ 这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它根本不属于罗马，如果在古代和近代罗马追求过普遍的统治，那么这完全不是为了"人们的幸福"。由这个例子最能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把自己的心灵、他自己的和个人的思想融合到历史事实之中的。

④ 这已经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专门制定的语言和思想，它们在十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的口里听起来有些奇怪。"蚂蚁窝"，"水晶宫"和"鸡窝"——这是人们的全世界联合的思想以及对他们的安慰的三种形象表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地下室手记》里它们首次被谈论。"鸡窝"——贫穷的和不方便的现实，但这现实比其他任何一个都更能令人接受，因为它是脆的，总可以被打破和改变，因此尽管不能满足人的本性的次要的要求，但它能满足人的本性最主要的和最实质的特征——自由意志和古怪的愿望，这个愿望在个体身上是不能熄灭的。"水晶宫"——人造的，在理性和艺术的原则之上建造的人类生活大厦，它比任何现实都糟糕，因为尽管它能够满足人的所有需求和要求，但却不能满足一个主要的要求——个性的和独特的愿望的要求；它压制个性。在《地下室手记》里第二个提法被否定，第一个提法被保留，因为缺乏对人而言的第三个提法——"蚂蚁窝"：这个名称指的是某一种类的活生生的存在物的普遍的和一致的联合，这个联合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在这些存在物中间存在一个建立共同住处的普遍的和无误的本能：所

有过集体生活的动物(蚂蚁)都被赋予了这个本能,但人却缺乏这个本能;所以,如果说这些动物时时处处都在建设一个东西,而且是和平地建设,那么人到处都在建立不同的东西,在自己的愿望和概念上永远在变化;刚刚开始建立一种普遍的东西,——在自己的观念上,在个别的个体那里就会发生分裂,而且满怀极端的敌视和仇恨。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时必须经常记住这三个提法。对它们的详细表述参见附录。

⑤ 应该把这个"联合"与人的良心在某种东西面前的"普遍的崇拜"区分开来,关于后者已经在上边说过了。那是人们内在的、心灵上的联合,而这里说的是人们外部的结合,一致的社会—历史生活。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但不是同一;它们相互符合,如同心灵与肉体一样,它们是同一个第三者的部分——人类生活的全世界和谐。

十六

在这个奇怪的和十分难以推翻的思想里包含着一种绝望,比这个绝望更大的绝望从来也没有过。可以说,这是人类意识里所出现的最忧郁的思想,我们所引用的这一页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最沉重的。其结局是彻底的绝望,——谎言的失败,在这个谎言的背后没有任何真理;欺骗的崩溃,人们只能靠这个欺骗生活。这一点被表述为对圣约翰启示录的第12、17和18章的神秘话语的解释,根据神学家们的解释,在这里以寓言的方式,在一个"妇人"的形象里,呈现了旧约和新约教会在人间的命运。请看这些话: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

> 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
>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
>
>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下面描述的是龙的命运：

> 龙并没有得胜，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
>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里吐出来的水。
>
>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然后，形象发生改变；出现新的幻象，关于这个幻象上边已经说过了：从海中上来一个兽，龙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都给了它。显然，兽就是通过龙起来与"守神诫命的人们"争战的。整个大地都惊异地跟随它；各族都崇拜它神奇的大能，因为它创造各种奇事，还叫火从天降。它把印记加在人们的身上，所有"名

字没有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接受这个印记。幻象又发生变化:"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出现,与其一起出现的还有十四万四千个被它的血救赎了的人,他们没有被地上的不洁给玷污。天使飞在空中,手中拿着永恒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它之后有另外一个天使喊道:"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巨大倒塌的第一个预兆,对它的描写还在后面,但这个预兆已经迫近。出现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手中拿着快镰刀。天使对他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于是大收割完成了。然后出现的是新的幻象:"那些胜了的兽和兽的像,并它的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那里,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出现七个天使,拿着盛神大怒的七个金碗,把它们倒在地上。于是痛苦降临在那些崇拜兽的像和接受了它的像的人身上,整个自然界在自己的性质上都被扭曲了,痛苦在不断增长。因为他们"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当第五个天使倒了自己的金碗时,——"兽的国黑暗了,人因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当神大怒的最后一个金碗被倒出时,有大声音从神秘的天上宫殿中传出来,在殿中有上帝的宝座,那声音说:"成了",随后开始对淫妇审判的幻象: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因她淫乱的酒而醉。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在她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因圣徒的血而醉,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看到他大大地希奇,天使就对他解释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兽必恨这淫妇,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在此之后出现的幻象是对获得胜利的淫妇的审判,这审判是由"用邪术把万民迷惑的"(17:23)和"用自己淫荡行为败坏大地的"人引进的,借着她发了财的客商"因为怕她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哀号",捶着自己的胸,悲伤和惊奇地喊着:"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

为了使这些话的意义更明白,我们指出,在对淫妇的审判之后,降临到了这场与兽和各族的争战之中(各族敬拜它,它们都染上了瘟疫,但还没有被战胜)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关于它还重复着(19:15)有关妇人所生的男孩的话,龙企图吞吃掉男孩,但他被提到上帝那里去了。

现在我们将继续宗教大法官的话,但已不再有中断。他说

过,他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拒绝了基督,接受了魔鬼的建议,于是控制了人们的良心,恺撒的宝剑和王国,他还想象人类与自己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而做的:

"思想自由、他们的科学和人吃人的风俗还要过几个世纪,——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就动手建筑巴比伦的高塔,结果一定会以人吃人而告终。"

作为一种对现实的精确认识,科学自身不包含任何不可抗拒的约束性的道德原则,——借助科学的帮助建成人类生活的最终大厦后(这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有需求的话),它不会得到应用,其中也不包含某种残酷的和犯罪的东西。马里图斯(Мальтус,即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译者注)有这样一个思想(甚至像乔·斯·穆勒这样的思想家也同意这个思想),对工人阶级而言,维持一定的高工资的唯一方法是控制工人的婚姻和家庭,以便不扩大自己的数量,换言之——把大量妇女降低到仅仅作为男人的一定功能的附属物的层次,这将是残酷性和无道德性的一个例证,假如没有牢固的宗教法律进行禁止的话,理论思想可以达到这样的残酷性和无道德性。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靠科学找到了无痛苦的死亡方法(加大剂量的麻醉剂),那么为什么第二个马里图斯(Мальтус,马尔萨斯)不出现呢,和第一个马里图斯一样,也满怀"对近人的爱",并且说,"有婚姻也行,但由婚姻所产生的孩子都得被吃掉"——这"不一定非得父母"去做,这用不着任何痛苦,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是有利的"。

宗教大法官接着说:

——但到了那个时候,兽就会爬到我这的这里,并将舔我们的脚,用自己眼里流出的血泪溅满我们的脚。但我们将骑在兽的身上,举起杯,上面写着:秘密。但到那时,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获得安宁和幸福的王国。你为自己的选民而

自豪，但你只有选民，而我们使所有的人都获得安宁。而且还有：在这些选民里，在这些可以成为选民的强有力的人里，有许多人等你等得最终疲倦了，把自己精神的力量和自己心的热忱已经转移到而且还将要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地上去，——结果是，他们举起自己自由的旗帜来反对你。但这旗帜是你自己曾举过的。

多么惊人的话语，对最近几百年来伟大欧洲思想家们的反宗教运动的多么深刻的理解，这里包含着对他们的威力和忍耐的承认，包含着为他们而产生的忧郁，但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错误。

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将是幸福的，不再发生叛逆，也不再相互残杀，如同在你的自由里到处都将发生的情况一样。噢，我们使他们确信，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自由的人，即他们把自由交给我们并服从我们。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将是正确的，还是在撒谎？他们自己会确信，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将回忆起来，你的自由把他们带到了什么样的奴役和惊慌的境地。自由，自由思想和科学将把他们带到荒凉偏远的地方，把他们置于奇迹和无法揭开的秘密面前，以致于其中的一些不驯服的和狂暴的人将消灭自己，[1]其他驯服的，但软弱无力的和不幸的人将相互残杀，[2]剩下的人，也是软弱无力的和不幸的，将爬到我们的脚下，向我们哭诉说：'是的，你们是正确的，只有你们才掌握了他的秘密，我们现在就返回到你们那里：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手中拯救出来吧。[3]

这个拯救就在大众的绝对服从和软弱中显现出来。那些从他们那里拿走自由的聪明人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但以前

无法获得的东西——他们能获得,其方法是英明地指使大众的意志,把他们的劳动进行分工。

他们从我们这里接过食物时,当然将清楚地看到,我们从他们那里拿来他们的食物,他们亲手获得的食物,以便再分给他们,这里并没有任何奇迹;他们将看到,我们并没有把石头变成食物,但他们将真正地更喜欢从我们的手里获得食物!因为他们将十分深刻地记住,以前在没有我们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食物自身在他们手里只能变成石头,当他们返回到我们这里时,石头自身在他们手里变成了食物。

这里说的是我们的时代,这是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尽管有非常多的产品,但非常多的人民大众却勉强过着贫穷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被挥霍了,由于人的愿望和行动之间的不一致性而消失了。相反,当现在过分奢侈的人的愿望减少时,整个人类的劳动都成为一个一致的整体,甚至即使这个劳动也是非常繁重的,如现在到处都呈现的那样——那么产品也够所有人的小康生活用的。

永远服从,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太明白了,太明白了![4]只要人们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就将是不幸的。你说,是谁最能促进这个不理解?谁分裂了羊群,把它赶上了不熟悉的道路?但羊群重新聚合,重新服从,这回已经是永远地服从了。那时我们给他们安静而温顺的幸福,这是软弱无力的存在物的幸福,他们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5]噢,最终我们将使他们确信,不能骄傲,因为是你把他们抬高了,这就使他们学会了骄傲;我们将向他们证明,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只是可怜的孩子,但孩子的幸福是最甜的。他们将胆小起来,在恐惧中紧偎着我们,就像鸡雏紧偎着抱窝的母

鸡一样。他们将对我们惊讶和惧怕，而且还为我们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如此强大，如此聪明，我们制服了数以亿万计的暴乱的羊群。他们将软弱无力地忍受我们的愤怒，他们的思想将胆怯起来，他们的眼睛将像孩子和妇女的眼睛那样容易流泪，但是，按照我们的指挥，他们很容易过渡到快乐和欢笑，幸福的喜悦和幸福的儿童歌曲[2]。是的，我们将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自由时间里我们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像孩子的游戏，既有儿童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的舞蹈。噢，我们还允许他们犯罪；他们是软弱的和无力的，他们将像孩子一样爱我们，因为我们允许他们犯罪。我们将对他们说，一切罪行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都将被赎清；我们允许他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爱他们，至于对这些罪行应该进行惩罚，那就由我们来承担好了[3]。我们承担起罪责，他们就会崇拜我们，把我们当作在上帝面前替他们承担罪过的恩人。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相对于我们的秘密。我们将允许或者禁止他们同自己的妻子和情妇生活在一起，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这一切都要看他们是否听话而定，——他们将满怀欢乐和喜悦地服从我们。他们良心上最痛苦的秘密，——一切，一切，都将交给我们，我们解决这一切，他们满怀喜悦地信赖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的决定使他们摆脱巨大的烦恼，摆脱因为个性的决定和自由的决定而带来的现在那些可怕的痛苦。

在最后这几句话里几乎指出了对人口自身的控制，它的增长或减少，——一切都根据当时历史时刻的需求来定。这个片段的共同思想就是，全部情感都将从人类里被消除，留给人们的只有罪的细节，罪及其全部深度将由那些有能力控制任何规模的罪，并有能力量承担任何重负的人来承担。这样，历史的无法

解决的矛盾，以及人类心灵无法认识的神秘活动——妨碍人在大地上生活的一切——将集中落在少数人的肩上，他们有能力承担起对善与恶的认识。可以说——历史在沉默，只剩下少数伟大心灵的秘密历史，当然，这个秘密历史注定永远也不能成为被讲述出来的。

[注释]

① 这个理论思想证明的是"自相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在谈到一个自杀现象事件时表述过这个思想。参见附录。

② 相应的思想见《群魔》，基里洛夫在自杀前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说的话："杀害另外一个人是我的任性中最低级的一个点，而全部的你就在这(建议)里。我不是你：我所愿望的是一个最高的点，我将杀掉自己。"(1882 年版，第 552 页)

③ 历史的主要任务，——在主客体结合为一(被拯救者和拯救者都是人)的情况下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在主客体分离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即在宗教里，因为在这里被拯救者是人，他的拯救者是上帝)。

④ "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够的，只有一个东西需要解决好——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说(借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之口)。1882 年版，第 374 页。

⑤ 这些话以及马上要标出的话构成了《传说》的第三个核心思想。

⑥ 人的本性的这个软弱无力实质上等同于人为地"降低"其心理水平，只不过不是通过强迫实现的，而是和平地实现的。

⑦ 历史上的犯罪在成为预先规定的和在必要的范围内允许的，那么它立即就将丧失其危险的和威胁的特征。

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里，在韦尔西洛夫和自己的儿子的谈话中，重复了这副未来的几乎是无罪过生活的全部情景。

十七

宗教大法官做结论说：

所有的人都将是幸福的,全部上百万的人,除了几十万统治他们的人外,都将是幸福的。因为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保存秘密的人,只有我们才将是不幸的。将有亿万幸福的孩子和几十万个承担了分辨善恶所遭受的诅咒的受苦人。他们将安静地死去,为了你的名义安静地消失,他们在棺材后面找到的只有死亡。但我们将保存秘密,为了他们的幸福,用天上的和永恒的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真有什么东西,那当然也不是为了像他们这样的人。"

如此轻易地说出来的这些话的高傲是无法解释的:在这些话背后能感觉到一种威力,它确实自由地环视历史无尽的道路,在自己手中坚定地掂量着人的心和人的思想的度。听到针对上边已经引用过的约翰福音中的话,我们将不会惊奇:

人们都在说,都在预言,你将要来,并重新获得胜利,带着自己的选民来,带着自己高傲的和强大的人来;但我们说,他们只拯救了自己,我们拯救了所有的人。人们说,那个手持秘密骑在兽身上的淫妇将要受侮辱,软弱无力的人将重新暴动,撕破她的紫袍,暴露她"可憎的"肉体。但那时我将起来,把几十亿幸福的、不知道罪恶的孩子指给你看。我们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承担了他们的罪恶,我们将站在你面前说:审判我们吧,如果你能,你敢。你要知道,我不怕你。你要知道,我也曾去过荒漠,我也吃过蝗虫和树根,我感谢你用来祝福人们的那个自由,我也准备加入到你的选民行列,怀着"充数"的渴望加入到强者和有力的人的行列。但我醒悟了,不愿意为疯狂服务。我返回来了,我参加到纠正了你的功绩的人们的队伍里。我离开了高傲的人们,返回到恭顺的人们那里,为了他们的幸福。我对你说的事将

> 会应验,我们的王国将被建成。我对你重复一遍,明天你就会看见这个驯服的羊群,它在我的一挥手之下就会扑过去,把炽热的木炭加到你的火堆上,我将在这火堆上把你烧死,因为你来妨碍我们。如果说有人最应该遭受我们的火刑,那么这个人就是你。明天我将把你烧死。Dixi(我说)。

宗教大法官停住了。在黑暗的拱形监狱里深深的沉默中,他看着自己的囚徒,等他回答。使他感到沉重的是这沉默,还有他用来看他的那个深情的和安静的目光,在整个谈话中都是如此。哪怕他说点什么痛苦的和可怕的东西,只要能回答他就可以。突然,囚徒接近了他,默默地吻他苍白的、老年人的嘴唇。"这就是全部回答。"宗教大法官哆嗦了一下,他的嘴唇微微抽搐了。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对他说:——"你去吧,不要再来了……永远不要再来,永远!"囚犯走到"城市黑暗的大街上"。塞维利亚城的夜晚也是死寂一般。耀眼的星星从黑暗的天空中向安宁的大地洒下寂静的光。城市在沉睡;只有老头子站在那里,在敞开的门前,望着打盹的自然界,手里拿着沉重的钥匙。那个吻在他心里燃烧,但是,"他仍然处在原来的思想里"……他的教会还在建设着。

这部叙事诗就这样结束了。时间在流逝,死去的人走向大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小酒馆,兄弟俩一个小时之前在这里谈起了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但是,无论现在他们再说什么,我们都不再去听了。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另外的思想,在我们的耳朵里仿佛还在回响着美菲斯托菲尔(Мефистофель)的歌声,这歌声从我们贫穷的大地之上的高高的星空中传来。

我们把这个歌曲分成了部分,思考了其中的每句话;但是,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唱完了,我们只剩下对整个歌曲的回忆,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整个歌曲。

首先令我们惊奇的是这支歌曲非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两者与一个最大的统一体结合着。其中对人的最热烈的爱与对人的彻底的冷淡融合在一起，无限的怀疑与热情的信仰融合在一起，对人的不稳定力量的怀疑与对实现任何功绩所需要的充足力量的坚定信念融合在一起；最后，历史上所能实现的最大的犯罪意图与对义人和圣徒的无法解释的高尚理解融合在一起。这歌曲中的一切都是非凡的，一切都是神奇的。就是这些在历史上流淌和流转的不稳定的一股股善与恶之流，编织着复杂的历史图案，突然它们结合了，相互融合；如同在那个最初的时刻一样，那时人第一次学会区分它们，并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现在我们重新看到它们是合在一起的，和他当时一样，我们被恐惧和误解震惊。上帝，真理和道路在哪里？——我们自问，因为我们突然感觉到自己无法遏止的灭亡，感觉到可怕的和令人厌恶的存在物的接近，关于这个存在物在诗歌和散文里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以致于我们开始严肃地把它只当作简单的幻想的消遣。突然，现在我们感觉到它冰冷的接触，听见它发出的声音，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有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当然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像，他以无法理解的和神秘的方式感觉到了上帝的真正缺乏和他者的确实存在，在他死之前，把自己心灵和自己孤独的心中的恐惧转达给我们，这颗心满怀对他的爱无力地跳动着，他已经不存在了，这颗心在无力地躲避存在的东西。整个一生他都在宣传上帝，在听过了他的宣传的人当中，一些人对他的一贯性进行嘲笑，对他的纠缠感到愤怒，另外一些人为之深受感动，经常指向他。但是，他仿佛既没有听见这些愤怒，也没有听见这个感动。他一直在说一个东西，但所有的人惊奇的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心中满怀着这样的喜悦、安慰的思想，自己却如此黯然而沉重，如此忧郁和不安。他谈论过在上帝里

的喜悦,他指出了宗教,把宗教看作是对人的唯一拯救,他的话热情而感人,他从来没有平平常常地提到自然界,现在他仿佛开始爱自然界,理解它的颤抖、美丽和生命[2]。自然界在他的心里也同样因某种冰冷的接触而枯萎了,当他哪怕是在自己所说的话语里忘记这个接触时,自然界复苏了。在他的话语里也有坦白,但这些坦白是无法理解的。他也说走嘴过,说在其心灵里真的没有上帝的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是在嘴边上挂着上帝之名而来的"。[3]人们读了这些话,但谁也没有明白它们的含义。他进了坟墓,也没有被认识,他把自己心灵的秘密带走了;他仿佛是被某种本能触动了,根本没有感觉到死亡的迫近,就在这时,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惊人的形象,当我们看看这个形象时,最终我们能够理解一切。在听完哥哥的故事后,阿辽沙痛苦地问自己的哥哥,"你也和他在一起",我们禁不住把这些话也指向作者自己,他如此明显地站在阿辽沙的一边:"你也和他在一起,和这个强大而聪明的魂灵在一起,是他在旷野里向来拯救世界的那个人提出了三个诱惑的建议,你很好地理解和解释了这些诱惑,仿佛是你自己想出来似的!"我们上边指出过一封个人的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完小说前的很长时间以前写的,这封信里有一个坦白,在死前的很长时间以前,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下的一句话:"我的奥萨那(осанна)穿过考验的熔炉来到了",此外还有对《传说》的引用;最后,传说与小说之间的彻底隔绝性,以及传说不但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在其长长的一系列作品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切都不再使我们怀疑传说的真正意义。作者的心灵显然沉浸到我们上边引用的全部惊人的话语当中,人物形象在我们面前混合在一起,一个从另外一个里渗透出来,我们忘记了在宗教大法官背后说话的人物,我们甚至看到的不是宗教大法官,在我们面前站着的仿佛是恶的魂灵,带有一副犹豫和

昏暗的面孔，如同两千年以前，发展着当时他简短地说过的诱人的话。事实上，他应该说得更详细些：现在人们在听他，就不能用一两句话在他们面前把历史概括。

[注释]

① 试比较上边已经指出的《少年》里的语调和思想。

② 试比较在《穷人》、《地下室手记》等作品里对自然界的描写（准确地说——是关于自然界的贫乏的话语）和佐西马长老（《卡拉马佐夫兄弟》）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少年》）关于自然界的话语。

③《少年》，第 363 页（1882 年版）。

十八

他的精制的、诱人的和强有力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也应该这样开始。他被称为"诽谤者"——他的话就从对人的诽谤开始。

人的本性——在自己的根基上是善良的，只是被外来的恶给歪曲了，是这样吗？或者它从一开始就是恶的，只是无力地渴望上升到某种更好的东西？——这就是困难，在偏向一个方面来解决这个困难后，他在这个困难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全部思想。人是正在暗淡下去的火花，还是只能从外边点燃的冰冷的灰烬；在自己神秘的本质上他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与人的本性继续进行斗争之前应该回答的问题。

他的话只有一次发生了慌乱，只有一次他失言了：这就是当他指出，谁用真理召唤人，人甚至就会"抛弃食物"跟随他，——"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他说走了嘴。在这个瞬间的惊慌中是否展示了真正的真理，以便重新关闭这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存在一些方法把真理挖掘出来送到我们清醒的意识之光

里？

他的辩证法在诱人地发展着：他指出最重要的东西——人对待上帝的态度，并用这个态度衡量人堕落的卑鄙性和长久性。站在上帝面前，在上帝与人类及其几千年的命运之间，他指向他的神圣形象，同时指出了人甚至对他也进行侮辱，于是他问起人的真正价值的尺度是什么。保卫自己——在这里仿佛就意味着感觉不到形象的神圣性，仅仅是一个证明的企图——就将丧失对神圣形象的一切权利；同样地，以前一个不放弃上帝公正审判的企图就是对在人类里遭受无辜痛苦的人而言的可怕伤害。在我们面前的是真正神奇的话语：上帝以及与他结合的人无法遏止地分离着，阻碍这个分离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对上帝的反抗或者是对人自己的反抗。

但是，用人从上帝那里暂时堕落的事实不能解决善与恶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在他的本质里，善与恶是其本质的基础。难道人对上帝的无法控制的倾心不也是事实吗？在独白之前宗教大法官烧死的那些受难者难道不是为了不去敬拜他那魔鬼的思想，最终一直保留着对真理的忠诚吗？当人们感觉到，"他，就是他来到他们这里看他们的悲伤和痛苦"，在人们中间传出了哭泣声，难道这哭泣声没有向我们说明关于人的心的任何东西吗？难道十五个世纪毫不动摇的等待什么也不意味着？在看到了人的堕落的时刻之后，甚至即使这些时刻延续了许多世纪，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直接回答作者的隐藏着的问题，在看见自己时代的堕落和卑鄙并使愤怒成为合法的之后：谁能诽谤整个人类历史，谁能否定在自己的整体上这个历史是神圣的和高尚的显现，如果不是显现人的智慧（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也是显现对真理的无私的渴望和实现某种真理的无力的愿望？

就是人的精神高度的事实，无论能搜集多少这样的事实，也

只能动摇相反的事实的证明意义,但根本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如此对立的、相互否定的现象系列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本质那里,像归结到自己的中心一样。

还有另外一种稳定的方法可以给这个困难最清楚的解释,我们的许多希望和信仰都依赖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向哪个方向解决这个问题。消灭混合的和矛盾的历史事实,如同从人的身上摘除累赘物一样,便可以使他的本质处于其原初的纯洁性之中,并确定其与永恒理想的必要的相互关系:真理,善和自由,对这些理想的渴望是永远也不能怀疑的。

在人的意识里,下面这两个东西哪一个在先——是谎言在真理之前,还是真理在谎言之前?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它的解决还将为整个人的本性问题的必然解决奠定基础。我们在这里不能动摇:谎言自身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对真理的破坏,明显的是,在被破坏之前,真理应该先存在。这样,真理是原生的,一开始就产生了的东西;谎言则是带来的,后来出现的东西。谎言的来源在历史里,真理的来源则在人身上。真理来自于人,如果在自己的道路上人不遇到迫使其远离真理的障碍,那么真理将永恒地来自于人。但这只表明,一切谎言的原因都在人的身上。人的第一个运动总是(向)真理的运动,我们也不能有另外的想法,如果他是自由的,即如果他是纯洁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只根据自己才能结构行事。我们能这样想吗,第一个人在看到其周围的世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第一次欣喜之后,关于这个世界他能够说出谎言:假装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或者压制自己身上的景仰之情,说他感觉到的是憎恶。每当人不害怕时,他能否达到真理,当没有任何外边的愿望吸引他离开简单的直观时,能否说出关于这个直观的真理,而且仅仅是真理?当在恐惧的影响下,或者顺从某种嗜好,他说了谎,难道每一次他感

觉不到某种痛苦,某种内在的痛苦,这痛苦来源于它的思想在通向自己外部表达的道路上遭到了某种歪曲的影响?要在自身产生痛苦,要在真理中压制某种东西,或者给真理添加某种东西,那么每一次不都需要某种努力吗;这个努力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一开始人的本性就无分别地既倾向于谎言,也倾向于真理?

这样,一方面是人的理性,另一方面是真理,这是永远被追求的对象,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不是一种简单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后者难以觉察地先定在前者中,如同一条线向另一条线接近,无法觉察地预定了一个遥远的交叉点。谎言和错误,即恶只是这个结合的障碍或对它的偏离;恶不是某种独立的、封闭于自身的或者完整的东西,这样完整的东西将被真理给分开。真理是绝对的;这是人的理性和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之间简单的和正常的相互关系;相反,谎言总是相对的和部分的;确切地说,谎言针对的是一切个别的思想,并违反个别思想的正确性。所以,世界是整体的,也可能有完整的世界观,即和谐地联合在一起的真理体系;相反,谎言不可能被放人任何体系之中,特别是不能被放人这样的体系之中,其中的建构原则是错误的。在制造必然的荒谬思想,必然错误地把它们结合的任何企图中,理性都能感觉到无法忍受的痛苦,——甚至在消灭这个痛苦之后,它还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无论在什么地方,把正确性不由自主地引人到建构之中;相反,真正的思想的建立和把它们联合到一个正确的体系之中一直都给理性带来了最大的享受,理性所建立的东西越是接近纯粹的和完美的真理,这个建设就越高尚。这个痛苦和这个享受是人的真正本性的指数;它们决定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这只是在原初状态下的本性;相反,作为在历史上改变了的本性,它们把它展示为暗淡了的本性。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在科学或哲学里我们有时找到仿佛是恶

的东西,我们的本性必然要反对的东西,那么在没有预先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认为,科学或哲学中引起类似不安的部分,必然包含某种错误。对这部分的更仔细的研究,对其产生的方法的研究,总是必然地发现,在这部分里面有不纯洁的思想,这思想被不知什么样的外来的感觉、恐惧或嗜好给歪曲了。比如,在上边提到的马里图斯(Мальтус,马尔萨斯)的规律中只有其基础是真的,即在某些时代居民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产品的数量则呈算术级数增长;但下面的反常要求完全是错误的,即仿佛工人阶级应该放弃婚姻。在这个要求里有这样一种担忧,即过奢侈生活的人可别丧失其对奢侈的权利,还有一种恐惧,即最终穷人可别开始死于饥饿。关于这个担忧可以说,它是徒劳的,关于这个恐惧可以说,它是仓促的,因为其他更深刻的规律,出生自身的规律,显然将保护人们不遭受类似的灾难;尽管已经过去足够的时间让马里图斯(Мальтус,马尔萨斯)的规律开始起作用,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双亲都还没有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也都没有成为独身的,相反,时时处处他们都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找到了食物。

在自己抽象的活动中,纯洁的、想只能创造有益的东西;一切科学和哲学,如果它们不背叛自己的本质——在人和上帝的面前都是有益的和完善的。思维和感觉领域的混合,用后者歪曲前者或者用前者歪曲后者,都将产生恶,不定什么时候这恶甚至还将对自己的本性发出怨言,抱怨意识过分的深度或者抱怨自己强烈情感的无法遏止。

相反,如果这些领域没有被相互的干涉所歪曲,那么它们将向我们显现为纯洁的,远离恶的。在研究了其中的第一个领域——思维领域后,我们现在来研究第二个领域。

在自己原初的本性中,情感渴望的是善的东西,并制造善的

东西,还是渴望恶的东西,并寻找它?这就是一个问题,对它的回答将继续我们已经开始的对人的原初本性的揭示。在这里,对困难的解决还是要坚持的,不能动摇。给他人制造恶的渴望总是有回应的,这个渴望是由来自他者的痛苦所引起的。这样,愚蠢情感的特征也必然是次要的和派生的,这和谎言的特征一样。正如不能想象,第一个人在看到自然界之后,说关于它的谎话,同样不能设想,这第一个人在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第二个人,并且以某种方式了解到什么是苦难和痛苦之后会希望他遭受苦难和痛苦;不能设想,当一棵树要压死他的时候,这个人不把树从他那里推开,不警告他那水的深度,如果这个人自己曾在这个水里被淹过,或者在中午酷热的时候不把他叫到自己身边的唯一一棵灌木下避暑。既然我们发现人不接受周围的或来自外部的任何恶,那么和在这些例子中一样,我们到处都能够发现他的本性只能面向善。善是人的情感迷恋的第一个东西,恶则总是次要的和来自外部的东西。内在痛苦的感受或者内在喜悦的感受在这里可以成为真理的同样可靠的指数,和在意识领域里一样。痛苦是模糊的,必然要控制人,并随着恶对其心灵的控制而增加;相反,崇高的喜悦伴随着友善的生活,无论这生活遭到什么样的肉体上的灾难的压迫。在这里,痛苦来自于恶与人的本性的不一致性,精神的喜悦则来自于它们的和谐。

关于不抵抗恶的深刻学说也是以一切恶的回应性的来源为基础而建立的:确实,这个学说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那么恶就在多大程度上被区分出来,从生活中消失。抑制自己不用恶来回应恶将在根本上消除恶;这个抑制在个别点上可以平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强烈情感的不安,整个生活都已充满这样的不安,每个个性的意识都被这种不安缠绕。这在开始是很难做到的,在结果上也是很不显著的,但随着一步一步地这样做,它越来越

容易,其结果也越来越显著。强烈情感之间不再相互激发,而是逐渐停息,每个被制造出来的恶不再引起任何回应,因此必然消亡。有这样的人,他们习惯于认为,历史和生活的全部魅力正是由强烈情感的角逐构成的,最好还是忍受恶,而不是剥夺恶的自由的和诱人的美,对这样的人可以指出,对自己内在纯洁的感受的喜悦,对自己周围生活与自己精神的和谐的感受的喜悦,将绰绰有余地奖赏人的心,以补偿失去了的东西——现在人的心如此痛苦地和盲目地享受的这些东西。

至于人的本性中的第三个方面,意志,关于它原初的纯洁性或者败坏性的问题将由这样的研究来解决:意志是否处在与人在追求的最终的伟大理想的一致之中,这理想就是自由。思想实验在这里可以给出清楚的解决。自由是与内部活动相一致的外部活动,当外部活动彻底成为内部活动的结果时,自由就是完全实现了的活动。明显的是,假如人可以成为与过去和周围分离的,那么其应该有自己的原因的外部活动只能在内在的心理活动中拥有它,即在外部影响之外,他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在现实中,当他与过去和周围结合时,其外部活动不再与内部活动处在和谐之中,不和谐的程度总是与外部现实对他的作用的程度一样。这意味着,对人的自由的贬低,人的自由的被压制或歪曲,不是来自他的本性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总是伴随着这种被压迫情感的痛苦在这里也标志着人的精神的这个方面的真正特征。

真理、善和自由是主要的和永久的理想,人的本性在其主要因素中——理性、情感和意志,就指向对这些理想的实现。在这些理想和人的原初组织构造之间有一种一致性,由于这个一致性人的本性不可遏止地追求这些理想。因为这些理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认为是愚蠢的,那么人的本性在其原初基

础中也应该被认为是善良的和美好的。

十九

这就破坏了宗教大法官的辩证法的基础。关于自己的学说,救世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30)确实,这个学说充满了最高真理、号召所有的人在爱里紧密结合,让人自由地仿效最好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全部意义最深刻地符合人的原初本性,透过千年的罪恶重新唤起人的本性,这罪恶用沉重的和可恨的桎梏压迫着人的本性。忏悔并跟随救世主——这就意味着从自己身上摘下可恨的"桎梏";这就意味着感觉自己是喜悦的和轻松的,就像人在自己被造的第一天那样感觉自己。

道德再生的秘密就在这里,当我们全心地皈依基督的时候,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实现了这个秘密。除了"光明"、"喜悦"、"狂喜"这些词外,再没有其他词可以表达真正基督徒所体验到的这个特殊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灰心丧气才被教会认为是十分严重的恶:它是远离上帝的外部标记,有这个标记的人无论嘴上说什么——他的心都离上帝很远。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损失和一切外部灾难对真正的基督徒和按照基督教的方式生活的人的团体而言——就和狂风怒吼对坐在牢固的、供暖很好的和光明的屋子里一样。基督教的团体是永生的,不可破坏的,——只要它还是基督教的。相反,在某一次成了基督教的,然后又皈依存在和生命的其他根源的任何生活都将被破坏的原则所渗透。尽管这种生活取得了外部成就,具有外部威力,但是它却充满着死亡的预兆,这个预兆无法遏止地给一切个体的大脑、每个单一的良心都留下印记。

就历史的方面说,可以把《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看作是

对这个独特精神的(指此处所说的死亡的预兆——译者)强有力的和伟大的反映。由此才有了这个传说的全部悲哀,由此才有了暗无天日的昏暗,传说给人的一生带来了这个昏暗。假如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人将无法生存,这个对自己的严酷的审判被宣布后,他只好死亡。传说就是以这个绝望结束的。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恐惧,当人类最终为了最高真理已建设好了,突然它了解到,它的建设的基础是欺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任何真理,除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拯救毕竟是需要的,但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实现拯救的。实质上,在各民族的可怕的起义那天宗教大法官准备向基督说的最后的话就具有这个论断所具有的意义:"审判我吧,如果你能,你敢。"这里的昏暗和绝望就是无知的昏暗。"在大地上我是谁?这个大地又是什么?我和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这就是透过《传说》能听到的话。在传说的最后说的就是这个。阿辽沙对哥哥说:"你的宗教大法官简直是不信上帝",哥哥回答说:"你终于猜到了"。

这决定着传说的历史地位。救世主的伟大训诫是:"首先寻找上帝的国,其余的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但欧洲的人类做得相反,尽管它继续被称为基督教的人类,这种情况已经有两个多世纪了。不能,也不应该隐瞒自己,这种情况的基础是对救世主训诫自身神圣性的神秘的、无法表达出声的怀疑:人们相信上帝,也盲目地服从他(宗教大法官)。这一点我们正好没有发现:国家的利益,甚至科学和艺术的成就,最后还有生产率的简单扩大——这一切都被推向前边,没有任何关于抵制它们的思想;在生活中,在这之上的一切——宗教、道德、人的良心——都在下降、让路,都靠这些利益运动,后者被称为是人类的最高利益。欧洲在外部文化领域里的伟大成就都可以用这个变化来解释。对外部事物的注意已成为共有的现象了,自然也在深化和精制化;出

现了以前未曾预见到的发现,出现了这样一些发明,它们在发明者自己身上都引起了惊讶。所有这一切太好解释了,太可理解了,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应该预料到这一切。但是,太可以理解的还有与此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一点:生命的最高意义的暗淡,最终,它的消失。

无限多的细节,但其中却缺乏任何主要的和联系的东西——这就是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形成的欧洲生活的特有的区别。任何共同的思想都不能再把各民族联系起来,任何共同的情感都不能控制它们,——每个民族仅仅都致力于自己专门的事业,在每个民族内部也是如此。在无休止的劳动中,在永恒的、没有任何指向的部分的建设中缺乏一致的中心,只是生命意义的这个丧失的表面结果。其另外的和内在的结果是对生命的兴趣的普遍的和无法控制的丧失。在启示录里谈到"好像火把"的雄伟的形象,这火把在时代的终结时落到地上,由于这火把,"大地的泉水变苦了",[①]启示录的这个雄伟的形象更适用于新的世纪的启蒙,而不是宗教改革运动时代。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家们花费了那么多的努力,其结果已经不能再令任何人满意了,最不能令那些致力于人类的人们满意。火苗着得越强烈和明亮,剩下的冰冷的灰烬也越多,同样,在开始的时候越贪婪地致力于启蒙,启蒙就更加扩大无法解释的忧郁。被亵渎神明或仇恨所代替的整个新的诗歌的深刻忧伤就由此而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就由此而来。一切昏暗的和忧郁的东西都难以遏止地把现代人类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因为在人的内心里再没有喜悦了。古老故事里的安宁,从前的诗歌的欢乐,无论这一切都伴随着什么样的美,都不再吸引任何人:人们野蛮地避开一切类似的东西,来自表面的鲜明印象的不和谐令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自己的心灵里缺乏任何光明。在充满敌意地或者嘲讽地表

达完自己的思想后，他们一个一个地抛弃生命。科学确定这些"抛弃生命的人"的数目，并指出在哪些国家和在什么时候这些数目在上升和下降。现代的读者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孤独的角落里，无意识地想到自己："这些数目在上升或下降，这有什么呢，既然我已经没有可以为生的东西了，——任何人都不想，也不能给我提供我赖以为生的东西！"

由此产生了向宗教的转向，这个转向是不安的和忧郁的，并且带有对阻拦他的一切的强烈仇恨，同时还带有这样的感觉，即在宗教情绪里与几百万人融合的无能为力，这上百万人没有参与新时代的启蒙教育运动。热情和怀疑主义，深刻的绝望和语言上的华丽，由于没有更好的东西，语言上的华丽就压制了心的需求——这一切以惊人的方式混合在对宗教的这些激情之中。在自己的根源上生命枯竭了，瓦解了，在历史上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个人的良心里出现了无法忍受的混乱，——宗教则成了从这个处境的最后一个还没有被尝试过的出路。然而，宗教情感的天赋的获得可能比其他所有天赋的获得都难。希望已经有了，辩证法的无数曲折将巩固这些希望；爱也有了，准备把一切都献给近人，为了他的最微小的喜悦可以牺牲自己生活中的全部幸福，然而就是没有信仰；杂乱地堆放在一起的，相互间联系着的证明和情感的整个大厦原来是某种类似于没有人在其中居住的美丽住宅。在概念和关系方面过分清楚的时代，靠意识完全在被证明了的和抽象的东西的领域里徘徊，这是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需求，它们如此消灭了神秘理解和感觉的一切能力，以致于当拯救取决于这些神秘的理解和感觉的时候，这个能力也无法产生。

这里指出的所有特征在《传说》里都被刻画了：传说是对宗教的最热烈的渴望和对宗教的完全的无能在历史上的唯一的一

次综合。与此同时在传说里我们能够找到对人的弱点深刻的意识,这个意识与对人的轻蔑接壤,同时能够找到对人的爱,这种爱——直达到准备抛弃上帝和准备去赞同对人的贬低的程度,能找到人的极端残忍和愚蠢行为,同时还有人的痛苦。

[注释]

①《启示录》8:10—11。——译者注

二十

我们还应该指出这个《传说》的最后一个特征:它对欧洲各民族的宗教意识都表现在其中的那些伟大形式的态度。在自己的特征上,在自己的来源上,它——这个态度,是非常独立的:这十分地类似于一个与无论什么样的民族和无论什么时代的宗教形式决裂的人开始满怀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思考宗教问题,并完全从这些不安出发独立地发展这个思考。严格地说,在《传说》里只是偶尔才提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名字;而且从前者里拿来进行批判的只有关于人的高尚概念,从后者里拿来进行批判的是对人的轻蔑,还有用个体智慧和力量束缚人的命运和意志的可怕的企图。在这两个历史事实里仿佛感觉到了某种与自己类似的东西后,这个迅速地和不可遏止地发展着的思想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在辩证法的形式里对它们进行歪曲和消灭,除了心灵的规律之外,这个辩证法不受任何东西支配,它就是在这个心灵的规律内部产生的。

这个心灵的抽象的和概括的特征表现在,《传说》只依靠人的本性的内部需求,但却不去回应它们,而是回应历史矛盾、利用人的弱点在大地上安排人类的命运——这就是《传说》的意图。《传说》在这个方面与宗教意识业已确定的形式中的一个

——罗马—天主教会里所假定的东西是一致的。《传说》的故事情节，主要线索都由此而来，其思想都编织在这个线索里。在这里，谈起《传说》对待假定的天主教思想的态度，我们应该表达对三个主要基督教会的相互关系的一般看法 在这个看法里将展开一个最终的观点，就应该用这个观点来研究整个《传说》。

对普遍的东西的渴望是天主教会最一般的和最恒定的特征，正如同对个体的和独特的东西的渴望是新教的根本特征一样。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就自己的基础而言是不同的特征，在各教会中是独特的，或者它们是以某种方式从基督教的精神中得出的——那么我们完全错了。普遍性是罗曼种族的突出特征，如同个人主义是日尔曼种族的突出特征一样；只是因为如此，在西欧传播的基督教在遇到了这两个对立类型的民族后，接受了这些独特的特征。无论我们研究什么，研究单独的事实或者一般的历史流向，研究法律、科学、宗教——我们到处都能够发现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在一种情况下是向普遍的东西的指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向个别的东西的指向。古代罗马的法制公式是抽象的，如同罗马的诸神一样，因此对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时代都适用，如同89年的原则及其对人的态度，以及在人的权利基础上肯定法国人的权利的渴望一样。寻找普遍，满怀信心在普遍之下获得全部个别，在这里表达得十分清楚。笛卡儿的哲学是罗曼种族里唯一伟大的哲学，它也企图把活生生的自然界的一切多样性归结到两个巨大的存在类型，广延性和思维，——如同贺拉斯(Гораций)和布瓦洛(Буало)曾经企图把诗歌的灵感时代归结为简单和清楚的规则一样，如同居维叶(Кюве)[1]把动物世界，还有法国的一系列大陆归结为几个永恒的类型一样，把对力量的本质的认识归结为对代数的认识，甚至认为几何图形是(现实中)十分具体的东西。对普遍的东西的兴趣

和嗜好以及对个别的东西的某种无知产生了拉丁化了的种族理性世界中的这些伟大的事实;它们的政治历史的更伟大的事实与之相适应。渴望联合,起初包含个体的东西,后来最终消灭个体的东西——这是罗马以及从它的土壤上产生的一切的永不消失的渴望。这个深刻的、无意识的和无法遏止的本能迫使罗马军团不顾清楚的预测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越走越远,最后走到了甚至连眼睛和大脑都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个本能吸引罗马主教区的传教士开始去德国和英国,过了几个世纪后去遥远的和未知的中部非洲、内部中国、远方的日本等国家。罗马教会自身不可遏止地摒弃一切个别的、分散的和单一的东西,完全龟缩在巨大的宗教修会里——这是世界历史上完全独特的现象,它与基督教的任何特征无关,出现在自己所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之中,产生于在不同的时代,在同一片罗马的土壤上。仿佛僧侣的精神、独居修道和弃世独处的精神在迁移到这个土壤上之后,又进入到世俗世界里,以使这个世界服从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观点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概念和形式。所有国家、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苦行僧在摒弃罪恶的人类后,离开它去了荒漠,在那里拯救了自己,但是,天主教会的苦行僧们友好地结合为一体,走向了这个人类,以便把它引到这样一种境地,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象过这个境地。与对普遍的东西的这个渴望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是罗曼种族对个体的东西的不理解,仿佛是对个体的东西的无知,——没有能力注意个体的东西的本质或者怜悯其痛苦。罗马使节对军人说的话:"杀死所有的人,上帝在最后审判中将把天主教徒和异端分开",也许是经过长期的沉思之后说的;至少根据史料记载十分清楚的是,向朗格多克(Лангедок)移动的十字军军团就被这种高尚的宗教精神鼓舞着,该军团是十分严肃的、以致于我们把这些话当作厚颜无耻

的亵渎神明的任何愿望都应该放弃。在法国艰难地传播的加尔文学说对法国的威胁远比路德所点燃的火焰对德国的威胁小；然而，巴托罗缪之夜（Варфоломеевская ночь）的大屠杀正是在法国爆发的。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相互残杀，目的是成为同样的法国人；如同过了三百年后，为了另外一些原则，国民公会的成员同样残忍地在法国消灭了与自己不同的人，然后在自己的内部做了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把在信仰上的一切区别的迹象都当成是犯罪。藐视人的个性，对他者良心的微弱兴趣，对人、对部族、对世界的强制是罗曼种族的根本的和无法消除的性质，它表现在罗马帝国、法国中心化的伟大事实里，表现在天主教反动势力和第一次大革命的进攻性的战争中，表现在耶稣会中，表现在宗教裁判所里，表现在社会主义里。时时处处，带着十字架或大炮，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或者在恺撒的国徽下，以各个时代的各种真理的名义，感觉到在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罗马人的血液的各民族走向其他和平民族，在不去深入地看看它们的心灵的情况下，迫使它们接受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社会建制的形式。对人的冷酷，没有能力理解人，与建设人类的伟大能力一起，仿佛把这些民族变成了一种水泥，它把其他部分连接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这些部分有时是无可比拟地更有价值，但总是更小的民族。罗马的天才没有产生任何自身伟大的、真正的或神圣的东西；除了一种东西——由其他民族创造的一切伟大的、真正的和神圣的东西之间的联系，由其他民族创造的东西因此才在自己的整体上构成了历史。所有罗曼人文明的形式的吸引力由此而来；抒情风格，在天主教音乐中令我们惊奇的对某种东西的永恒追求，都由此而来。其他民族尽管更深刻，更有内容，但都不可遏止地迷恋这些文明，这个教会、科学、文学。在所有这些东西里都产生一种神秘的统一的本能，它们怀着一种忧

郁的情感压制自己高尚的天才，并等待着，最终与神奇的大厦融合在一起，这大厦是永久的、不断增长的、冰冷的，但却是美丽的。

日尔曼种族的精神时时处处都相反，无论是什么东西在吸引它，它都追求部分的、独特的、个体的东西。与罗曼人的包容型的观点对立，日尔曼人的观点是渗透型的，他们的法律、科学、教会、诗歌的一切独特性便由此而来。人的良心替代人类的命运，家庭生活替代政治冲突，对自己的我的深刻直观替代对世界的认识——这一切都是同一个事实的不同结果。可以认为日尔曼民族归属于天主教会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的结果，这个归属之所以保留了这么多世纪，只是因为这些日尔曼民族没有发现罗马的真正意图，罗马也没有太仔细地和清楚地看看在阿尔卑斯山脉后边的是什么。持续两个世纪，把欧洲分裂为两个互相仇视的阵营的宗教改革运动只是这个误解的表现而已，对双方而言同样都是奇怪的，从那时起，这两个方面永远地分离了。贫穷的奥古斯丁隐修院里的一个修士路德忘记自己的修会、帝国、普世的教会，只听从自己良心的不安，坚定地说，他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只要不能用"上帝的话"向他证明这一点，——这时在他的身上，在自己的我与整个世界的这个顽强对抗之中，日尔曼人的实质第一次被表达出来，并且成了历史上坚定的事实，这个事实从此不再是被征服的，而是征服别人的。由此产生的宗教教派的世界，这个几乎在每个地方，没有任何愿望使自己的信仰与其他人的信仰一致，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上帝的奇怪宣传，在宗教意识领域里就是以前封建主义[3]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所是的那个东西，这是另外一种奇怪的愿望，即愿望把个性的我到处都当作自己概念和利益的中心，这个我是某种绝对的，与任何东西都不一致的，但一切他者都应该与它一致。最后，日尔曼种族给历

史带来的第三个伟大事实——它的看待自然界的方法，它的哲学——也只是心灵的这个指向的结果。和在宗教领域，在政治领域里一样，在这里，在理性领域里，自己的我被这个种族的最高表达者认为是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规范、界限和联系的根源。深刻地研究世界对所有民族来说，从历史的一开始就是对世界好奇的考察和对可见的东西的思考，——对从康德开始的一系列伟大的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则只是对自己内在本质的神秘运动的认识。"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所意识到的思想的发展"，欧洲惊奇地听到和重复了所有这些话，它们如此深刻地被日尔曼种族的独特心理结构预先决定，以致于我们在思考它们以及它们显然公正地依靠过的长长的一系列论据时，最终我们完全丧失了对象认识和主观幻想之间的界限，我们问：人穿越时代、地点和种族条件限制的手段有哪些？人受这些条件的限制，那么他什么时候可以希望甚至是跨越自己人的机体组织条件、获得在完满性和真理性方面是绝对的知识？

无论我们再看另外的多么微小的东西，我们总是能够在它上面指出日尔曼精神对部分的东西的迷恋。与罗曼各民族的英雄诗歌对立，日尔曼人的诗歌选择作为自己对象的是私人关系的世界、家庭，而不是广场，是普通的市民的心，而不是国王、征服者或者他们的谋士的高尚的义务和复杂的操劳。小市民的戏剧，描写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以及与此相关的莱辛(Лессинг)和艾迪生(Аддисон)的活动，最后甚至还有歌德(Гёте)和他的浮士德的不确定的内心不安的世界——这一切在自身上只具有自己民族天才的痕迹，尽管我们愿意在这一切里看到个性天才的痕迹。对法律中个体的理解产生了在遥远的中世纪的昏暗中 12 名陪审员的法庭的建立，这些人是从自己良心的深处做出判决的，

而不是在预先规定的、对所有情感都是共同的法律的规范中找到这个判决。对法律中的个性的这个理解还阻止了英国人编纂自己持续了一千年的法律，并引起了德国学者对中世纪法律，它的历史发展，最终还有所有民族的法律的严肃研究，在这里与最高尚的东西一起被讨论的还有最原始的东西。伟大的赫尔德(Гердер)说过："每个时代和每个地方都为自己而存在"，它开辟了对历史理解的新纪元，它指出了个体和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应该在历史里被认识。这句话包含了整个曾经生活过的和死去的人意义，另外一个德国思想家说过的话与这句话惊人地符合，他的话是针对全部活着的人的良心的："请把与自己类似的每个人都看作是目的，这个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当作任何东西的手段。"这是为自己而存在的目的的王国，康德的这个道德单子论与莱布尼茨的思想处在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之中，整个这个日尔曼人的世界仿佛分散成几十亿个中心，其中的每个中心只能感觉到自己，并通过自己认识一切，相信一切，对一切发生作用，——这个世界与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的世界多么惊人地符合，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世界包容、统治和决定着形式，但无力创造任何内容。这两个对立的和相互对应的种族仿佛反映着一个伟大层次的两个边缘，这个层次的运动创造历史，推动时代前进，把各民族分开，各民族在自己自由的天才那里只是印上了另外某个最高者的意志的痕迹，但这些民族注定无法领悟到这最高者的思想。新教的无限的怀疑主义，随便在什么地方，比如在野蛮人中间，对用功绩消除自己内心忧伤的渴望，同样都可以在日尔曼(根据上下文，"日尔曼"应为"罗曼"——译者)种族里感觉到，这是一种忧伤的愿望，它表现在罗曼音乐的声音中，它的诗歌中，在它的伟大政治家孜孜不倦的活动中。这两个种族无法克服地分裂了，并永恒地感觉到缺乏他者，它们充满内在的不

和谐,并把这个内在的不和谐带到生活和它们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它们的永恒斗争和不知疲倦的建设只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些对立面永远也不能相互理解,这是无法融合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的预备性的形式和内容。由此才有充满整个历史的不满足的感觉,才有永恒的获得和对一切获得的东西的永恒的不满。

[注释]

①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f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

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法国文艺理论家。

居维叶(Cuvier,1769-1832):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② 我们指的是傅立叶(Фурье),圣西门(Сен-Симон),卡贝(Кабе),路易-布朗(Луи-Блан)等人的思想,在这些思想里产生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幻想,作为一种强烈的和忧郁的愿望,即希望在以后成为被论证的之前,先科学地对这个幻想进行证明。可以一般地指出,正如费边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Фабиев)和奥古斯都帝国(империя Августов)是罗曼人用法律联合人类的企图一样,天主教是罗曼人在宗教里联合人类的企图,社会主义也是在罗曼种族里产生的一种在经济的基础上联合人类的渴望。由此可见,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即在罗曼人的整个历史存在中,在变化着的手段里,罗曼人精神的目的还是那一个。

③ 封建主义的实质大概最成功地表达在中世纪的一个俗语里:"Chaque seigneur est Souverain dans sa seignorie(法语:每个先生都是自己太太的主宰)",在这里不是政治联系,不是经济关系,而是意志的士气劲被看作是整个生活制度的主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说法表达在法语里,即是在这样的大脑里形成的,它更有能力进行概括,在各种不同种类现象的总体里抓住联合的特征,尽管这个说法的对象无疑是具有日尔曼来源的制度(封建主义的传播领土同时又是日尔曼部落

迁居的领土,这个部落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嵌入到当时还完全是日尔曼种族的国家),在所有日尔曼血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消失后,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分立主义,却在纯粹日尔曼国家里一直保留到今天。

二十一

把和谐带入生活和历史之中,把颜料和画布结合为一张活生生的画面——这就是人在大地上没有完成的事业,是人极其缺乏的东西。要赞美上帝,感谢命运,相互赞美,赞美自己手中的任何事业,还缺乏"棕树枝"和"白衣",内在的世界和喜悦。

这是靠什么样的内在运动实现的,如何能感觉到足够消除任何悲伤,足够化解任何仇恨的心灵的兴奋——这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只能渴望和等待这个时刻,而且所有民族都在渴望和等待它,把它看作是某种应当的和必须的东西。

最后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种族,我们就属于这样的种族,在自己心理结构的特殊性中蕴涵着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最大能力。它与追求各种不同种类因素的外部联合,与追求每个因素在自身中的无限孤独同样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充满着清晰性、和谐、对内在一致的迷恋,一方面是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一致,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使整个周围世界之间一致。罗曼种族强迫地追求用形式的统一把一切都联合起来,不顾个体的精神,也不爱惜它,日尔曼种族顽强地抛弃整体,走向无限的细节世界,斯拉夫种族取代它们这两种追求,它作为内在的统一而进入完全不同的、表面上是无法调和的对立面之中。没有尽头的同情和宽容精神,同时又憎恶一切混乱和昏暗的东西,这都迫使它不用任何强迫,慢慢地,但永远地建立这样一种和谐,其他民族早晚也能够感觉到这和谐,为了不残害自己,不破坏这和谐,它们使这和

谐服从精神，疲惫地接受这和谐。

对缺乏其他民族追随的理想的意识最有可能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最终我们应该明白，人把不可穷尽的痛苦带入历史之中，并赞美它们，因为它们仿佛给人带来了"对善与恶的认识"，但实际上，全部这些痛苦毕竟都是徒然地被携带着，人还是远离这个认识，如同最初这个认识向他招手的时候一样遥远。他受其决定和约束的那些无法逾越的界限只给他提供这个认识的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令他不安，刺激他，但通过这一线光明他注定永远也不能直接看到真理的阳光。我们也应该明白，对人类这个"分散了的羊群的联合"的不懈追求只是用无法调和的仇恨把羊群给分开了，联合的企图自身越是强烈和强迫，这个仇恨就越是凶残。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将意识到，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所迷恋的伟大是骗人的。克制住自己的精神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在大地上的任务是更加有限的。如果我们不再把思想和愿望指向某种遥远的东西，那么我们将重新感觉到从徒劳的漂泊中向我们返回来的力量的完满。只要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明白以前我们觉得如此渺小和没有意思的任务的高度。我们将明白，安慰一颗惊慌的心，消除某个人的忧郁——这是比做出最辉煌的发现或者用不需要的功绩来震惊世界更大，更高尚。我们的功绩将离我们更近，它们归结为安慰这样一种悲伤，在自己徒劳的追求中，世界用这种悲伤沾染了自己。与我们的高傲被驯服的同时，我们真正的尊严将增长。面对伟大的目的，我们的力量是软弱的，在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将不再把人的个性抛到这些目的的脚下。我们将不再给痛苦加上痛苦，以便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让最遥远的民族和未来的时代从那里可以看见我们。我们将理解人的绝对意义，我们将理解，在他心里，在每个个别人脸上的喜悦和光明——是历史上最高的、最好

的和最贵重的东西。

在生活中实现和传播这个和谐完全没有被当作人在大地上的最高任务。"化剑为犁"[1]的过程长期还不能实现，当然，这个过程的实现要靠内在喜悦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外部的逻辑意识。甚至在选择了"犁"的情况下，外部的逻辑意识也在预先铸造剑，为的是用剑来迫使人们去造犁。不过，我们将不去注意那些令人不安的思想——它们已被《传说》给穷尽了。我们在寻找可以克服这些思想的东西，因此我们转向研究基督教中分出来的第三个伟大的支派。

正如天主教是对基督教的罗曼人的理解，新教是对基督教的日尔曼人的理解一样，东正教是对基督教的斯拉夫人的理解。尽管东正教的根源在希腊的土壤里[2]，它的教义也是在这个土壤上形成的，但是它在历史上闪烁的整个独特的精神在自身中却活生生地反映着斯拉夫种族的特征。正是这个独特的精神在各民族历史的命运里起着重要作用，而不是教义上的区别，看来，正是这些教义上的区别造成教会分裂，而且这些区别仿佛很轻易地就可以消除。无疑，并非 Filioque(和子句)引起了宗教裁判，尽管宗教裁判所只存在于 Filioque(和子句)出现的地方。教义上的区别与各派的性格，指向和精神一致，尽管这个精神与教义上的区别无任何关系，这区别完全是从罗曼各民族的种族特殊性中来的。假如没有这个教义上的区别，那么可以坚信，日尔曼各民族和斯拉夫各民族在对基督教的理解和基督教的实践上还将无法遏止地与罗曼各民族分裂，然后它们之间也将分裂。现在每个教会之所以如此顽强地抵制与另外某个教会结合，是因为在实质上，每个教会不仅仅在教义上，而且在自己所有的内部结构中，在自己性格上的每个特征中，都是某种十分独特的、与其他教会完全独立的东西。这是因为在它们中存在的生命，在每

个教会里都按照自己独特的类型运转。

然而，只有一个福音书，只有一个精神在其中闪烁。如果我们愿意搞清楚，这三种类型生活中的哪一种类型符合这个精神，那么我们无法控制地和不由自主地应该说，这就是东正教的精神。当人们向我们指出天主教无法理解的伟大，指出其中包含的思想的无限性，天主教被这个无限的思想缠绕着，被它证明着，从古老的经院哲学直到今天，——那么我们同意这一切，并且也承认，在我们的教会及其历史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如果向我们指出新教的所有成果，指出这个敬神的生活，指出新教中批判的自由和高级的教育，这个教育就由自由的批判而来，——那么我们说，这一切我们都能看见，永远也不对此装不知道。我们只是要问：基督教、福音书的精神，救世主用语言和生命教导我们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既没有高尚的功绩，理性成就的辉煌，也没有引导历史之路的意图。在您面前的是贫穷的教堂，四周都是小房屋，但都聚集在它的附近。请您走进教堂，听一听执事和某个小男孩的不协调的歌，天知道这小男孩是从那里来帮助他的。头发斑白的神父进行彻夜祈祷。教堂的中央，在读经台上放着一个圣像，几个老头子和老太太不慌不忙地，一个接着一个地从自己所在的角落里走近圣像并俯下身子。请您看看所有这些人的脸，注意听他们的声音。您会看到，到处都已经丧失了的东西，不前来帮助爱，也不巩固希望的那个东西——信仰——活在这些人中间。有一种宝物，没有它生命就将无法遏止地枯竭，智者找不到它，它(不)回避那些无力地渴望着和正在死亡的人——它就在这些普通人的心里显现出来；那些可怕的思想，令我们不安并使世界变得沉重的思想，显然永远也不打扰他们的大脑和良心。他们有信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信仰上，在信仰的帮助下去爱。执事在唱诗班的

席位上不清楚地读祈祷文,这有什么呢:他相信这些祈祷文的意义,那些听他的人,也丝毫不怀疑,如果需要的话,他将为这个意义而死,并且进入天国;如同他们所有的人都将死亡一样,并根据自己的事业接受报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事业)准备这报酬。

新教的狂热,伟大的和走向灭亡的教会的普世的意图能与内心的这个平静,与生命的这个坚定性相比吗?在前者中的灰心丧气,在后者中的忧郁的愿望,不是丧失某种东西的征兆吗?没有这种东西教堂只是个房子,祈祷的人群只是聚合在一起的人群。他们用来包围自己的整个艺术辉煌,这无比的绘画,这迷人的音乐,这些宏伟的大教堂——这一切不都是来自于这样一种愿望吗,即在自身唤醒一种在那些贫穷的祷告者身上从来没有沉睡的东西,找到一种已经丧失了的东西,这是在那个不起眼的教堂里未曾丧失过的东西。欧洲被它所充满,并因为它而颤抖的愿望的全部冲动是否仅仅是消灭巨大忧郁的愿望,它不愿意也不能忍受这个忧郁;欧洲生活的全部美、伟大和多样性,欧洲的文明是否像神父永远也不再穿的华美的法衣?

在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无法解释的和深刻的现象,即从"从穷人那里剥夺,给富有的人增加"。[③]福音书里有两个出色的形象马利亚(Мария)、马大(Марфа),她们在自己的家里接待救世主,在这两个形象里仿佛表达了这些无法理解的教会命运。当救世主进来时,马大心里忙乱,就着急;她想的是丰盛的款待,并忙于这些事情,甚至忘记了她们为谁而来的。"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十分劳累,对她生气,就走到夫子的跟前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其中包含着全部生活和历史的含义:"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④]

我们神圣的教会，按照上帝的无法解释的道路，注定要选择这个"统一"，只有它才是需要的。这个教会只相信救世主，听他的话。我们将祈祷，让这个信仰永远也不离开我们，根据夫子的训诫，我们将不感到遗憾，如果我们那些忙乱的妹子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

[注释]

① 参见《以赛亚书》2:4。"……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译者注

② 不过，我们应该记住，在我们这个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各民族大迁徙的时代，这个土壤饱含了多少斯拉夫的因素。

③ 参见《马太福音》13:12，原文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译者注

④ 参见《路加福音》10:38－42；《约翰福音》12:1－7。——译者注

二十二

我们身上信仰的宝物在多大程度上枯竭，我们就在多大程度上开始为其他教会赖以生存的理想担忧①，——这就是内部情感和主观思维的无限发展，或者是对人类及其外部建制的关切。我们将想尽办法用这些关切去填补在我们的心灵中由于信仰的丧失而造成的空虚，每当我们不知什么原因丧失与自己的人民的活生生的联系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就是类似不安的表达，——是历史上最高的表达；因为不安所替代的空虚正在显现，在这个空虚里，底不但很深，而且仿佛根本没有底。我们回忆一下伊万对阿辽沙的回答："你终于猜到了"，——这句话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对待我们的历史生活的态度方面，传说

是最具毒性的一滴毒液，它终于从我们已经走了两个世纪的精神发展阶段中流了出来，分离了出来。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我们还要补充说，在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否定里的伟大感，这一切我们不但从来都没有体验到，而且我们也不会体验到，对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一般地说，《传说》在某种意义上绝无仅有的。浮士德(Фауст)在躲避马格利达(Маргарита)关于上帝的那些问题时说的嘲讽的和带有歧义的话，在哈姆雷特身上宗教意识的含混不清——与在小酒馆里的屏风后面所说的和所提问的东西相比，这一切只是可怜的闲谈，我们伟大的作家巧妙地把自己思想的表达者们引到这个小酒馆里，然后，穿越时代，展示了基督向"令人厌恶的和遭受痛苦的人类"显现的神奇画面，把他引到宗教裁判所的昏暗的地下室——又从那里展示一千五百年前的遥远的荒漠，他在这里准备去拯救人类，却遇到了诱惑者，后者说，这是没有用处的，在不知道人们的真正本性的情况下，他是不能拯救人们的，早晚这个拯救得由他(诱惑者)来完成，因为他最懂得这个本性……他比他更爱人们。

这些特征是真正的魔鬼的特征，这不是人关于威胁着他的恶的魂灵所能够想到的东西，而是恶的魂灵自己所能说的东西——以惊人的和无法认识的方式表现在这个《传说》里。阿辽沙，可怜的和颤抖的阿辽沙，他还是个正在成长的人，无力地把手伸向天空的人——他是这个庞大的腐烂着的生命种子里的一个小萌芽的真正化身——他仿佛是被恶的这个强大的宣传，被"荒漠里聪明的魂灵、死亡和破坏的魂灵"的坦白给伤害和压垮了。我们再重复一遍，宗教大法官、大学生、作家自身和在这一切背后的诱惑人的魂灵的形象，一个从另外一个里显现，它们仿佛丧失了个体轮廓的清晰性，融合为一个存在物，我们听到和理解了它的声音，但它的脸和名字我们却无法区分。这个人仿佛

惊慌失措，无论在什么里也找不到支柱，他抓住自己的心、抓住在其中跳动的生命，然而，他不知道这生命的规律，——但却知道，这生命是好的。他在无法认识的力量和赐予给我们并被我们赞美的，然而却是我们所无法认识的、神秘的生命之美里找到了这个反对恶的魂灵的支柱：

——哥哥，你将怎么生活呢？——他问道。

反驳的全部意义和力量都在这个感叹里：对自己大脑的局限性的承认，这个大脑甚至不但无法认识像生命这样与我们如此之近、与我们亲近的现象，而且无法哪怕是多少接近对它的理解，当然更没有能力认识世界的结构和善与恶的根源了。我们被固定在生命之中，甚至"不理解它的意义"，我们无法控制地开始想，在生命里有某种比我们想在其中看见的那个可怜的意义更加无限深刻的东西，只要找到这个东西，我们就准备和生命妥协，"接受它"。对我们的生命根源于其中的神秘的东西的感觉（尽管我们看不见它）填补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大脑驯服，并把生命的力量还给我们。在所有这些无法解释的不安和意识的痛苦之后重新回到普通信仰的安宁，回到对无法认识者的宣传所获得的稳定结果后，我们在自己的心里不自觉地说："你是对的，主，你的路是不可知的"。

与这个信仰的稳定性相关的还有我们的希望。在我们研究过的《传说》里有一个遗漏：在谈到"被证明了的人"时，关于被宽恕的人它没有说任何东西。启示录里说过，前者的人数是十四万人，在这些话之后关于其余的人也做出了喜悦的许诺。我们把这个许诺引在下边，让它神圣的声音克服昏暗和绝望，当我们谈到《传说》时，我们如此长时间地处在这个昏暗和绝望之中：

> "此后，我观看，"圣约翰关于自己的幻象说，"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

宝座和羔羊前面，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长老中有一位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庇他们。

他们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必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7:9－17）

在这个伟大的形象里显示出人的人间命运的结尾。在我们在最开始[②]引用的《创世记》的话里指出的是出发点，人的漂泊就从那里开始。《传说》自身——是他的这个痛苦的哭泣，因为他失去了贞洁，被上帝遗弃，他突然明白了，现在完全是孤独一人，只有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罪，在自己的心灵上还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克服这个黑暗，帮助这个光明——这就是人在自己人间旅途中所能做的一切，是他应该做的一切，以便安慰自己惊慌的良心，这良心如此地沉重，如此地病态，它已经无法再忍受自己的痛苦了。清楚地认识，这光明是从哪里来，这黑暗是从哪里来，这最能用希望巩固人，因为他并不是注定要永远成为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场所。

[注释]

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与其他教会结合的无法遏止的倾向的解释，在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些人时常表达这个愿望

② 在题词里。